

# 炎黄春秋

第 **12** 期  
2008 年

**胡启立：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出台前后**

**萧克与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

**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

**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

**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 目 录

### 本刊特稿

- 1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  
.....胡启立

### 怀人篇

- 7 萧克与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 .....本刊编辑部  
11 陪萧克将军重游旧地 .....欧 初

### 春秋笔

- 13 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 .....杨 民  
19 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应克复

### 亲历记

- 21 清华附中红卫兵100天 .....阎阳生  
28 我亲历的“潘晓讨论” .....郭楠柠  
33 我的1978年 .....高 放

### 一家言

- 38 反腐三十年的沉思 .....辛 宇  
45 国庆仪式创新漫笔 .....智效民 丁 东 赵 诚

### 往事录

- 48 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 .....杨继绳  
55 胡耀邦约黎白写《湘潭黎氏》 .....黄宗江  
57 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 .....赵淮青

### 品书斋

- 61 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 .....于光远  
64 评《国史札记》兼论高饶事件 .....王海光  
69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章立凡

### 海外事

- 72 历史上的台尔曼 .....施用勤

### 总目录

- 77 《炎黄春秋》2008年1—12期目录 .....本刊编辑部

### 顾问

杜润生 李 昌 于光远 李 锐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方 实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朱厚泽 李 普  
李一鑫 李冰封 李维民 杨继绳  
杨天石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岂之 张文彬 张荣华 何 方  
杜导正(召集人) 范敬宜 金冲及  
钟沛璋 徐 孔(副召集人) 袁 鹰  
凌 云 萧蔚彬 曾彦修 彭 迪  
韩 钢 雷 颐 魏久明

社 长 (法定代表人): 杜导正  
副 社 长: 徐 孔 杨继绳  
常务社长、总编辑: 吴 思  
执 行 主 编: 李 晨 徐庆全  
社长助理兼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社长助理兼办公室主任: 胡竞成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莊其環 李 琼  
理 事 事: 白建钢  
秘 书 长: 徐 孔  
副 秘 书 长: 杜明明  
主管、主办单位: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  
本刊常年法律顾问:

张思之 (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 010-68083211)  
步凌云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 010-85869163)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印刷: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编: 100045

本 刊 网 址: <http://www.yhcqw.com>  
本刊电子信箱: [yanhcq@sina.com](mailto:yanhcq@sina.com)  
发行部邮箱: [yhcqfxb01@126.com](mailto:yhcqfxb01@126.com)  
电话: 发行部: 010—68532048  
编辑室: 010—68534879 68523512  
办公室: 010—68522852

传 真: 010—68532569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296号  
出版日期: 每月4日  
定价: 5.80元

本期: 终审 吴 思

执行主编 徐庆全

校对 沈晓雪

#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

● 胡启立

20世纪80年代,是中华民族充满蓬勃生机和创造活力的年代,是一个民心凝聚、民气顺畅,上下同欲、刷新历史的年代。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新的伟大的转折。

1982年,党的十二大拉开了中华民族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序幕。

从农村改革发轫,随之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继而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一个全方位的改革大潮在神州大地骤然兴起。

在那个年代,邓小平同志作为总设计师,高瞻远瞩,掌舵导航;胡耀邦、赵紫阳披肝沥胆,全力推进。我那时在他们领导之下,按照中央的部署,全过程主持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文件的酝酿、调研和起草工作。

教育改革问题,是小平同志最早提出并始终高度关注的问题。早在1975年,他第一次复出,看到教育被“四人帮”糟踏得不成样子,就痛心疾首地提出:“教育也要整顿。”试图纠正被“四人帮”搅乱了的政治是非和思想理论是非。可惜,历史没给予他机遇。他奋力整顿的结果是,教育界的乱象非但没有制止,他自己反倒被扣以“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罪名,重遭罢黜。教育界一些跟随他搞整顿的同志甚至被迫害致死。教育界因此也更成为沉痾难愈的重灾区。

粉碎“四人帮”之后,小平同志再度复出。在整个国家百废待兴、百废待兴的局面下,他自告奋勇,主动要求抓教育和科技。1983年,他鲜明地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发。小平同志给予高度肯定和赞扬,说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是一大发明,一大创造”,同时他又特别强调说: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决定的第九条最重要。第九条说些什么呢?中心说的是知识和人才,说的是科技和教育。文件中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学和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改革越来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

可见,作为一个战略家,小平同志对科技教育问题一直是牵萦于怀、记挂于心。

当时,中央对教育改革的认识是明确而清醒的,决策是坚定而有力的。

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时隔仅仅一个星期,10月29日,中央书记处就开会讨论决定,将科技、教育改革提上日程,并成立领导小组。这个小组由胡耀邦、赵紫阳同志主持,日常工作由万里同志领导。万里同志在会上提出:让启立负责。领导小组下边设立两个工作班子,分别由教育部和国家科委主要负责人牵头,尽快提出关于教育体制和科技体制改革的初步方案。由此,教育体制改革文件起草工作正式

启动。

教育体制改革究竟改什么,现实的教育实践弊端在哪里?造成这些弊端的体制根源是什么?改革朝着什么目标、什么方向去改?需要什么样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调整?从哪里做突破口?怎样抓住关键环节?这些问题,是教育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也是文件必须回答的。

11月14日,中央书记处专门听取讨论了教育部关于教改问题的汇报提纲。此前的11月6日,万里同志和我找教育部同志就教育改革的一些重要问题一起商议,请他们认真准备一个提纲,向书记处汇报。可能因为时间仓促,也可能因为思想认识上的差异,汇报提纲没通过。耀邦同志说,如果作为文件的框架,汇报提纲主要问题没抓住,显得主次不分,眉目不清,旗帜不够鲜明。他说,关于教育改革,这次要写出一个纲领性文件,要抓住教育上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旗帜鲜明地做出回答。所谓“纲领性”,就是要重点突出,观点明确,条理清楚,语言简洁。他强调说,教育改革是中央的大事,国家的大事,搞文件就是抓大事,要下大力气,认真调查研究,坚持群众路线,集中全国教育工作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写出一个好文件,指导推动教育体制改革。时间宜早不宜晚,工作要往前赶。

这次书记处会表明了中央对教育改革的高度重视和对文件的明确要求。任务很重,时间很紧迫,容不得再迟疑拖延。于是我把手头工作排了排序,将主要精力投放到研究制订教改文件上来。

我首先阅读了一些有关教育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对当时苏联、美国等国家的教育制度,特别是战后德国、日本高度重视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的经验做了些考查了解,然后,我决定自己到第一线去调查研究。11月20日,我带着教育部、中央办公厅和文件起草班子的同志乘火车南下,第一站到了安徽,在合肥、芜湖,先后同省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大、中、小学的领导 and 教师们座谈。安徽一些大学的书记、校长们最集中的反映是,高校办学活力不足,政府行政部门管得过多过死,在财政体制、招生制度、用人制度、分配制度上都是僵化模式,学校没有自主权,难以成为独立自主的办学主体,也缺乏积极性,

内在潜力发挥不出来。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社会反映怎么样?我们请省经委、计委、政法委等一些部门管干部和人事的同志,从用人的角度来谈教育改革。他们反映,一方面是人才奇缺,各地、各部门、各系统都需要大量的符合社会要求、有觉悟、有能力的专门人才;另一方面,是以往分配来的不少大学生不对路,不合乎需要。政法委的同志们反映,全省公检法司系统总共近三万从业人员,其中大专程度的仅占现有干部的5.8%,而学政法专业的更少,仅占现有干部的3.9%。计划到1990年要新增加2万多人,每年需增加3600多人,但目前每年最多分配二三十个学政法专业的,加上中专生,还不够自然减员的数目;律师尤其奇缺,搞经济司法的几近于空白。省计委的一位主任谈到,目前存在五大矛盾。一是需要和供给的矛盾。1984年全省上报需11万人,可供分配的仅占26%。二是学校的学科设置与实际需要的矛盾,一些传统专业的人相对较多,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急需的人才则严重短缺。三是需要与质量的矛盾。一些专业、学科的教材相当陈旧老化,和五六十年代差不多,有的内容甚至成了笑话。四是学生知识结构上专和博的矛盾。现在是专业过窄,学工程的不讲经济,不懂资金和成本构成;学经济的不懂法律;学政治理论的不懂系统工程和经济管理。五是学和用的矛盾。现在的学校与社会联系少,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更少,以致有些学建筑的大学生对基本建设的程序名词都不懂;学文科的某些学生,古今中外这诗那词背得很多,参加工作后连个报告都不会写,一个文科大学生出去调查,回来三个月写不出一份调研报告。

安徽的同志们认为,目前教育的状况远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搞不好还会拖后腿。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11月24日,我们从安徽到达江苏,先后在南京、苏州、无锡,进行调研考察。江苏和安徽存在着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僵化的管理体制束缚了教育发展。江苏省有26所部属高校,分属20个不同的部,地方44所高校,由于体制原因,形成条块分割,各院校都搞大而全,小而全,形成资源极大浪费。江苏地处长三角,特别是苏南地区,经济发展很快,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全国处于领

跑地位。这就使得江苏对职业技术教育有着更深刻的感受和更紧迫的要求。顺应这一形势,苏州市从1982年开始,逐步建设一个职业培训体系。全市已普及初中教育,毕业生约75%升学,在升学的部分中进普高与职业中学的比例达到1:1,这个比例无论在全省乃至全国都是高的。未升学的初中毕业生经过一年半培训进厂当工人,职业中学学生经过两三年培训当技工,高等职业学校学生经过三年培训当技术员和高级技工。这样一个培训体系,使全市劳动力素质迅速提高,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又强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江苏的做法使我想到了德国(当时的西德)的职业教育。上世纪60年代初,我曾出访西德,那里的人告诉我:在德国,仅凭一纸文凭定终身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社会不仅看文凭,更要看你干什么,解决问题的能力怎样?博士文凭不一定比职业教育文凭更值钱。从江苏的实践看,加强职业教育已成为经济建设所必需。

11月27日,我们从江苏转赴江西。江西是革命老区,也是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尽管建国后老区面貌有很大变化,但经济基础仍然十分薄弱,特别是在一些山区,“交通基本靠走,通讯基本靠吼,安全基本靠狗”。当年红军驻扎过的宁冈县,1983年全县人均年收入才190元。与此相对应,教育的状况特别是中小学的状况,条件相当艰难。我们考察走访了一些山村小学,相当一些学校缺乏基本的办学条件,校舍破败,少门缺窗,夏不避雨,冬不挡风,学生的课桌就是几块土坯垒起来,真的是“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看了令人心情沉重。教师待遇也很可怜,拖欠工资十分普遍,有的教师几乎自己温饱问题都没解决,完全凭着良知坚守在教育岗位上。江西的情况有特殊性,但问题有普遍性。

12月2日,我们又从江西南下广东。广东属沿海开放地区。由于城乡经济改革的推动,教育改革也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广东高校数量比较少,改革开放以来,人才需求激增,为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他们不拘一格,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办学,电大、夜大、函大,还有各种培训班,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广东人发扬敢想、敢闯、敢试的精神,大胆突破一些体制障碍,为教育改革提供了一些实践经验。

这一次调研,历时半个多月,辗转四个省,前后到过几十所学校,大大小小开了近百个座谈会,与逾千人座谈、交流、讨论。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是冷静的比较和探讨,有时是激烈的辩论和争论。为了节省时间,提高效率,我们一般把行程安排在白天座谈、考察、参观,晚上乘车赶路,在火车上就白天听到看到的情况进行消化、议论、归纳。经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集中、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对整个教育领域的基本状况、基本矛盾、基本问题就有了较为清楚的了解。

在调研中,我们痛切地感受到,教育领域里还残存着“文革”遗毒和“四人帮”干扰破坏的问题,有“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的问题,也有经济能力和发展水平的制约问题,但是,就整个教育而言,最大的弊端,乃是在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所形成的僵化模式。一个拥有几十个民族、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各地情况迥异,基础各不相同,发展很不平衡,但统统实行同一种办学模式:清一色的全日制,正规化,统一招生,统一考试,统一教材,统一标准,统一学制……大学无论是部办、省办、国办,一概统招统分统配,其结果是,学校吃政府的大锅饭,学生吃学校的大锅饭,学生只要考进大学,就像进了保险箱。在教育结构上,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设置比例严重不合理;片面强调高等教育,轻视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十分薄弱(据统计,当时职业学校在高中教育阶段中的比例不到10%)。在教育思想上,从文革中“知识越多越反动”、“白卷英雄”,又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万般皆下品,唯有大学高”,唯学历、唯文凭,盛极一时,形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在高校里,较普遍存在着重理工、轻人文,重智育、轻德育,重学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基础教育严重滞后,师范教育不受重视,在广大农村,特别在一些老少边穷地区,学校数量少,条件差,师资缺乏。在学校管理体制上,由于政府权力过于集中,学校无法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办学主体,外无压力,内无动力,整个学校缺乏活力。学校的教材几十年一贯制,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到教学方法,在相当程度上是为了一纸大学文凭,严重脱离了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于是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局面:一方面,我们财力窘困,穷国办大教育,投入不足,

经费奇缺,另一方面,投入的经费效益很差,造成事实上的极大浪费;一方面,各条战线都痛感人才匮乏(当时,全国4000万技术工人中,高级工只占2.3%,三级工以下的占70%),另一方面,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少人才又因不合实际需要而形成大量积压;一方面,教育行政部门把人、财、物统得很死,另一方面,真正需要协调、需要统筹的事情却又因条块分割,无人问津……

另外,就全社会而言,特别各级党委和政府,抓经济建设的劲头都很大,真正把教育事业提到现代化建设战略地位高度,从认识上到行动还远未到位,轻视教育、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问题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教师地位低、待遇差的问题也没解决,这就造成教师队伍不稳定,优秀教师留不住,等等。

一个十多亿人口的民族,有过亿的人口处于文盲半文盲水平,而整个国家的教育又是一个同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远不适应的状况;如不改变,整个民族的素质都要受到影响,又何谈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教育的现状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教育改革的问题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

在调研过程中,我们一方面深切感受到教育问题的严重性,同时也深切感受到广大干部、群众和广大教师对教育改革的热烈期盼和空前的积极性。在调研中,许多教师、校长、教育科学工作者和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干部常常和我们交流讨论到深夜,有的同志还主动拿出书面报告和建议。

回到北京,我将调研情况以及对教育改革的认识和思考经过梳理,于12月22日给胡耀邦、赵紫阳及中央文件起草领导小组写了一份《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的书面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陈述了现行教育体制存在的弊端,重点提出了几点设想和建议。其基本观点是: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教育改革的目的是培养人才,要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数以亿计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数以百万、千万计的社会各个领域的专门人才;教育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经济体制相配套的,符合中国国情、适应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要求的教育体制。主要措施:一,改革高校管理体制,首先是改革招生计划和分配制度,在党和国家大政方

针指导下,逐步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增强高校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动力和活力,改变政府对学校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使高校成为依照国家法律和教育规律办学、相对独立的办学实体,逐步建立和完善高等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充分调动高校办学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二,改革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这是德国、韩国等许多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武器”,我们应认真研究和借鉴。三,稳定中小学教师队伍,组织全社会力量,加强基础教育,在中国建立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义务教育的经费应当由国家和社会“包”起来。四,为了加强对教育体制改革的领导,建议成立中央、国务院教育领导小组,统筹考虑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大政方针,研究制定相应对策,把教育事业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

这份报告送上去之后,政治局常委们很重视。陈云、李先念同志都圈阅了报告。赵紫阳同志12月27日对报告批示:所提改革的精神和原则都同意。同一天,耀邦同志也表示,同意紫阳同志意见。报告送给小平同志,小平同志12月30日批示:“很赞成。”

有了政治局常委原则上的肯定,我们以这个报告的基本精神为骨架,抓紧对文件进行构思布局。

1985年1月8日,即小平同志对报告批示后一个星期,耀邦同志和中央书记处再次听取了文件起草小组的汇报,正式敲定文件的指导思想、基本宗旨以及框架结构。耀邦同志强调,我们讲的教育改革是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改些什么,怎么改,这些道理在文件中一定要讲清讲透,其他次要的,零零星星的就不讲了;制定文件要着眼于解决问题,推动工作,写上了就要落实,定下来就要干。

3月16日,领导小组再次开会研究讨论。就在这次会上,有关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若干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得以拍板定案。会议确定,必须狠抓基础教育,要把在全国城乡实行九年义务教育,作为关系民族素质提高和国家兴旺发达的重要战略任务,动员全党和全社会,用最大的努力,积极地有步骤地予以实施。要在中央领导统筹之下

把基础教育管理的责任和权力交给地方政府;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把职业技术教育放到十分重要的位置;大力改革高等教育,对高校实行简政放权,改变过去对毕业生由国家包下来统一分配的制度,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在国家教育方针指导下,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增强学校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要增加国家(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在今后一定时期内,政府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的平均教育经费逐步增长,同时要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调动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要鼓励和指导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办学。会议确定,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统筹整个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国务院设立全国教育委员会,统筹协调教育事业。会议还提出,办教育也要纳入法治轨道,要考虑研究教育立法问题。

为确保文件的质量和进度,一月中下旬,文件起草小组加强和充实力量,把曾经参与起草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文件的几位同志也调进来。充实后的起草小组综合中央领导同志和几次书记处会议讨论的精神,反复研究,反复讨论,写出了第五稿。根据书记处决定,将第五稿作为一个讨论稿,发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群众团体征求意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还专门征求了人大常委、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意见。

4月份,文件起草小组汇集了各地、各部门、各方面对第五稿提出的修改意见(其中书面意见有三百份),连续修改三次,形成第八稿。

为了借鉴吸取外部经验,增强改革的国际视野,教育部派了一个调研小组带着第八稿,专程赴美国征求美籍华人专家、学者对教育改革的意见和建议。调研小组在美国先后访问了几十位专家学者,其中杨振宁、李政道、林家翘、聂华桐等一批世界知名的专家学者都发表了许多中肯切实的意见。文件起草小组吸纳了他们的意见,改出第九稿。

5月13日,中央书记处开会,逐段逐句逐字讨论了第九稿。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个稿子,同意将这个稿子再作修改后作为主要文件交全国教育大会学习、讨论。

5月5日至2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议的中心任务就是学习邓小平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讨论修改《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同时研究贯彻落实的措施。

在这次大会上,万里同志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做了讲话。会议开得隆重、热烈而富有成效。分组讨论时,与会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领会中央关于教育改革的基本指导思想,又结合实际提出了在本地区、本部门贯彻落实的办法和措施,还对文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

5月19日,小平同志到会做了《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重要讲话。

小平同志在讲话中说,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是个好文件。纲领有了,蓝图有了,关键是要真正落实。小平同志在讲话中再次强调科技和教育的重要性,他说,“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中央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抓教育,并且从中小学抓起,这是有战略眼光的一着。如果现在不向全党提出这样的任务,就会误大事,就要负历史的责任。”小平同志还说,“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

小平同志这些话,如高天裂帛,振聋发聩。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把教育的全局性、战略性、基础性意义讲得如此透彻,如此鲜明,如此精准,从未有过。正是小平同志这篇经典讲话,把整个会议推向了高潮,也使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同志倍受鼓舞。5月27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文件(草案),同意正式公布。全国各地迅速行动,纷纷学习小平同志讲话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制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教改决定的具体措施。教育改革随着经济改革的步伐,犹如春潮涌动,呈现出空前强劲的发展态势。

时光流转,白驹过隙,转眼之间,2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迈出了历史的新步伐,

国家的面貌和实力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的教育事业和教育改革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与当年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当时指导和推动教育改革的文件,是受限於那个时代认识和实践的产物,其是非功过也应由时间和实践去裁定。今天,重新回顾那个文件的诞生过程,在中国的改革发展史上,也许只算得大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或短短的插曲。我有幸参与其中,所扮演的角色,用今天的话说,可能算个项目负责人或者说施工小队长吧。当时付出的辛苦和劳作也不足为道,只是今天再来回顾那段历史,有几点感悟,让人铭心刻骨,永志难忘。

第一,国之命脉,端在教育。一个执政党在谋划整个民族振兴之计的时候,把教育作为一种国家战略,视为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由中央制定文件来推动,来促进;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把事关全民利益的教育视为千秋基业,国脉所系,扎扎实实地研究,扎扎实实地解决,把这叫做“远见卓识”,我认为是当之无愧的。作为中央文件,《决定》不仅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教育体制改革等方向和指导思想,而且对教育改革和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和要求。目标方向当然很重要,但仅仅停留于此是远远不够的,不解决“路”和“桥”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20多年前制定的那个文件可能有许多地方还需要修正、完善、补充,但那时对教育地位、意义的认识,今天看也还是很到位的,当时提出的教育改革的任务和目标也是很明晰的,当时提出的一些政策措施也是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的。即使今天来审视,我以为,中国教育的关键,仍在体制;中国教育的前途,仍在于改革。

第二,开放、民主的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内政治生活呈现出空前生动活泼的局面。中央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是极为周密审慎和民主开放的。那时起草一些重要文件,不是个别或少数人出个题目,然后找几个秀才或笔杆子关起门来搞,而是大张旗鼓,明明白白地告诉全党,要讨论决定什么问题,然后集全党全国之思想智慧,各种思想,各种意见反复比较,最后才作决定。比如讨论教育改革,从中央到地方,从机关到基层,从干部到群众,从理论工作者到实际工作者,尽可能做到广泛、充分地参与和表达。在正式

决定之前,认真收集、广泛听取各方面、各部门、各地区、各党派、各阶层、各界别的意见和声音。据粗略统计,先后参加讨论这一文件的,约在一万人次以上。说文件集中了全党全国人民的智慧,不是套话,也不是谰词。那时候,中央书记处实际上只是党中央的一个办事机构,大量的功夫和精力是用在调查研究上。老实说,当时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人,其个人素质、能力、智慧、胆略都是出类拔萃的;但他们总是作为领导集体中的普通一员,真诚地、实心实意地研究听取各种意见,特别是与己不同甚至完全相左的意见。书记处讨论问题时,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当面争执。当然,这种局面更多的是靠主要领导人的个人魅力、素质、修养、风范来维持的,尚未能形成完整的制度规范。这是值得认真研究总结的。

第三,执政党的历史担当。记得在教育大会闭幕时,小平同志最后讲了一段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话,他说,“我很高兴,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做出了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办了过去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党的认识能力有了新的提高,表明我们党已经能够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这段话,已经超出了对教育改革文件的评价,而是对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在那一个时期总体工作的褒奖和肯定。当然,这个话也不是随口而出的。以我个人的体验,当时在小平同志指导下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历史选择,顺乎潮流,应乎人心,表现出强烈的自觉的推动民族走向富裕、走向文明、走向民主、走向进步的历史主动精神和创造精神,他们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时代的大考面前,所显示出来的道义担当和责任禀赋,刚毅品格,和对工作高度负责的求实精神,使我至今想起还怦然心动。这一点对于我们各级干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任何时候都是有吸取和传承价值的吧。

(责任编辑 杜 晋)



# 萧克与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

## ● 本刊编辑部

2008年10月24日,萧克将军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中共中央的讣告中,对这位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原委员,国防部原副部长兼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政治委员,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赞誉,盖棺论定。对萧克将军八十年革命生涯来说,这一论定名至实归!

萧克将军叱咤风云几十载,战功卓著,广为人知。而对本刊同仁来说,讣告中没有点出的萧克将军晚年的一个头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以及他在指导本刊各项工作中所展露出的“思想者”的思想,则更能让我们体会到萧克作为思想家的深邃。

萧克将军是军中著名的文人将军。美国记者尼姆·韦尔斯谓萧克将军为军人学者,“因为他有着许多精确的事实和数字”。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谓萧克将军是“一个善于思考、有学者风度的人”。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谓萧克将军:“思维如箭一般的敏捷而尖锐,蕴藏着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

人们常以“胆”、“识”来区分学者和思想者。有识无胆者,可成为学者,而有胆有识者,才能成为思想者。从萧克对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中所展现的胆识中,我们能深深体会到这一点。

### 为本刊拟定“求实存真”的办刊原则

1990年,时任中顾委常委的萧克将军参与发起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8月经民政部批准注册之后,萧克同志就积极倡导创办一个高举爱

国主义旗帜、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史为鉴、以史资治的刊物,并亲自督促办理有关审批手续。在萧克的关怀下,1991年4月1日,本刊工作人员在北京景山后街北京市少年宫院内集中办公,《炎黄春秋》杂志正式开始工作。7月1日,第一期刊物面世。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核心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对事对人,说实话,说真话,客观公正,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遗憾的是,在对待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上的人物和事件的认识上,曾长期受到一种与之相反的非科学态度的影响。这种状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在三中全会路线实践了10年后的1991年,有了很大的改观——当然,那种非科学的心态直至今日仍然残存着。而在此时问世的《炎黄春秋》,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去述史述人的。

这一办刊宗旨的确立,与萧克将军是分不开的。自刊物开始运作到问世后,萧克将军最关心的是刊物的方向,刊物的品格,刊物的质量。《炎黄春秋》以主要篇幅记述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萧老便把“求实存真”四个字看得格外重要。他很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两句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1996年7月,《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纪念,萧克将军又把王充的话题赠我们,以资告诫和勉励。

这一观点,萧克将军在与本刊编者的多次谈话中,多次强调过。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他说:“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搞历史研究的同志必须‘求实存真’,不能作违心之论。”在萧克将军的指导下,本刊编者和



萧克将军出席《炎黄春秋》创刊五周年纪念会

作者对史对人的研究、评价,从实践的总体上来说,基本上遵循了“求实存真”这一原则的。

但是,历史研究中仍然残存着的非科学的条条框框,仍然束缚着人们的手脚。对一些因国家威权史观的需要而扭曲了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要想“求实存真”并不那么容易。有时候,编者难免会产生敢不敢、要不要讲真话的困惑。当我们向萧克将军倾诉这种困惑时,从他那里我们总是得到鼓励。这种鼓励,不但使我们的困惑迎刃而解,而且也使我们增强了突破各种束缚的信心。更为可贵的是,萧克将军不但给予我们鼓励,而且决绝地为刊物发表的文章承担责任。

1989年,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后,因为种种人为的因素,使报刊上对于这位对中国革命和改革开放做出过巨大贡献的领导人,一直缄口不言。对于这种非科学的历史态度,我们一直想有所改变。1994年,在胡耀邦同志逝世5周年之际,我们在封二发表了一首悼念耀邦同志的白话诗。尽管很不正规,但在当时是一个重要的突破。这一突破,自然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并要求我们停止发行这一期杂志。我们向萧克将军汇报后,他对有关方面抹杀历史真相的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他鼓励我们说,杂志做得对,不要惊慌,如果有人怪罪下来,就说是我萧克的主意;把我的电话号码告诉他们,让他们给我打电话。

萧克将军那种淡定和从容的神态,使编辑部

的同志受到鼓舞和激励的同时,也深深地体会到这位文人将军捍卫“求实存真”这一原则的胆识。

对于本刊的老读者来说,都有这样一个感受:本刊自创刊之日起,陆续对被扭曲的历史问题进行拨乱反正。陈独秀、李立三、托派问题、富田事变等等,这些因为国家威权史观的需要而被遮掩的历史,都在本刊陆续有所正本清源。这与萧克将军的指导是分不开的。

即以对陈独秀的研究而言,本刊陆续发表了多篇有关陈独秀的研究文章,本着“求实存真”的原则,恢复陈独秀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这是萧克将军对这一问题思考的一种体现。

早在1978年审读《南昌起义初稿》时,他对作者在当时历史情况下所批评陈独秀主张取消主义,搞议会斗争的说法,就予以纠正。他说:“陈独秀是1928年才发展到取消主义,当时还没有主张搞议会斗争。唯物主义,对敌人也不能多讲、讲过(头),对好人也不要再去涂粉,实事求是,反映事物本来面目。”

1981年8月,萧克将军在纪念中共建党60周年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就说过这样一段话:

陈独秀问题,过去是禁区,现在是半禁区,说是半禁区,是不少人在若干方面接触了,但不全面,也还不深入,大概还有顾虑。这个问题要不要全面研究呢?我看要。毛泽东同志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他和李大钊等把当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青年“集合起来……创造了党,有功劳”;“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周恩来同志也说:“陈独秀创党有功。”我想,对于这样光辉时代的“总司令”和创造了党的有功人物,即便他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及开除出党后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萧老在谈了这段话之后,毫不含糊地说,“不

认真研究陈独秀,将来写党史会有片面性”;他明确批评,从纪录片《先驱者之歌》中“看不出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和创党的最主要人物”,而“南陈北李(大钊)”之说才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定论”的。

基于这样的认识,萧老在1993年欣然为《陈独秀诗集》作序,并对该诗集的几位编注者说:“只有忠于史实,才能忠于真理。”

萧克将军的文章见本刊1994年6月号,这是较早的一篇对陈独秀做出公正评价,并倡导史学工作者对这一历史人物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章。萧克将军开风气之先的文章,极大地鼓舞了本刊作者和编者,随后,本刊连续编发了几篇有关实事求是地研究陈独秀的文章。

现在,本刊已经走过了17个年头了。17年来在述史述人时,有时候难免会产生敢不敢、要不要讲真话的困惑。但从总体上看,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我们是坚持了。尽管有时候是进一步退一步,但顺利多于受挫,喜悦多于苦恼。虽然跌跌撞撞,但我们毕竟前进了。这前进的步履,也和我们党、国家探索发展的轨迹重叠在一起。自然,也和萧克将军为本刊所确立的办刊宗旨有关,与他老人家“求实存真”的惕励分不开的。

### 以“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

在与萧克将军的多次接触中,我们体会到,他不仅以“求实存真”的原则,指导《炎黄春秋》,而且,在党史、军史的研究中,也一直倡导着这一原则,以“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来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

萧克将军1926年即投身国民革命军,此后历经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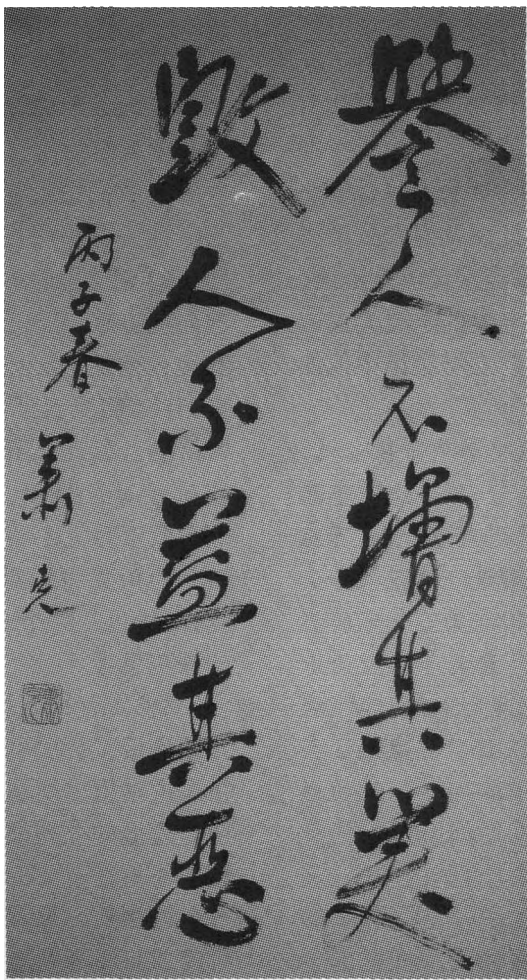
伐战争和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担任军团长职务与方面军领导职务。1949年后,多年担任军队的领导职务。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他基本上是亲历者,也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谋划者。

1949年以后,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些也成为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出于政治的需要,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或重要历史人物的作为被扭曲。对此,萧克将军一直持不同的观点。

“文革”中,有宣传说毛泽东与林彪在井冈山会师。萧克将军默然。有人调查井冈山会师情况,萧克将军只言朱德、陈毅与毛泽东会师,只字不提林彪。家人提醒还有林彪,将军答曰:“林彪参加了南昌起义,但不是南昌起义的领导人。那时像林彪这一级干部多得很。”盖彼时,因1958年的所谓军内“反教条主义”遭批判,萧克早已在军中靠边站;“文革”风云又处境艰难,在举国皆知的

“林副统帅”如日中天之际,萧克将军这样的态度,要冒着极大的风险。但是,思想者的“胆识”,让他将这种风险置之度外。

然而,在1973年批判林彪反党集团时,中央批发的材料中,有的说林彪在南昌起义时还是见习排长。萧克将军却认为这样说不符合历史事实。他说在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北伐,蒋先云同志牺牲后,干部调整时,林彪即升为连长了。为了纠正这个材料,他亲自给覃士冕(覃北伐时期曾与林彪一起工作)打电话,覃证实了他的记忆。为此,他特意要求从事党史教学的同志在讲课中予以纠正。而斯时,林彪成为国人皆曰可杀的“林贼”,一些人躲避都来不及,而为了历史事实,萧克将军居然这样



萧克将军为本刊题辞

“往上靠”。

1977年后,萧克回到军中,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军事科学院院长。在那个乍暖还寒的时节,他义无反顾地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他不仅对我们编者谈起过这些往事,在他的鼓励下为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秉笔直书的学者们,也在文章中有所披露。

“百团大战”,是彭德怀指挥的一场战争,也是中共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评定,至今也不能说尘埃落定。在延安时,虽然毛泽东对于百团大战曾给彭贺电,但1959年彭老总落难后,这一历史事件被全面歪曲。1978年秋季,为了推动历史文体拨乱反正,唐棣华(黄克诚夫人)拟在她所主持的《近代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彭德怀自述中的几个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百团大战。为了配合彭德怀自述的发表,想请人写一篇介绍百团大战情况的文章,但很多人心有余悸,不敢承担这一任务。她找到军事科学院的蒋杰后,蒋杰虽然答应了,但却招来了校政治部一位主任的劝阻。为此,蒋杰向萧克请示。萧克明确说:你是搞党史的,人家找上门来,你应该写,怕什么,我支持你写。为了帮助蒋写此文章,他主动介绍1945年七大前后华北工作座谈会的情况,他说当时批评百团大战最积极的,军队是朱瑞和林彪二人。聂荣臻沉默不语,似不赞同。彭德怀因受批判,七大的选票大大减少。初稿写出后,萧克亲自修改,在结束语中他加了一段:

从当时我军在敌后处于战略防御阶段来说,百团大战采取全面进攻战略态势,军事上是早产的,政治上是有错误的。但不能说是流产,更不能说是投降主义的产物。也不能否认在战役战斗上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以及对全国战局有一定的影响和提高我党我军声威的重大意义。从理论上说,在敌后处于防御阶段不应举行战略进攻,这一般是指全面的战略行动而言,但从各战略区甚至较少方向,可以抓住适当时机举行区域性的战略进攻,这是许可的,也是可以成功的。

这段话对这篇文章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文章在《近代史研究》创刊号发表后,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对拨乱反正,正确评价百团大战问题起了积极作用。

而熟知党史和军史的学者都知道,彭德怀和萧克在1958年曾经是这样地“对阵”过——

1958年,人民解放军内部曾经卷起一场“反教条主义”斗争的风波。这场斗争令人震惊地在军内高层掀出了一个所谓“以萧克为主帅、李达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反党分子”,包括刘伯承在内的一批军中将领受到错误批判和处理:刘伯承元帅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主管全军军事训练和院校工作的解放军训练总监部被撤销,萧克上将和李达上将被分别免去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副部长的职务,调出军队,陈伯钧上将、宋时轮上将、郭天民上将等也都受到严厉批判。这场斗争使建国后刚刚起步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进程受到严重挫折,极大地破坏了军队训练和院校教学工作,并且给以后的军队建设工作造成了长期的恶劣影响。而这场斗争的主持者,正是彭德怀老总。

“文革”结束以后,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被党中央否定,受这场错误批判牵连的同志逐步得到了平反,这桩公案得以澄清。而萧克将军对彭老总当年特殊背景的作为也从不挂怀。他曾经对我们编者讲过有关彭老总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有一件事令我十分感动,还在“文革”前,彭总被“罢官”后,曾嘱托他的侄子彭起超代他向我道歉。“文革”结束后,彭起超找到我家对我说,他伯伯要他向我转达几句话:“1958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我听了非常激动。彭老总不愧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的话,既是自责,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而萧克将军对待彭老总历史评价所持的态度,同样也是一个老革命家对党内斗争这个问题的深刻思考。

“求实存真”,是萧克将军要求本刊孜孜以求之的宗旨;“历史事实是最大的权威”,既是萧克将军推动历史问题拨乱反正原则,同样也是本刊应当遵循的办刊准则。萧克将军归隐道山,本刊同仁不胜悲痛,悲痛之余,我们也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责任,那就是把将军的嘱托牢记在心,继续完成将军未竟之业!

这也是我们能告慰将军英灵的惟一职责!

# 陪萧克将军重游旧地

● 欧 初

1994年4月初，我陪同萧克老将军登上广东韶关市物资大楼楼顶。这幢20层高的大楼当时是韶关市区最高建筑物，登楼眺望，远近景物尽收眼底。萧克因长期战斗生活养成习惯，每到一地，必登最高点观察地形。但这次环顾韶关，他神态格外激动。1926年，18岁的萧克离开家乡郴州，经坪石到达韶关，第一次看见电灯。当时他刚从湖南嘉禾甲种师范毕业，立志投笔从戎，一路步行到达广州，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68年之后重临故地，难怪他感慨万千。接着我们一起访问南雄县，8日来到梅关。萧克带头步行，踏着崎岖的梅岭古道，到达江西大余。一路走来，萧克以86岁的高龄，逢高必登，豪情不减当年。

萧克1949年担任第四野战军第一参谋长，协助林彪指挥四野大军在湖北强渡长江天堑，在湖南歼灭白崇禧集团主力，继而指挥陈赓率领的二野四兵团与邓华率领的四野十五兵团横扫南粤。当时我任副司令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在广东开平至阳江一带配合主力作战，因此萧克可说是我的老上级，然而我一直未谒见过他。1991年，萧克倡导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成立，他亲自担任会长，我是常务副会长之一，从此我经常有机会向他请教，一同出游。我们多次竞夕长谈，探讨中共党史、民国史、地方掌故。他特别喜欢了解广东一些历史人物，连细节都不肯放过。有次谈到十九路军，他听我介绍蒋光鼐、蔡廷锴的籍贯、家世等，觉得很有意思，又问起十九路军还有什么人物，我又介绍了谭启秀、戴戟等十九路军师一级将领，萧克听得聚精会神，连称有收获。

我见过许多中共党政军高层领导，特别佩服德才兼备的杰出人物，萧克就是其中之一。众所周知，萧克是中共党内的卓越军事人才，指挥作



作者陪同萧克(右)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散步

战、治军练兵等方面声誉卓著。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是与林彪齐名的青年将领，后来担任红军第二方面军副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〇师副师长。建国初期，他受命主持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倾力推动军队现代化，却在1958年因所谓“教条主义”遭到严厉批判，并被解除军中职务，经历多年磨难。1978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有人提出为彭德怀平反。彭是“反教条主义”运动的主持人，萧克却不顾前嫌，首先发言赞成彭平反，足见萧克胸怀宽广。

出身书香门第的萧克雅善书法，又素来爱好写作。从1937年开始，他就开始在紧张的战斗间隙动笔写作长篇小说，经历十多年的风雨，这部名为《浴血罗霄》的长篇小说终于出版，萧克也因



1994年作者(右)随萧克(左)访问广东南雄珠玑巷,然后步行穿越五岭上的古梅关

此得到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荣誉奖。他领导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旨在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1990年,萧克筹划出版《中华文化通志》,并亲自担任主编。他把出版这部书当做一场战役来指挥,动员多方共同努力。有次在广东花县召开文化通志会议,萧的老下级、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亲自批准动用军队专机接送专家。经近200名专家8年努力,包括十典、一百零一志的《中华文化通志》1998年全部出齐,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全面的文化通志。

自1992年起,萧克七访广东。他每次都叮嘱我们,接待工作一定要遵守制度,不可浪费。他常说“中国人靠吃米面长大”,饮食十分简朴。他对广东并不陌生,特别喜欢重访旧时驻扎、战斗过的地方。我曾陪他到粤东,凭吊南昌起义部队浴血奋战的几处旧战场。起义部队曾占领汕头5天,当地政府打算建立“五日公园”以资纪念,萧克欣然应我的请求为公园题词。当年他在广州时,所在部队经常到白云山操练。1993年他到广州,希望再登白云山,我便陪他按当年操练路线,从南侧上山,再东下沙河镇。他说很怀念价廉味美的沙河粉,我便请他到沙河饭店用餐,品尝种类繁多的沙河粉。他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大声说:“沙河粉,两个仙一碗!”沙河饭店请萧克题词,他欣然命笔。

除了革命历史遗址,萧克对文化遗址也非常

感兴趣。他到潮州寻访韩愈的遗踪,到新会凭吊匡门古战场,到韶关看张九龄的风度楼,到梅岭看折梅亭,处处都看得非常仔细。大革命时期,他所在部队驻扎在广州的小北门一带,将近60年后他仍清楚记得附近有药师庵、飞来庙等建筑。我带他看小北门的位置,还特地请广东省文史馆馆员徐家凤同行。徐的祖父徐信符是著名学者、藏书家,徐家凤本人熟悉广州历史掌故,又长期居住小北一带,了解附近的历史沿革。她说,如今的小北路小学就是当年药师庵旧址,飞来庙在此处以北不远,至今附近仍有一条小巷名为“飞来对面巷”。小

北门的历史很长,晋朝人陶侃曾在这一带居住。萧克听罢介绍,还专门找《晋书》、《世说新语》等书籍,查核陶侃的生平事迹。

萧克修养极好,待人和蔼。他时常邀他秘书的女儿张穗下跳棋,还与小姑娘商量成立一个“跳棋协会”,由他来当主席,会员只有张穗一个人。有次他到广州,要到我家来看我,我实在不敢当。加上我住三楼,没有电梯,上下不方便,就与他的秘书一同劝他不要来。可是他执意要来,我只好扫径倚门迎候。他每次见到我妻子容海云,总是亲切地叫她“女游击队员”。谈起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广东的游击战争,他对广东的游击队赞誉有加,令我很受鼓舞。

与老战友见面,也是萧克的一大乐事。我陪他在广州看望杨尚昆、王震,在深圳看望习仲勋,见面时彼此十分高兴,一谈就是两三个小时。据我所知,参加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党内同志,仍然健在者已经不多。广东有位谭天度,生于1893年,1920年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时已是党员,后来担任过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我设法安排萧克与谭天度会面。此时谭天度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住院,萧克走到病榻前,两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革命家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久久不肯松开。他们合影留念后,提起共同经历的往事,不时发出笑声,非常愉快。

(责任编辑 萧 徐)

# 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

● 杨 民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经济,30 年来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平均增长率达到 9.8%,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比 1978 年增长 40 倍和 30 倍,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1% 上升到 2007 年的 5% 以上,对外贸易总额占全球的比重由不足 1% 上升到 8%。这么大的经济总量,这么高的增长速度,持续这么长时间,这在世界现代史上是罕见的,公认为“中国奇迹”。这一奇迹和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生死攸关。

## 创造中国奇迹的秘诀不在于与世界求异,而在于与世界求同

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中国奇迹”得益于中国走了一条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一样的道路,在于“不照搬”,在于“中国特色”。有些国外投资者和投机者还“投主人所好”,研究出了所谓的“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上述说法也并非全无道理,从特殊性的角度来讲,每个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注定中国现代化建设必然带有中国特色。况且有些中国特色东西确实是中国崛起的前提和保障,比如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举国体制等等。但是,光有这些“特色”,这些“不一样”、“不照搬”是不够的,因为建国以来我们一直坚持党的领导,一直是举国体制。如果只靠这些“中国特色”,这些与其他国家的“不同”,就能创造“中国奇迹”,中国经济就不至于在改革开放前到了崩溃的边缘,就不会出现大跃进中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悲剧。可见,我们寻找“中国奇迹”的秘密,不仅要从中国与世界的“不同”去找,更要从中国现在与过去的“不同”去找。由此不难发

现,真正创造“中国奇迹”的,恰恰是开放改革,是引进了市场经济、民主、自由、法治、人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东西。30 年来,我们社会的进步,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与普世价值在中国的实践密不可分。当然,你也可以说,“改革开放”也是“中国特色”,那这种特色是什么呢?这种特色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发达国家的人类文明。因此,“中国崛起”实际上是通过“一样”的东西得来的,是“拿来主义”的成功,主要是“同”的成功而不是“不同”的成功。可以说,改革开放 30 年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也是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文明在中国的开花结果。

## 改革开放成功的关键在于引进了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其要义就是给予人民经济自由

回顾这 30 年,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从开放开始,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从经济到社会,成功的改革的每一步都参照了先进国家的做法。

文革是中国的一场大灾难。但否定了文革又该向何处去呢?世纪伟人邓小平非常清醒地找到了有效途径:对外开放。1978 年,他不但自己身体力行出访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向世界派出成百个观察团,探求发达国家快速发展的秘密。很快,全党形成了共识:西方国家比我们发达,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文明,闭关锁国死路一条,中国必须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把国门打开,也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与国外通商,更重要的是拆除了价值观上封闭对抗的壁垒,转而以平等理

性的视角、包容学习的心态去对待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引进了市场经济。

早在1979年11月,邓小平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时就明确地指出:“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这些话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清楚,那就是市场经济具有普世价值。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他又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中共十四大明确宣布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至此,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水落石出。

虽然意识形态上关于市场经济姓“社”姓“资”的争论一直不断,但实践中,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坚定不移地展开了。

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是自由。享有“经济学良心”美誉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分析研究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大量的经验资料基础上得出了卓越的研究成果:自由是市场经济的核心价值,发展就是扩展自由;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也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详见阿马蒂亚·森名作 *Development as Freedom*, 中译本《以自由看待发展》,实应译为《发展就是自由》)

中国改革开放30年就是森氏理论最好的注解。

在计划经济年代,管制是我们唯一的“法宝”,渗透到人民生活的每一个领域,正可谓“管天管地管空气,管吃管拉管思想”,什么都要管、什么都不自由。政治上的不自由就不用说了,八亿人民只有一个脑袋,还要“早请示,晚汇报”,不小心说错几句话都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经济上也一样,不要说工厂生产什么要上边说了算,就是农民地里种什么自己也做不了主。还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在这样的管制下,人们哪有什么生产的积极性,饿死人也就不足为奇了。

虽然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国人还不懂什

么市场经济,但放松管制,逐步扩大农民和企业生产的自由,成了人们自觉的选择。于是我们看到,改革开放初最经常出现的词就是“放权”,“让利”,“松绑”,“搞活”。这些不正是“自由”和“市场”的内容吗?

以广东为例。上世纪90年代以前,广东改革发展之所以能独具风骚,引领全国,关键就在于市场化改革领先一步,自由领先一步。用20世纪80年代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的话说就是:“对外更加开放、对内更加搞活、对下更加放权”。广东是全国最早开始市场取向改革的地方。改革开放初,中央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先走一步”,这是全国其他地方所没有的。中央给广东“放权”,广东又通过“三个更加”,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向社会放权,从而使得广东的体制在较长时期内较其他省市更为灵活自由。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把广东这块土地更早更充分地激活了,变成了一个相对更为自由的经济体,于是资本来了,人才来了,被扼杀的创造活力涌现了。自然,发展也就起来了。对此,邓小平1984年就深刻地指出:“深圳的建设速度相当快……深圳的蛇口工业区更快,原因是给了他们一点权力,500万美元以下的开支可以自己做主。”这里邓小平点出了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秘诀”,就是“可以自己做主”。“自己做主”,不正是市场经济的精髓吗?

反观全国的改革开放,哪里最能“自己做主”,最有自由,哪里就最有活力,就最能创造财富。改革开放初,安徽、四川率先“包产到户”,给农民生产的自主权,并向全国推广,解决了中国人吃饭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政府给了人们经商的自主和自由,于是有了万元户,有了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1992年以后,政府给了资本更多的自主和自由,于是那些最初的联想、万科、海尔,以及刘永好、任正非们,纷纷茁壮成长,成为巨人。新旧世纪之交,当政府还不知互联网为何物时,这一最开始被政府“遗忘”的角落,自生自发地孕育出了新浪、阿里巴巴等世界级公司。可以想象,如果政府一开始就像现在这样对网络严格“规范”、“关爱有加”,那么新浪、阿里巴巴可能早就被“规范”掉了,或者被国有资本死死地绑起来了。让自己国民有交易的自由,投资的

自由,发展的自由,甚至是在市场上犯错的自由,这才是发展的要诀。正是自由这一普世价值,创造了“中国奇迹”,造就了当代的中国企业家,而中国的企业家能否进一步走向世界,中国能否进一步发展,很大程度又取决于人民能否更充分地享有自由。当然,自由并不是可以毫无约束为所欲为,而是法治下的“自由”。当下的中国,不是自由太多了,而是太少了。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给人民一片自由的天空,什么人世奇迹都会创造出来!

这里还可以做一个比较。有些人经常拿印度和中国作比较,证明资本主义不如社会主义,证明普世价值如何不灵。真的是这样吗?中国和印度确实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政治上是社会主义,经济上是曾经被认为姓“资”的市场经济。而印度恰恰相反,他们长期在政治上是“资本主义”(在反普世价值的人眼里,民主政治姓“资”),经济上却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二战”以后,印度的领袖出于反帝国主义,连带反起了市场化,他们和当时的我们一样,“爱”上了苏式的中央计划经济,也有一系列的五年计划,有相当严格的经济管制。直到1991年,他们才同计划经济“离婚”。而我们比他们早“离”了10多年,正是这一“早离”,才有了今日中印之不同。当然,和计划经济“离婚”后,印度马上和具有普世价值的市场经济结了“婚”,开始了经济自由化、市场化,从而有了年均8%以上的经济增长。由此看来,印度经济一度落后于中国,不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别,而在于是否融入普世价值之别。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正视。1989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列出了“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内容,它们是:有纪律的财政、减少纯粹收入再分配、增加公共品(如教育和健康)的支出、扩大税基并降低边际税率、利率自由化、有竞争力的汇率、贸易自由化及外资投资自由化、私有化、放松政府管制、保护产权。尽管人们对华盛顿共识存在各种争论,但可以看到,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之路,虽然在具体路径上不是严格依此共识,但在目标上很多方面不正是朝着它们所指示的方向前行吗?有心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中国的改革开放并不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而

是相反,恰恰证明以自由和市场为核心指向的“华盛顿共识”虽非万能,却也并非不能。

## 目前中国的问题不是经济改革的 市场化取向的错误,而在于与经济 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到 位、不彻底、不全面,法治、民主、自 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 未真正落实

今天的中国,虽然创造了经济奇迹,社会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环境污染、资源枯竭、腐败泛滥、信仰危机、贫富悬殊、分配不公、社会分裂。套用狄更斯的话就是:这是个最坏的时代,也是个最好的时代。总之,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时代。许多人都在思考,这个时代的问题出在哪里,未来的路径又在哪里?细观可知,当下中国,非痛于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而痛于市场化之不足和与之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不到位、不彻底、不全面,痛于法治、民主、自由、人权、公平、正义这些普世价值还未能真正落实。对此,众多有识之士做了许多全面而深刻的论述,此不赘述,仅以现实和历史两个事例作比照,以为警醒。

以现实比照,中国改革勿要成为中国足球。中国足球改革是中国整体改革的标本。但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体育最早向国外学习,进行市场化、职业化改革的领域,却不无讽刺地成为了全民“娱乐”的对象。有人据此说,这都是市场化惹的祸。真的是这样吗?了解中国足球的人都清楚,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改革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停止了,近年来更是在狭隘既得利益的主导下,大踏步后退了。中国足球并不是市场足球、职业足球,而是行政足球、政绩足球;足球领域不是市场说了算,不是俱乐部、球员、球迷这一足球的主体说了算,而是政府说了算,政府官员说了算。也就是说,中国足球的市场化、职业化实际上是半截子市场化、职业化,或者说是伪市场化、伪职业化。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中国的足球和某些领域的改革是何其像!最开始,通过市场化改革,俱乐部产生了,足球市场活了,球员富了,足协也富了。但后来人们发现,在这个市场



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卡特邀请访问美国(1979年1月29日至2月4日)

中,政府的意志无处不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权力蛮横和居高临下无处不在,资本与权力的勾结无处不在,于是有了联赛的混乱,有了假球黑哨的横行,有了各种乱象的频出;足球场没有成为运动场、市场,反而成了权力和金钱的角斗场。于是,当我们用伪市场化、伪职业化的足球去和国外真正市场化、职业化的足球对抗时,输得是何其惨。

再反思一下某些领域的改革,不也是这样一种处境吗?我们通过市场化改革,一大批人先富起来了,政府的腰包也鼓起来了。但是我们发现,某些领域的市场化,和足球一样,也是一种缺乏法治、民主、人权的半截子的市场化。以改革起,以市场兴,以沉沦落,这是中国足球改革的黯然“三步曲”。更令人惊醒的是,当资本与权力的调情期和蜜月期过后,面对恶劣而无奈的市场环境,在足球领域,资本一方接连上演了“逼宫”、“造反”、“革命”等“义举”。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如果其他领域的权力坐拥者不勇于以球为鉴,不勇于放下权力的傲慢,不勇于自我革命、还权于民,而是任由市场“伪”向更深处,任由权力肆虐,乃至重拾计划体制和集权体制的大棒,谁又能保证不会有更多领域的资本走向与权力决裂的道路呢?

以历史比照,改革开放勿要成为又一个“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败于全面向

西方学习的“明治维新”,其事实几为人所共知,其教训多有评述。不过,如果洋务运动不是在19世纪80年代中停止,也许我们能读到这样的“高论”:洋务自强,同治中兴,盛世中华,风光独好——1860年代以后,大清经济持续多年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重新占到20%以上,铁厂、煤矿、铁路等一大批重大工程相继建成,江南制造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中国通商银行等企业以及学堂、新军蓬勃发展,尤其是以北洋海军为代表的现代国防,实力亚洲第一,世界前

列;这些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华特色”封建制度的无比优越,充分证明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大清模式”的无比正确。然而,甲午一战,貌似强大的大清海军全军覆没。自此之后,大清军队屡战屡败,直至帝国灭亡,中华民族陷入近百年的屈辱和衰退之中。究其原因,并非船不坚、炮不利、士卒无决死之心,而是大清帝国早已千疮百孔、腐败丛生的体制。纵有像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这样的所谓中兴之臣,也是独木难支,难挽大厦于既倒。由此可见,一时之兴不等于长久之兴,制度才是国家兴衰的关键。比照当下,如果我们没有长远的历史眼光和宽广的世界眼光,不继续扩大开放、深化改革,勇于自我革命,而是自我封闭,以中国特色之名,行抵人类文明之实,孤芳自赏,拿着半截子改革成果沾沾自喜,谁又能保证不出现“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悲剧呢?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必然要求。宪政、民主、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所必然要求的上层建筑保证。当下的中国,在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领域市场化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同时,必须加快与之配套的政治改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应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经过30年的改革,我国的经济基础已发生了很

大的变化,但政治体制还基本上是计划经济那一套,这样必然导致今天这种畸形的权贵市场经济。如果我们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真正的市场经济就无法建立起来,社会就谈不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今中国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已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社会健康发展的瓶颈,到了不得不改的时候了。正如小平同志指出的那样:“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虽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专制历史的国家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的政治体制并非易事,也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改革走到了今天,也容不得我们等待了。

### 改革开放的本质就是学习借鉴那些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文明;否定普世价值,要害在于它否定了改革开放的合理性、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否定了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对普世价值的贡献

推进改革开放,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也需要像经济体制改革那样,吸收、借鉴民主、法治、人权等人类共享的普世价值。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参照系是世界的,只有承认中国之外还存在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具有普世价值的人类共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改革开放才有合理性、正当性、合法性。否则,我们何必对外开放?又何必改革!

然而,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论调,那就是否定“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普适价值、共同价值、普遍价值大体上是同义的)。在这些人眼里,民主、自由、人权,甚至市场经济,都是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普世价值,所谓“普世价值都是资本主义辩护士用来欺骗群众和输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及社会制度的一种策略”。看来,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还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全然不顾当今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时代,全然不顾当今世界处于和平和发展的时期,全然不顾中国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现实,全然不顾当下中国共产党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

我们并不否认,市场经济、自由、民主、人权的概念诞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确实不是中国的特产,但都是人类创造的文明,都具有共性、普遍性和工具性,毫不例外具有普世价值。例如市场经济,不管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还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只要是市场经济,必然是大同小异,形式和枝节上可能不同,但本质是相同的——靠市场配置资源。否则,小同大异,对市场经济各有各的做法,各有各的表述,甚至硬把计划经济都说成是市场经济,那不乱了套,那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并不否认,出自利益、偏见或敌意,西方确实有些敌对势力利用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来说事,来宣传他们的价值观,对此,我们确实要清醒。但“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我们毕竟都是人类,这就决定了我们总有某些共同的人性、共同的社会发展规律;人权理念、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根源于此。我们不应忘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浩劫。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多元化的时代,那种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看成水火不相容的思维,那种“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都要反对”的观念明显是不合时宜了。邓小平就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我们也不否认,世界上确实没有人人都认同的价值观,但这并不否定世界上存在被绝大多数人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普世价值,例如《世界人权宣言》,就是不同国家的代表在联合国开会达成的共识,也是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的思想基础。普世价值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特殊包含普遍、个性包含共性、个别包含一般,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常识。用个性否定共性,用个别否定一般,用具体否定抽象,用特殊否定普遍,哪有半点辩证唯物主义的影子。按照这些人的逻辑,就可以得出“白马非马”、“司马北不是人”的荒唐结论。其实,这些人并非无知,只是别有用心而已,他们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改革开放。

我们还认为,目前世界上出现的一些现象乃至乱象确实影响到了人们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的看法,对此应该有清醒的认识。诸如,其一,不能把发展经济当做民主的主要功能。有人以台

湾经济的恶化证明民主之过。实际上,民主的首要功能是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其次是自我纠错,而非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一定时期,民主与经济绩效没有必然联系,经济增长自有其变量,不能认为经济落后、放缓、恶化就一定是民主等政治制度的“错”。如我们不能因香港回归后经济一度不如从前,就怪罪于“一国两制”。从长远看,民主自由对于经济繁荣、政治清廉、社会稳定,起着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的作用。其二,不能把民主化过程中的“乱”看做是民主本身之“罪”。有人以泰国“民主”的混乱证明民主在亚洲应该缓行。实际上,泰国并不是一个已经“民主”了的国家,其王室、军队、文官三权共治的局面几十年未有彻底改观,尤其是军人干政的顽疾未除,因而是一个“准民主化”或“有限民主化”的国家。历史表明,民主化的路上或多或少都伴随着混乱、动荡,但不民主的代价更大。其三,不能张冠李戴,把民主自由操弄者的“恶”当做民主自由的自身的“恶”。有人以美国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侵略他国、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行径,证明民主自由的“恶劣”。依此逻辑,是否因为法西斯国家用坦克大炮屠杀世界人民,正义的人们就要拒绝坦克大炮,而用大刀长矛去斗争呢?其四,不能“宽以待己,严以律人”。有的人眼里容不下民主自由的一丝不足,一旦实行民主自由的地区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就认为民主自由“不过尔尔”。实际上,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但却是最不坏的制度。面对民主自由的“出错”,我们不是要污蔑它、拒绝它,而是要更清醒地认识到它的不足和可能导致的危险,从而用其所长,避其所短。

中国共产党承认和肯定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早在延安时期,我们党就高举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旗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等撰写的一系列关于自由、民主、和平、人权的宏文至今依然散发着不朽的人性之光、文明之光,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赢得了民心,推翻了专制独裁的国民党政权。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也逐步接受了民主、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1997年10月和1998年10月,我国政府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表明了我们认同了国际上关于公民基本权利、义务的普世价值。

2003年,胡锦涛访问澳大利亚时指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2005年《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这一胜利,挽救了人类文明,避免了历史倒退,广泛传播了自由、民主、平等、公正、和平的基本价值。”2008年5月,胡锦涛访日的“暖春之旅”结束的时候,中日发表“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为进一步理解和追求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和普遍价值进行紧密合作,不断加深对在长期交流中共同培育、共同拥有的文化的理解。”这个声明可不是一般的声明,而是国策声明。去年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更为详细具体地强调:“民主、法制、自由、人权、平等、博爱等等,这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这是全世界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共同形成的文明成果,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十七大报告也采纳了很多具有普世价值的概念,包括市场经济、民主、自由、公正、法治、人权,过去这些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东西,现在都纳入到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去了。等等论述,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宣示,也是对我国改革开放30年成功经验的一种总结。因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实际就是一个吸取世界先进文明成果的过程,一个融入普世价值的过程。

应该强调的是,中华民族、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人也向人类的普世价值做出了重要贡献。过去,我们常说,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不是普世价值又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倡导的自由、公平、正义,“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改革开放”,“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等等,都具有普适性,都是普世价值;中华文化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等也是普世价值。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当务之急就是要大力宣传弘扬这些普世价值,因为普世价值是所有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因而必然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基石;抛弃了普世价值,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责任编辑 吴 思)

# 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 应克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进步不仅表现在经济的快速增长,国民生活的明显改善,还表现在思想观念的深刻变化。现在,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的概念不仅频频出现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讲话中,而且也载入国家宪法、法律以及数届党代会的文件中,可称普世价值已入宪入法入文。我因此想到,时下个别“专家学者”对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的责难与批判,不是与宪法、法律与党的文件较劲吗?

自由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面旗帜。《共产党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那段名言早已众所称道:“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一生的著述以及执着的追求,无不是为了人类的自由解放。这段名言问世于1848年,至今(2008年)正好已有160年了。令人感到不可理喻的是,那些批判普世价值的人,对马克思主义念念有词,对马克思的这一名言为什么置若罔闻?

自由一直是人类进步思想家探索的理想王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也可以说流派纷呈。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排斥于自由主义之外。在西方,习惯上把由洛克奠基的自由主义思想称为自由主义,马克思也称洛克为自由主义的鼻祖;不过倡导自由主义思想的不仅仅限于这一派别的自由主义者。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在崇尚自由的价值与追求自由的目标上是一致的,但对于如何实现自由的途径则有着某些差别。这种差别笔者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现阐述于下,与同道切磋。

第一,现实的自由与未来的自由。马克思认

为,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每个人,特别是受剥削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获得自由,只有消灭“资产阶级旧社会”,只有阶级消灭、国家消亡、对抗消失之后,在“一个联合体”里,每个人才获得了自由的条件。可见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不是现实的、此岸世界的自由,而是未来的、彼岸世界的自由。因为在现实社会制度下不可能获得自由,你要争得自由,就得去革命,推翻现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为美好的未来而奋斗。所以,马克思的自由观首先把人们引导到革命。自由民主主义则是向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的现实去争取自由,它立足于现实,去一点一滴地、一步一步地去争取自由,扩大自由。不能一味地寄希望于未来。不能认为革命成功了,大家就全自由了。自由不是一次性的批发,不可能一步到位,有一个逐步扩大和提升的过程。这种自由观(应当说是争取自由的方法)是切合实际的。马克思的自由观带有一种宗教色彩(尽管他是反宗教的)。因为宗教总是将人们的幸福呀,自由呀这些美好的憧憬都寄托于来世,天堂,天国;马克思则寄托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为了进入天堂或来世的幸福,宗教要人们从善,积德,忍耐。马克思则号召人们以暴力摧毁旧世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与一切宗教相区别的。

第二,国家的自由与无国家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始终是指国家存在条件下的自由。社会不能没有公共权力,有公共权力就会有国家;而行使公共权力的国家往往会超越权力边界侵犯公民的权利。自由主义所讨论的问题就是国家既要尽职,又不能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权利。所以,自由主义就是关于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关系的一种学说。马克思则认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机器,有国家就不可能有自由。只有阶级消灭,国家

消亡,才能有自由。也就是说,自由在国家消亡之后才能普降人间。所以马克思提出了“联合体”的概念,以有别于国家。但“联合体”是什么样的组织机构?其功能和职责是什么?它同国家有什么区别?这一切马克思没有说。要说,也难免会有空想的成分。可是,人类社会总得有公共管理机构呀!不管你称它为什么:政府,国家,共同体,联合体,等等。只要有这个机构存在,就存在公共权力,就存在这个机构与它治理下的公民之间的关系。如果认为这种机构的存在也不能使公民获得自由因而也必须加以废除,那么,人类不是陷入了无政府状态的恐怖景象,或回到史前的蛮荒时代?马克思的自由观中存在这种令人困惑疑团,是他把国家概念狭隘地定位于阶级压迫的机器所致,也因此,他的自由观给人以一种虚幻飘渺的感觉,远不如自由主义的自由那么现实与实在。

第三,个人的自由与集体(一切人)的自由。自由主义的自由仅指个人自由。如同贡斯当所一再强调的,“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它不顾及集体自由与国家自由。马克思的自由其内涵包括:1. 个人的自由发展;2. 个人的自由发展与集体(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关系。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从语义来看,可理解为个人自由是集体(一切人)自由的基础(条件),但也可以理解为个人自由是为了集体自由,个人自由是手段,集体自由是目的。因此,个人自由应当有利于集体自由,服从集体自由,亦可推理出:为了集体(一切人)的自由应当限制乃至放弃个人自由。结论是集体至上,国家至上。因为马克思限定了“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在现实性中存在两种可能性:个人自由可能有利于一切人的自由;个人自由也可能不利于一切人的自由。这后一种情况是绝不允许的。但是,我们用什么尺度以及由谁来判断个人自由是利还是不利于一切人的自由呢?当然,这样的问题只有在非民主的制度下才会向人们提出,在民主制度下个人自由只要不超越法律的边界,不需要别人说三道四,也不允许政府加以干预。还有,应当特别当心的,“一切人”是指什么呢?对于某一团体的成员来说是“集体”,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是“国家”,而

且只能是“国家”,因为人类进入大同世界还是遥远的梦想。因此,只有国家才有资格代表“一切人”,比如,国家领导人可以这样说:我代表中国政府,代表中国人民……于是,所谓个人自由应有利于“一切人”的自由实际上是:个人自由应有利于国家自由。

对马克思“自由人联合体”思想的新思考虽发觉其中的一些疑惑,但并不影响它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享有重要地位。1894年1月,意大利创办了《新纪元》周刊,两位记者要求恩格斯“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述未来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恩格斯在回信中坦言:“要用不多几个字来表述未来新时代的思想……这个任务几乎是难以完成的。……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恩格斯摘出的就是《宣言》中“自由人联合体”那段54字的名言。(高放:“恩格斯概括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北京日报·理论周刊》,2008年9月22日。)在这段名言中,马克思崇尚自由,向往自由,视个人自由为社会的理想目标,是一望而知的。这应当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只是面对当时的制度,认为有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在实现自由的途径上,有别于自由主义。总起来说,马克思和人类进步思想家一样,都视个人自由为人类最高的价值理念;区别在于马克思认为,要获得自由,到达彼岸世界的自由王国,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可见,革命和专政只是实现自由的手段。遗憾的是,后人竟把手段当目的加以“坚持”,而自由的崇高目标却弃若敝屣,横遭批判,这岂不哀哉!

(责任编辑 萧 徐)

## 本刊更正

本刊2008年第10期《通渭问题》两处“宋良成”,蒙赵友慈老师,读者牛兆奇等同志指出,应为“孙、梁、陈”(即孙作宾、梁大钧、陈成义)。同期第2页右栏第12行“打到”应为“打倒”;第34页左栏第14行“哈而滨”应为“哈尔滨”;第51页左栏第3行“国务卿基辛格”应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任基辛格”;第53页左栏第13行“布拉格维申斯克”应为“布拉戈维申斯克”;第54页左栏第5行“会晤”应为“会晤”;第58页左栏第8行“发改委”应为“国家计委”;第62页图片说明“曾建辉”应为“曾建徽”;第68页右栏第11行“第二杭州会议”应为“第二次杭州会议”;第79页右栏第2行“反映出未”应为“反映出来”。

# 清华附中红卫兵 100 天

● 阎阳生

作为红卫兵运动的始作俑者，清华附中红卫兵已成为一个专用历史名词。但它从 1966 年 5 月 29 日圆明园定名公开反对校领导，在 6 月 24 日贴出“造反精神万岁”对抗工作组，于 8 月 1 日毛泽东回信和 8 月 18 日天安门接见达到高峰，继而在 8 月 27 日“暴力恐怖”中发布《十点估计》后脱离主流并迅速衰败，其独立的生命期不过百日。

但也就是这 100 天，“红卫兵”席卷全国震惊海外。所以，让我们把目光穿过历史的时空，浓缩到 1966 年清华附中红卫兵的 100 天。

## 背景和伏笔：两园环拱精英竞争的清华附中

1966 年，随着国家经济的全面好转，党内郁积的政治矛盾终于浮出水面。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在我们身边。而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而在北京偏远西郊的清华附中，雄心勃勃的校长万邦儒却正在把一场方向相反的教育改革推向巅峰。其最重要的标志是前所未有的北京的两届预科的创立，和在北京市中学生运动会的四个组别中夺得三项冠军。

与北京市的其他中学统归北京市教育局管理不同，清华附中是清华大学直接领导的。预科的教材由清华大学编写，主课全由大学讲师任教。上了预科等于一只脚踏入了清华大学。当时，清华附中已成为北京市收分最高的中学，预科的选拔使原本已成为学生信条的个人竞争更激烈了。

清华附中地处清华等八大学院和高等军事院校环绕之中，高级知识分子出身和具有知识背景的中层干部子弟是其核心。个人奋斗和藐视权威是中产阶级知识背景的两派的共性。

高二的干部子弟杨盘、阎阳生、邝桃生、张承志组

织了“红缨”小组，准备跳级参加高考，并为此出了一种既有难题解析又有时事辩论的手写小报。几乎与此同时，以高二的周舵为代表的教授子弟也办了一份手抄小报，其内容更时政也更隐晦，在高知子弟中传阅。

地处清华园和圆明园环拱的清华附中，深受美国式的竞争精神个人主义的熏陶和义和团式的民族沧桑感的笼罩。后来成为著名影评家的方位津认为，圆明园已是两派共同的胎记。

清华附中校领导大多是资产阶级和民国旧吏家庭出身，城里中学的“四清”使他们内心震撼。从 1964 年开始，学校组织了“干部子弟学习小组”和军训队。对干部子弟的拔苗助长引起了平民和高知子弟的反感和不服。

1964 年由于一次偶然的同学争斗演变成全校“阶级路线”的大辩论。万邦儒校长把娄琦（平民子弟）和熊刚（干部子弟）的动手，上升到“打干部子弟”的“阶级路线”高度，引起高知子弟的不平。两派的大字报互不相让，竟贴满了半个大饭厅。

最后虽然学校强势出动以双方认错平息了风波，但一道“阶级出身”的鸿沟把学生分为两派。各班团支部的发展会也成了两派斗争的焦点。比如后来红卫兵的主要发起人王铭的入团就几经周折，几乎要上告中央。郑光召回忆：两派据理力争，互不妥协，连外班的同学都挤进我们教室来“观战”。直到最后举手表决，差一票也不行。

## 1966 年 5 月中至 6 月中（创立期）：对抗学校领导代表的教育路线

1966 年 5 月中旬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成立中央文革小组。5 月 25 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直指校领导陆平的大字报在学校撕开了“文革”的序幕。

5 月中：对校领导态度的两派对抗

几乎与此同时，清华附中也从空泛的文艺辩论开始对于学校教育方式的评判。最明显的是预科651班干部子弟骆小海等的墙报，其公开对学校领导的质疑引起了学校的紧张，把他称为“预651观点”组织批驳。

当时学校的乒乓球队队长仲维光回忆道：“我们和高631班郑光召、宋海泉和戴建中等人（高知子弟）也形成了一个小组，经常在一起摸索对方的动向，商量对策……和他们（干部子弟）在暗中对抗。”拥护学校领导的声音占有绝对优势。

据卜大华回忆：这时清华附中党支部已列了一个“闹事学生”的名单上报清华大学党委，并在当地派出所备案。学校党组织还分别到这些学生家，以五七年“反右”为暗示，让家长管教学生。

1966年5月下旬，在学校的压力和学生的孤立下，高中几个班级反对校领导的骨干开始秘密串联。仲维光回忆：他们开始在熄灯后跑到圆明园去秘密碰头，商量如何在学校掀起运动；而且居然男男女女不在教室，直到半夜才回宿舍；（我们）一听到他们密谋反对校领导，立即汇报上去。此时，校领导只好依靠平民子弟，以期自我保护。

## 5月29日：红卫兵成立

关于红卫兵成立的日期，海内外两派的文章几乎都认定是1966年5月29日。骆小海：“5月29日下午，在圆明园召集各班不同政见者骨干分子开会，正式通过了‘红卫兵’的统一署名。”郑光召：“5月29日一批干部子弟在与学校一墙之隔的圆明园集会，成立了举世闻名的青年法西斯别动队——红卫兵。”

但几个红卫兵主要创始人对此不以为然，卜大华：“在那一天，并没有明确成立红卫兵，主要是统一行动。”王铭：“是一个非常松散的、有相同政治倾向的一些人的聚合。”

目前最原始的记录是宋柏林1966年6月3日的日记：“……中午我们‘红卫士’的一部分战士到圆明园去开会，正式建立起组织机构，订好了反攻计划。”但此时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已经贴出。

关于红卫兵名称的来源，张承志在他的日文书中有回忆：“我在班里写的小字报上的署名就是‘红卫兵’，并用红铅笔画了一个骑马的战士的图像。”笔者清晰地记着这个“红卫兵”图案。

笔者的记忆是，5月29日是各班的反对派统一行动的协调会。6月1日傍晚在圆明园开会正式采用“红卫兵”作为统一名称，并决定以此名义贴出大字报。各

班的代表决定把5月29日定为“红卫兵”的成立日，一是因为那天是第一次统一组织会议，二是自负地认为我们的行动是在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之前。

## 6月2日：红卫兵署名大字报

6月2日，第一张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死保卫毛泽东思想》出现在五楼大教室。虽然大字报只是亮相式的激昂口号，但已鲜明地向校领导挑战：

……资产阶级的老爷们，你们既然挑起了这一场斗争，那么好吧！我们来者不拒，坚决奉陪到底，不拔掉黑旗，不打垮黑帮，不砸烂黑店，不取缔黑市，决不收兵！……

红卫兵

1966年6月2日

这张大字报的下部除了红卫兵核心的签名外还留有一大块空白，是给同意大字报观点的人签名用的。当天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的有100多人。但拥护校领导声讨红卫兵的大字报立即贴满四周，也形成了大批的签名。

后来的工作组组长刘晋回忆：“学校当局召开紧急会议，组织学生写大字报进行反击。因此，几十个同学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处于孤立状态。”但当时学校的书记韩家鳌回忆说：“对红卫兵这事，我们就是觉得那个太突然了。我们都来不及想，是怎么回事？我们就知道是干部子弟（在闹），就想他们是不是有什么意图？”

但在红卫兵大字报上签名的有不少出身自由职业者的学生，而拥护校领导的很多是担任党团干部的干部子弟。当时初二的史铁生曾画了一幅一耳大一耳小的漫画，讽刺红卫兵偏听偏信，受到校长的私下鼓励。

但有两个人的参与给处境孤立的红卫兵极大的支持。一个是被学校树为标兵的学生党员干部马云香毅然在红卫兵的大字报上签了名，使苦心培养的学校党支部十分难堪。而五七年大右派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独立贴出大字报批判校领导，无意中与红卫兵形成呼应。

## 6月8日：外校驰援清华附中

1966年6月6日开始，城里的四中、十三中等学校和海淀区八大学院附中的学生络绎不绝地来到清华附中，声援红卫兵。当时在教育系统内部对清华附中闹事红卫兵的通报，成为各中学领导压制不同意见的武器，但反而使各校的反对派知道了红卫兵。“6月8日，

在学校西侧通往体育学院的路上突然黑压压的一片,出现了近百位骑自行车来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的干部子弟。校领导哪里见过这种阵势,怕出事关了西校门。”(郑光召回忆)

韩家鳌回忆:“有一帮学生要冲过来,什么人大附中的,还有四中的……薄(一波)家兄弟。我那时做书记,就站在校门口一个课桌上,说我们搞什么活动都是要按照学校的安排。一方说‘往里冲!’,一方说‘不行!’也就开始推推搡搡的。”



事后进驻的工作组给团中央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清华附中)红卫兵,从此殃及全国的汇报是仅存的文字材料:“6月8日,外校300多人来声援左派,被拒之门外10小时,并调来大学部的打手——校卫队,请来海淀分局的便衣队,企图镇压群众运动。6月4日,团中央派2人来了解情况,被盯梢、偷听。”

宋柏林6月5日的日记中留下了另一个线索:“王铭找了孔原,熊钢找了薄一波,还找了许多其他的老干部,都坚决支持我们干革命。”

激烈对峙的双方在大门内外贴满了色彩激昂的标语和大字报。四中送给清华附中红卫兵一幅对联是:“先驱者,为革命,洒尽碧血;后继人,保江山,掏出红心。”

针锋相对的代表是工人出身的清华附中高三女生宣夏芳,她高声朗读了以“宣战”名义贴出的大字报《致×中的干部子弟们》:“什么是红卫兵,是反动组织黑卫兵”,“你们后面是靠不住的冰山”,“我们要用鲜血保卫党支部,保卫党!”

但这时清华附中两派都不知道,在6月3日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团中央书记胡克实领受了领导北京中小学文化革命的任务,决定向重点学校派遣工作组。

## 1966年6月中至7月底(发展期):对抗工作组代表的传统体制

6月8日:工作组进校,宣布支持红卫兵

6月8日晚上,团中央派出的工作组进驻清华附

中。工作组一共5人,多是在中央团校学习的各省市骨干。工作组组长是章建华,但实际掌权的是中央团校哲学室主任刘晋。

身兼海淀区工作队副队长的刘晋戴着眼镜表情严峻,第二天晚上即召开全校大会明确支持红卫兵是坚定的左派,并宣布学校领导班子靠边站交待问题。形势的突变使大操场一片愕然,红卫兵随即以胜利的姿态贴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下团结起来》的大字报。

学校的大字报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工作组在随后的汇报中对此颇为得意:“到目前为止,全校师生已贴出20000多张大字报,揭露了一批严重问题,揪出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初步开展了批判斗争,大煞了牛鬼蛇神的威风。工作组进校时,右派势力气焰嚣张,左派力量孤单,左派学生仅101人,占学生总数的8%;左派教师2人,占教职工总数的1.7%。目前,左派学生已增加两倍,占全校学生总数的13.9%。”

刘晋在40年后告诉笔者:6月8日当时主持团中央工作的胡克实打来紧急电话,让他带工作组去清华附中支持红卫兵,并要求他每天晚上9点用直线电话汇报情况。

### 6月中旬:批斗校领导和成立革委会

从6月17到20日全校开始在工作组的主持下三次批斗万邦儒和其他校领导。刘晋回忆道,他当时宣布:“对学校领导万邦儒只准动口不准动手。”

在这三次批斗中,万校长只低头,但是不认罪。万

邦儒在文革前后都被两派公认为独特的教育家，络腮胡子口若悬河充满魅力。看着自己苦心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对过来争相批判自己，他的痛苦可想而知。

有两个实质性的事情给了万邦儒及支持者致命的打击：一是6月17日中央决定暂停高考，这让以投考一流大学为唯一目标的高知子弟顿时感到“五雷轰顶，一片黑暗。”（周舵）“甚至烧毁了自己所有的课本。”一是6月20日宣布万邦儒撤职反省，让万邦儒认为运动只是一阵子的幻想破灭了。主管附中事务的清华副教务长邢家鲤也被揪到附中批斗。

6月21日，全校召开全体师生大会选举革命委员会。但当工作组在人选上要求有更大代表性时，遭到红卫兵抵制。结果21个革委会委员基本由红卫兵核心组成，王铭当选主任，张晓宾、卜大为为副主任。虽然在那种情势下是一面倒的高票当选，但昔日占据舞台中心的高知子弟看着这些其貌不扬的干部子弟走上主席台，内心感其“个个面目可憎”。

这时工作组才感觉到红卫兵并非是一群随意摆布的中学生，已表现出强烈的权力意识。他们不可能容忍在正统的党组织之外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开始筹建新的分团委以取代革委会。红卫兵头头的碰头会又回到圆明园。

当时红卫兵并不知道工作组的做法直接来自中央。6月下旬，胡克实传达了刘少奇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认为工作组已控制了局面，提出“复课闹革命”和“消化红卫兵”。

## 6月24日：《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

6月23日，团中央的《中国青年报》发表社论《左派学生的光荣责任》，强调左派要服从工作组团结大多数。红卫兵随即在6月24日贴出两张大字报公开进行反击，一篇就是后来震动中央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这篇贴在教学楼一楼门厅正中的大字报，第一句话就提出了一个骇人听闻的观点：革命就是造反！“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

这篇充满激越口号的文章由红卫兵才子骆小海执笔，后来被一再模仿变成文革时代的新八股。但最后的结尾“……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明眼人一看就是针对掌权的工作组的。但工作组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只是觉得在共产党的天下提倡“造反”匪

夷所思。

当时狡黠的红卫兵故意留了一个破绽，没有点明这段话的出处。工作组果然上当，写了简报上报，一直报到刘少奇党中央那里，被定性为“反动”。实际上这句话缘自6月9日《人民日报》第六版的一篇不起眼的短评《汉弗莱的哀叹》。它引用了毛泽东在延安时代给斯大林祝寿时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没有人注意到这句隐含在边角评论中的支言片语，但嗅觉灵敏的红卫兵马上捕捉到了。

当高二的红卫兵刘刚、张树平等把这张“造反精神万岁”大字报抄到清华大学时，给了当时被清华工作组压制的蒯大富以极大的支持。但遭到拥护工作组的主流学生愤怒围攻，甚至到清华附中要求“逮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小集团红卫兵”。

6月26日，胡克实听了刘晋的汇报后，认为红卫兵“相当不懂事”，“能不能把党团组织恢复起来，把红卫兵消化在党团组织之中”。（卜伟华摘自清华附中工作组1966年6月27日简报。）同时其他许多中学的红卫兵被宣布为非法，清华附中再次成为内外瞩目的焦点。

但当红卫兵在7月4日《再论造反精神万岁》正式引用毛泽东的这段语录时，工作组已被拖入非常被动的境地。老练的工作组一方面突然成立排除了激进红卫兵的分团委，由自己担任正副书记取代了红卫兵掌握的革委会；一方面迂回拜访红卫兵头头的家长采取怀柔分化政策，并于7月17日把208名红卫兵骨干拉到沙城兵营封闭军训，逐渐夺回了主动权。

## 7月20日：《阶级路线万岁》和批斗升级

尽管工作组和红卫兵出现矛盾，但在批判学校领导上是一致的。除了全校的批判大会外，各班都开始批斗老师，并且扩大到“右派学生”。在宋柏林的日记里记录了7月5日批斗团委书记顾涵芬、7月11日批判班主任丁淑慧、7月20日批判学生郑国行。

批斗会由各班的红卫兵核心小组发动，这些未经世事的学生对组织批斗会却并不陌生；学校领导给他们入学的第一课就是去参观清华大学的“反右展览”，现在反过来自食其果。班主任被争先恐后的学生围在中间，任何辩解都会招来更激烈的呵斥甚至墨水和浆糊。

7月1日北京大学附中“红旗”纪念建党日，“邀请上提出苛刻要求，一律是干部子弟，而且尽量穿黄军装。”（宋柏林日记。）这个等级森严的晚会首次唱出了

《造反歌》。7月20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激进派“齐向东”写出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万岁》的大字报并在全校广播。也就是在这天他们开始批斗本班四个出身旧阶级的“右派学生”。

#### 7月下旬:与工作组摊牌

这时红卫兵内部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冲击:红卫兵第一把手王铭的父亲受到批判,而他跑到现场阻止了揪斗他爷爷的批判会。王铭的父亲王仲方曾任已被打倒的罗瑞卿的公安部办公厅主任。胡克实要求刘晋借此机会迅速解决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问题。

7月24日晚上,双方班子的全体成员在教学楼办公室正式摊牌。此前工作组已经无法容忍红卫兵的我行我素,工作组的小叶曾冲进广播室,撕掉了红卫兵擅自播音的广播稿。据刘晋回忆: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交锋中,胡克实三次打来电话,要求他直接点出王铭的问题,击垮红卫兵的软肋。

进进出出的刘晋几次提起话头,又都咽了下去。一是发现王铭还有群众基础,二是他发觉红卫兵班子意外团结,一点名必然局势无法收拾。尽管刘晋在上司胡克实的质问和下属章建华的催促下几次拍案而起,但根据自己二十几年群众运动的经验,终于没有点名。

而红卫兵为这次摊牌做了充分沟通,策略地让王铭退出一线,以免让工作组抓住把柄。会上由卜大华据理力争,由张晓宾回旋底线。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在刘晋被叫出去接胡克实电话的时候,人大附中的徐浩渊跑来告诉了卜大华一个小道消息,“团中央已经把胡启立揪出来了。”两个都自以为摸了对方底牌的对决胜负难分。会后刘晋把风传胡启立倒台的消息报告胡克实时,胡还认定是红卫兵的谣言,命令刘到清华附中召开大会辟谣。

7月27日几乎同时发生了三件事。正在北展剧场的中学生代表大会上做报告的海淀区中学工作团团长周捷,被匆匆赶到的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当场宣布罢官。清华附中红卫兵当即贴出《三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而彻夜未眠的刘晋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要和红卫兵翻脸的辟谣大会。

7月28、29日:江青、胡耀邦、刘邓、毛泽东和红卫兵

7月28日晚,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展览馆电影厅召开大会,宣布撤销海淀区各中学工作组。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骆小海、邝桃生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和《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两篇大字报稿和一个条子递

给了主席台上的江青。这封给毛主席的短信大意是:有人说这两张大字报是反动的,请您老人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反动的张大字报。江青当场答应一定给带到,并在上汽车前回身向红卫兵喊道:我支持你们!

几乎与此同时,胡克实带着刘晋、周捷等到正从西北回京看病的胡耀邦家。和忿忿不平的客人相比,胡耀邦没有多说话,只是让他们沉住气观察观察,并“让克实立即向小平同志汇报”(刘晋回忆)。那时很多学校已开始打骂和驱赶工作组。

胡耀邦的次子胡德华当时就是清华附中高一的学生。他后来告诉笔者,那段时间他父亲很无奈,也看了那两篇造反文章,还问胡德华看过毛主席的《反对党八股》没有,“你们那个造反精神万岁啊,你看像不像?”

这里有个更大的背景当时无人知晓:7月16日在南方的毛泽东在武汉高调横渡长江后,已于7月18日悄然回到北京。在7月29日人民大会堂的接见左派学生的大会上,在刘少奇邓小平承认派遣工作组不妥,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后,毛泽东突然从侧幕后走上主席台。张晓宾等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代表几乎不相信眼前领袖云集太阳升的场景。

### 1966年8月初至9月中(掌权期):对抗党政机构代表的社会秩序

#### 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的信和红卫兵掌权

这时正在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放了毛泽东8月1日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精神大字报和北大附中彭小蒙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这成为毛泽东对文革和刘邓派遣工作组的第一次公开表态。

但原信当时及以后都未交至清华附中红卫兵手中。王铭、卜大华8月3日从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那里看到手抄件,红卫兵无疑得到了尚方宝剑。

清华附中红卫兵开始独立掌权,年龄最大的也不过18岁。他们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学校:拉回了军训的红卫兵,按“巴黎公社的原则”不记名投票重选了革委会,组织全校武装横渡昆明湖,到圆明园参加劳动,把学校改名为“红卫兵战校”,并准备迁校黑龙江。

但失去了学业支撑的“乌托邦”很快烟消云散。失去工作组目标的红卫兵又对准老师和同学。清一色干部子弟的革委会使平民出身的红卫兵元老寒心。带着烫伤的方位津泗到湖心几乎绝望。劳动晒红皮肤却抹

不去出身的阴影。迁校的恐慌使大批档案遗失殆尽。

但很快这些烦恼就被社会上“破四旧”的浪潮所淹没，“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吼声冲进围墙。领潮流之先的清华附中红卫兵眼看被抛出激进主流之外。

## 8月中：“对联”辩论到“破四旧”

在8月6日天桥剧场的“对联”大辩论中，主张理性的清华附中红卫兵联合几个附中发出了不要打人的“紧急呼吁书”。不料《呼吁书》报入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批评，认为这是压制群众运动。据说北京四中红卫兵负责人曾列席中央高层会议。他们8月13日在工人体育场的大会上明确反对清华附中，并散发了批判《呼吁书》的文章《你们的屁股坐到那里去了》。

西城区中学为首的多数派坚持要在大会上斗争伤害了红卫兵的小流氓。清华附中则主张以控诉工作组和团中央为主题。最后不得不投票表决，清华附中明显处于劣势。结果最后由负责学校文革的王任重出来打圆场。大会由李富春代表党中央宣布胡耀邦为首的团中央书记“三胡一王”停职反省，所谓小流氓也被警察押到十万人体育场的跑道上，接受皮带和拳脚。

当目瞪口呆的胡德华拼命骑车从工人体育场赶回家时，胡耀邦已被团中央的红卫兵押走。他一夜之间变成了“黑帮子弟”。

## 8月8日：Y卧轨事件

但在清华附中，各班对学生的批斗不断升级。高一才貌出众的女生Y由于不堪红卫兵的轮番批斗，在8月8日晚上跳窗逃到圆明园，然后到五道口冲向驶来的火车。当“四个邮电学院的大学生穿过铁路时，发现铁轨边的一个蜷屈的人，浑身是血在草丛中翻滚呻吟……”命运之神并没有收下这个17岁的花季少女，火车司机看到一袭白裙迎面扑来，紧急制动。

关于她卧轨的原因众说纷纭。Y四十年来拒绝一切采访，只记得那天晚上，“大学里到处挂满大字报乱哄哄的，后来才知道那天在庆祝发表十六条。”“我只想躲起来，找个清静的地方，找一个没有人迫害的地方……”

清华附中红卫兵8月16日参加围攻团中央。晚上“把胡克实押回学校，‘借’来斗争。”但宋柏林在8月17日日记中承认“这次大会开得很没底。”

## 8月18日：毛泽东天安门接见红卫兵

卜大华回忆“八·一八”：“清华附中七八百人，半夜两点钟从学校发车，去天安门参加庆祝‘无产阶级文化

大革命胜利大会’游行。当时（卫戍区）姓白的副司令把我一个，彭小蒙一个，叫进天安门说：毛主席要把红卫兵请上天安门照相。”

分配清华附中40人，名额最多。但只上去了27个人，留下了23人。因为规定任何家庭有问题的人都不能上去。没上去的人有叶侨生，他父亲刚给揪出来了。王铭不在学校，被他爷爷的事给缠住了。张承志、邝桃生到外地串联去了。但平民出身的陶正也被留下。

一上到天安门就乱了，所有的中央领导都在。只有周恩来跑来跑去，一面要鼓舞情绪领大家唱歌，一面要维持秩序分批和毛主席照相。阎阳生和杨小燕跑到正中央，两边是林彪和刘少奇。阎阳生当天的日记还记录了这样一幕：当他们告诉刘少奇“我们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时，“刘主席听不懂，连问了好几次”。后来才知道，正是前一天，刘少奇在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的中央全会上被迫退出党中央核心。

而这时更大胆的骆小海、宋柏林和韩钧，忽然发现毛主席正在休息厅里面坐着，“我们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紧紧地握住主席的手：‘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主席风趣地说：‘万寿也有疆嘛。’我们问：‘您给我们写信了？’主席说：‘还是草稿，还没给你们呢。’我们说：‘我们要永远造反，造反到底。’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

以上摘自宋柏林当天的日记。第二天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照片登在所有大报的头条，红色浪潮迅速蔓延到全国。

## 8月下旬：校园暴力和刘树华自杀

八月的北京已开始笼罩着一种躁动的狂热，“破四旧”已蔓延成群众的私刑。8月26日开始，发生了被称为“清华附中模式”的校园暴力。宋柏林在当天的日记里也有记述：“……回去后几乎各班狗崽子都被打翻在地，用皮带，竹条猛抽。”

被工作组圈定的四个“黑帮”中，我采访了除过世的校长万邦儒外的其他三位：

顾涵芬（女，团委书记，30岁）：红卫兵“把我的头剃了，弄的乱七八糟。然后就跪着那儿批斗我，有几个女同学拿着皮带抽我，拿皮带头打我，把我左眼打坏了。”

冯玉中（政治主任，支部委员，38岁）：“8月25日就是在五楼大教室，开始是文斗，后来就有动作了。我反正是打得够呛，就用皮带什么的打，皮带头。”

韩家鳌（党支部书记，副校长，34岁）：被逼着烧他送的“腐蚀工农子女的字典。一边把我的头往里面摁。

然后后面还有拿着鞭子、皮带的什么抽呀,打的后面皮下出血。”

所有挨打的老师都说,挨打最厉害的是万邦儒和刘树华。万邦儒作为头号“黑帮”校长,打得遍体鳞伤内脏出血。但刘树华只是一个兼任团委副书记的物理老师,由于以前学校把他感情生活的材料传出,他不堪轮番毒打和精神凌辱,爬上烟筒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暴力扩大到学生。最严重的是高 631 班郑国行、郑光召、戴建中等四个红卫兵的宿敌。“大多数人原来都是一派。许多人为拯救自己,只有拚命打,以此表现‘反戈一击’‘划清界线’”。(郑光召回忆)

### 8月27日:红色恐怖中的《十点估计》

全面暴力的直接导火索是8月25日,城里传来红卫兵被打被杀的消息,红卫兵顿时卷入了疯狂的复仇中。面对全北京如脱缰之马的“红色恐怖”,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肇始人于8月27日发表了一篇逆流而上的声明《十点估计》。

这篇声明一共写了十条,核心就是反对暴力。文章由几个头头连夜匆匆议定,由骆小海执笔汇总,总标题《红卫兵战校红卫兵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是卜大华定的,颇有点代替中央指点全局力挽狂澜的狂妄。

实际上在前一天,张晓宾和骆小海曾跑到钓鱼台向分管清华的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提出,中央能否制止打人。王表示,中央说话不如红卫兵自己说。这是因为当时北京街头已成为中学红卫兵的天下,根本不把党中央和新市委放在眼里。

第二天,《十点估计》印成大批传单,由张晓宾从他父亲的铁道部调来数十辆卡车分四路到北京市内进行大规模宣传。《十点估计》引起了城里主流红卫兵的不满,但在民间引起巨大的反响。传单被一再翻印,变成正式文告一夜贴满全城,继而传遍全国。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乎就在宣传《十点估计》前后,打人风潮也席卷清华附中,刘树华老师跳入烟筒,高二女生郭兰蕙服毒自杀。

对于《十点估计》,激进派说它背叛,受害者说它虚伪。这就是历史。但左右两派都肯定了它在疯狂“红八月”减缓暴力的作用。

### 9月:大串联和社会夺权

脱离了红卫兵主流的清华附中也难于应付繁杂的校务。红卫兵掌权的革委会决定:让红卫兵到全国去传播火种。最后干脆把办公桌摆到操场,给除“黑帮”和“反动学生”之外的师生盖章发放串联介绍信。

9月,正是以往学校开学的日子,清华附中却成了空巢和外地学生“朝圣”的接待站。陶正回忆:“干部子弟出身的红卫兵头头纷纷外出,我成了看守内阁。我被邀请到各个学校到七机部讲演,人们让我在语录本上签名。走的时候还喊‘向清华附中致敬!’”

在外省市,清华附中红卫兵几乎同时成了造反派的武器和当权派的稻草。在学校遭到红卫兵批斗的方位津说,在湖北,“把我当成北京红卫兵的代表,第一书记张体学还接见了我们,让我当了主播。那时全国对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都很神往。”

清华附中红卫兵那时确实成为各层各派的共同“财富”。刘刚在帮助蒯大富建立清华大学造反组织命名“井冈山”时,主语还是“红卫兵”。清华附中各派后来轮流掌权,也只是在“红卫兵”后注明派别。“四·四派”领袖程金香跟随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也是以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名义,而那几乎是文革时期中国唯一的出访。

但派系的更迭并没有使校领导逃脱厄运,轮流掌权的各派红卫兵“对学校领导的批斗成了各派表现自己革命性的暴力竞赛。”(郑光召回忆)

这时红卫兵的肇始人已感到自己历史使命的完结,成为没落的“老(红卫)兵儿”。对理想的幻灭和对武斗的厌倦,使他们浪迹于山水“行千里路,读万卷书”。宋柏林日记中长长的书单囊括古今中外,王铭开始同时自学三门外语,并和阎阳生一起成为北京大学德籍教授玛丽的关门弟子。

## 把客观的记述留给后代

“联动”的成立是老红卫兵的垂死一挣。干部子弟的大院文化也进入了“阳光灿烂”的弟弟辈打群架拍婆子的“血色浪漫”时代。

当毛主席一挥手时,整个一代青年都被发到农村。在“知识青年”的名称下共同面对黄土和油灯时,以往的理想和争斗成了过眼云烟。当邓小平恢复高考使他们十年后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时,“平等”和“竞争”成为这些饱经磨难的“老三届”共同的心声。

在一所著名高校的问卷调查中,竟有一半的大学生认为有必要再搞一次文化大革命。客观记述那段历史留给我们的后代,是我们的责任。

(阎阳生,1967年清华附中毕业,曾任北京科学院业务处长、全国工商联宣教部副部长、总编。)

(责任编辑 徐庆全)

# 我亲历的“潘晓讨论”

● 郭楠柠

《中国青年》杂志 1980 年 5 月至 1981 年 3 月开展的《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问题讨论(读者简称为“潘晓讨论”),可以说是当时思想解放浪潮中的一个浪头。我自始至终参与并且具体主持了这个大讨论。

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我在《中国青年》工作期间,曾经主持或参与该杂志多次开展的问题讨论,而“潘晓讨论”是我记忆最深刻的。这不仅是我的一次工作,更是我的一段人生,它包含着我在经历了“文革”的精神失落后,对生活理想和人生意义的痛苦思索和艰难寻求。我同参加讨论的广大青年一起思考,一起激动,一起感受探求的艰辛和感悟的愉悦。今年是实行改革的 30 周年,重提“潘晓讨论”,真实地、具体地回顾一下这个讨论的基本情况(包括我作为主持者当时的真实思想),该是不无意义的吧。

## 呼唤与寻求

“潘晓讨论”是 1980 年 5 月见刊的,而这个问题的酝酿和提出却早在半年以前。当时我是《中国青年》杂志的编委兼思想教育部主任(讨论开始后不久,改任副总编兼思教部主任)。我一直认为:组织“问题讨论”是《中国青年》历代编辑者在自己多年工作中辛勤实践、认真总结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好传统,是提出重大主题、抓思潮、引导青年自我教育的一种好形式。面对着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和青年心态,我认为,经历了“文革”十年停刊又复刊的《中国青年》尤其是思想教育部,抓住当时青年中一些重大的思潮性问题来开展讨论,以努力推动青年进步和社会发展,应该是责无旁贷的。于是,在结束了《在青年中可不可以提倡学习陈景润?》的“红专”大讨论之后,我又紧接着在思教部提出如何针对当时青年思想开展下一轮问题讨论的设想,并要部里的两位编辑马笑冬和马丽珍先做一些初步的了解和材料搜集。随后,马笑冬和马丽珍即从群工部的青年来信中提出了两个方

面的问题。一是怎样看待“讲实惠”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青年中是个思潮,一封读者来信阐述的观点有相当深度,也极具代表性,可以作为开展讨论的基础。二是人生观问题,当时也有不少青年来信。马丽珍主张讨论有关人生观方面的问题。我认为这个意见是可取的,人生观问题在当时青年思想中是更带根本性和更普遍的问题。但是,这还只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还不是一个有特定内容、可以开展讨论的具体选题。比如,我曾主持或参与的《人生的幸福是什么?》《人生的最大快乐是什么?》《什么是革命青年的理想生活?》等,都属于人生观方面的问题讨论,但特定内容却各不相同因而具体选题也各不相同。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和面对改革开放新形势的新一代青年人生观问题的特点是什么?问题的主要矛盾和核心是什么?应该确定什么具体选题才能承载这个讨论的特定内容?应该从哪个方面切入问题才能很好引发和展开讨论?等等,还须要进一步调查。我把开展人生观问题讨论和进一步调查的设想提到编委会和编前会上,得到了多数同志和社长兼总编辑关志豪、副总编辑王江云及其他编委的支持。于是,我同思想教育部的马丽珍、马笑冬一起做进一步的调查、研究。这可以说是“潘晓讨论”最初的工作班子。

以后三四个月时间,我们在机关、学校、商店、工厂等处,在干部、学生、教师、工人、科技人员……中间进行了各种层次的、多方面的座谈、探讨,同时还访问和请教了一些专家、学者。我参加了所有访问和大多数的调查会。在我和马笑冬、马丽珍一起参加的一次工厂、学校和商店的青年座谈会上,我感到马笑冬请来参加座谈的青年女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有相当的代表性。在交谈中,她对自己的观点无所隐瞒,愿意发表出来供青年共同探讨。她提供给编辑部的原稿 7000 多字,4 个小标题:“灵魂的鏖战”、“个性的要求”、“眼睛的辨认”和“心灵的惆怅”。文稿详细叙述了自己“文革”前后的不幸经历、信念破灭,自己当时处境的困难,自己的迷惘以及对

人生意义的追索等等。我认为,可以以黄晓菊的经历和思想作为基础,同时吸收马丽珍联系的大学生潘祎来稿中一些较有理论特色的语言和观点,再加上我们这一段时间调查的情况,综合整理一个当代青年探索人生意义的思想典型,以此引发讨论。我即请马笑冬按此要求起草初稿,我修改后签发。关志豪终审后同意发表,做了一些删改;王江云也同意。于是,征得黄晓菊和潘祎的同意,以“潘晓”署名给编辑部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加上《编者的话》,作为这场讨论的发端。

通过潘晓的信提出讨论的主要是三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对社会和人际关系的看法——“人都是自私的。”潘晓说。这是当时一部分青年的看法。潘晓曾经相信组织、求助友谊、寻找爱情,可生活向她展示了丑恶的面目。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给了她“深刻的启示”：“在利害攸关的时候,谁都是按人的本能进行选择的。没有一个人真正虔诚地服从那平日挂在嘴头上的崇高的道德和信念。”因此,她的结论是：“任何人,不管是生存还是创造,都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就像太阳发光,首先是自己生存运动的必然现象。照耀万物,不过是它派生的一种客观意义而已。”

其二,对“个人价值”的呼唤——十年浩劫,青年目睹了人的基本权利丧失殆尽,人的尊严被肆意践踏,人的存在连同人本身都无足轻重,毫无意义。于是,重新评价“自我”、“实现自我”就成了那个时代许多青年人重建人生信念的强烈要求。潘晓说：“我想写东西,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我个性的需要,我不甘心社会把我看成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要用我的作品来证明我的存在。”

其三,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这种失落感在当时青年中最为普遍。潘晓说：“我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过去,我对人生充满美好的憧憬和幻想。相信‘人活着就是为了使别人生活得更美好’。在日记里大大段段地写着光芒四射的语言。”可“文革”中,她目睹了抄家、武斗、草菅人命,“文革”后,又备尝了人际关系的虚伪和社会的冷漠,“为什么眼睛看到的事实总和头脑里接受的教育形成尖锐的矛盾?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这也是当时许多青年的提问。

从一开始,我们就认定,潘晓,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而是历史大转折初期阶段迷惘和追索中的青年的典型,“彷徨、苦闷对于麻木僵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社会进步的前夕,每一次大转折的开始,差不多都伴随着一场人生意义的大讨论,例如曾经



《中国青年》“潘晓”讨论书影

发生过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关于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俄国革命前夕关于人本主义和新生活的讨论,我国五四时期关于科学、民主与人生观的讨论。对这场讨论如何开展,作为主持人,从一开始我就明确提出几条:一要面对现实,讲真话;二要平等探讨,群众参与;三要实事求是,科学、辩证地分析和回答问题,不搞“两个极端”。“探讨人生,必须从讲真话开始。”这是青年的呼声。他们说:“真实,有时是丑恶的,但较之虚伪和粉饰要有力一百倍。”我很清楚,这次讨论与以往历次讨论有一个根本不同:以往提出讨论时,编辑部大都有了答案,该怎样引导,最后如何结论,都心中有数。这次却事先没有答案,不知最后如何结论,而是编者和读者共同来寻求。但我相信,在一场人生意义的坦诚的、平等的、科学的探讨之中,潘晓和类似潘晓这样迷惘中的青年,是会受到启迪,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上找到自己前进的路标的。我把这些想法写进了《编者的话》,表明了我们对潘晓的困惑的同情和对她坦诚发问的鼓励,点明了讨论的意义和我们的方针、原则,确定了讨论的基调。王江云审阅后批字:“我看可以了。”关志豪也同意这样发表。

就这样,在1980年的第5期《中国青年》上,我们在“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的通栏标题下,把“潘晓”的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连同《编者的话》一起发表出来,把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提给了80年代的中

国青年和中国社会。

## 两个没有想到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潘晓”的信和编者的话发表后,会引起如此空前巨大的反响。仅仅25天时间编辑部就收到各地青年寄来的信、稿18000多件,很多青年还寄来了钱和物,没有留下姓名、地址,只留下了对潘晓的期望……

他们说:“这是我第一次在别人那里听到自己心中的歌。虽然这歌声里充满了泪水和火焰,但它实实在在是我们心中最真实的歌。”

他们说:“由于这真实、这坦诚和它所蕴含着的理解与信任,《中国青年》为我们原本冷漠了的心房,投进一束温暖的光。”

……………

6月18日下午,胡乔木同志来到《中国青年》编辑部,这也是我未能想到的。胡乔木同志说:“这个讨论引起千百万人的关心和兴趣,我也是这千百万人中的一个。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凡是关心青年一代成长的人都应该有兴趣。”“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有什么不好……这表示他们对社会究竟还是抱着希望和信任。”“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的所在。这里最需要的是年长一代人的耐心和热情。”胡乔木同志还希望,这个讨论再放开一些,不要急于收场。

对于人生意义的讨论如何继续进行,关志豪和编委会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决定采取两项措施:一,扩大篇幅,继续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以推动讨论进一步开展;二,增加人力,强化编辑力量以保证及时、认真地处理每天涌入编辑部的大量稿件,使讨论的群众性得以更充分的体现。

于是,除了原来参与的马丽珍和马笑冬,在全社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又抽出各部门的编辑,增加了陈汉涛、陈群、杜文勇、王燕生、王彦君、崔维德、方延曦、邓捷、孙宏林、陈四长等,大都是各编辑部门的骨干编辑。仍由我负责主持讨论,领导扩大的工作班子。我又写了编者按语《写给参加讨论的青年朋友》,表明扩大和深入讨论的意图。文艺部副主任陈汉涛负责(崔维德和马丽珍协助)从数量巨大的信稿中选编出10600字的《信稿摘登》,把有代表性的各种不同观点提供给读者进一步

思考和讨论。人生意义讨论的篇幅由每期8页增加到16页、20页。发表了武汉赵林同志的《只有自我才是绝对的》等有相当思想分量的文章。

“人生意义的思考”唤起了万千青年的热情,群众性的讨论一直延续到年底。7个多月的时间编辑部收到全国各地各个方面不同身份、层次的人寄来的稿件达6万多件,其中不少还是几十名、上百名青年联名写的。大学生(其中不少是研究生)来稿的数量相当多,成为这次讨论的一大特色。

对于潘晓和她的观点,多数青年的回答是:有同感,但不能完全同意;同情,但希望她奋起。

从第5期到第12期,我们一共编发了110多位读者的110多篇稿件,近20万字。讨论期间《中国青年》的发行量上升到了390多万份。每一期《中国青年》在人们手中传阅,被“翻卷了边,留下了那么多的汗渍手印”。

## 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风波

讨论开展不久,即有越来越多的读者打电话或直接影响到编辑部要见“潘晓”;许多新闻单位也相继提出要求直接采访“潘晓”;社会上还出现了被人指为“潘晓”和自己冒充“潘晓”的事件等。尽管我们从一开始就向各方面说明了“潘晓”只是一个思想典型,没有隐瞒过那封信的任何事实,但挡不住那么多想见“潘晓”的愿望。因此,当中央电视台向我们提出采访“潘晓”时,编委会商量决定:由黄晓菊作为“潘晓”的代表来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说明情况,消除误解,以止息求见“潘晓”之风。当时我虽然觉得这有违“潘晓只是思想典型”的原意,但也没有其他对策。这个决定征得了黄晓菊、潘祎和黄晓菊单位领导的同意。编委会决定由我负责带黄晓菊接受中央电视台的采访。尽管黄晓菊按照我的嘱咐如实地讲了那封信问世的真实情况,说明她本人并不就是“潘晓”,以及开展讨论以来自己受到的鼓励和重新投入生活的信心等,但毕竟,原本是一个思想典型的“潘晓”,同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人在公众面前直接联系在一起了,由此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这是编委会,尤其是我本人考虑不周的一个失误,在外界形势的冲击下没能始终坚持把思想典型与生活中的真人严格区别的原则。

8月20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出这个访谈以后,9月23日工人日报社内刊《情况参考》即刊登了两封关于潘晓的群众来信。第一封信《此种做法弊多利少——有感于潘晓上电视》,指责报刊、电视台等各类媒

体对潘晓“夸了又夸”、“吹了又吹”、“捧了又捧”、“抬了又抬”，要求“尽快刹住这股风”。第二封信《邻居眼里的潘晓》，把黄晓菊本人说成潘晓，然后列举了黄晓菊的种种缺点和不当言行。几天后，中宣部《宣传要闻》转发了这两封信。9月30日胡耀邦同志批示：“请有关部门查查这件事，报刊、电台有个猎奇的思想，没有解决好。”10月7日，中宣部在有各主要



1980年2—3月抓“人生意义”讨论的最初三人，郭楠柠（中）、马笑冬（右）、马丽珍

新闻单位参加的例会上传达了这个批示。于是，“潘晓讨论出事了”的消息在北京许多单位传开了。紧接着，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刊登了记者徐光耀写的《北京羊毛衫五厂负责人谈“潘晓”和她的信的问世情况》，把潘晓的信说成是“完全出于《中国青年》杂志编辑之手”。一些地方更据此将“潘晓讨论”说成是《中国青年》制造的一场大骗局。

为了回答《工人日报》的两封信和徐光耀的文章，以澄清事实，辩明是非，我受编委会委托，带领几个同志对有关情况做了进一步详细了解，并起草了《关于工人日报等单位反映“潘晓问题”的调查报告》，就“关于潘晓的信问世的情况”、“关于舆论界是不是‘大肆吹捧’潘晓的问题”、“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问题”、“关于‘邻居眼里的潘晓’问题”，进行了答辩。《调查报告》6000多字，在充分摆明事实的基础上，据理说明：（1）刊物上以潘晓名义发表的那封信主要经历和观点都是黄晓菊的原稿和谈话中有的，编辑部只是做了必要的整理和删节、补充，这是属于编辑的正常工作范围，说这封信就是编辑部“编”出来的，不符合事实。（2）各新闻单位对人生观问题讨论的报道，都是从肯定鼓励青年人严肃探讨人生、支持宣传工作青年工作进行改革的角度来谈的，没有一篇宣传过潘晓本人，也没有对潘晓的信做过不恰当的评价，舆论界并没有对潘晓“大肆吹捧”。（3）黄晓菊是以一个有苦闷、有弱点而敢于说心里话的问题提出者的身份上电视的，那种认为一上电视就是“树”、就得是先进青年的看法是一种误解。（4）经过编辑部再次调查，黄晓菊的具体情况与邻居讲的有较大出入。

编委会审定并同意了这个《调查报告》，关志豪在报

告的最后加了这样几句：“我们给胡耀邦同志提一点意见：希望今后耀邦同志不要輕易地就一些未经核实的材料做带有实质性的批示，以免和实际情况脱节。”10月30日《调查报告》上送胡耀邦和王任重、朱穆之等领导及中宣部，同时还送给了各家新闻单位。

这就是1980年秋天，关于“潘晓上电视”的风波，《中国青年》给予社会的一个实事求是的、公开的回答。

一直以来，都听到一种说法：是因为“潘晓”上电视才给讨论带来了厄运。其实，这场讨论的遭遇和命运，归根到底，是由这场讨论的内容和讨论的方式决定的。在当时“真理标准讨论”等思想解放形势的鼓舞下，青年思考和追索人生意义所质疑的，不只是“文革”十年的非常时期，而是由“十年”追溯到“十七年”，触及到了多年来坚持的社会意识形态、政治思想、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更深层的根源；加之讨论明确提出的“讲真话”“群众参与”“平等探讨”的方针，要求冲破思想禁锢，在科学的基础上来重新检验这一切，这就不是能为所有人欢迎的。

1983年12月，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后，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运动中，有的大学党委等还状告“潘晓讨论”，说“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重精神污染”，“至今未予澄清”，要求“认真进行清理”。对此，胡耀邦同志批示：“青年报刊一些好心肠同志，为了教育青年，喜欢把一些错误的思想行为汇集起来，并加以系统化，然后加以评论。结果，反而产生了副作用，欲益反损。但我们一些同志不注意接受历史教训。这件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注意一下就可以了。”这个批示虽然批评《中国青年》不接受教训，但肯定了是“好心肠”、“欲益”，同时指明“这件

事用不着再大肆翻腾”。这个批示,减轻了当时对于“潘晓讨论”和《中国青年》的压力。

## 关于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

历时7个月的群众性讨论结束了,编辑部对于讨论中提出的诸多问题该有个什么样的态度呢?

按照以往的做法,我们请思想理论界的专家来写这篇总结文章。我拜访了一些同志,但他们大都认为,由于这场讨论涉及问题的广泛和各种思想观点的丰富复杂,没有亲身参加过这个讨论的全过程,难于掌握青年心态及讨论中涉及到的种种思想矛盾,很难写这个总结。当时的大形势有所变化,“风向”开始转了。胡乔木在1980年12月13日的讲话中,一改几个月前的表态,转而严厉批评“潘晓讨论”的做法。要求批判“错误思潮”的压力越来越大。这可能也是无法请到专家来写总结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我们回过头来求诸自己,由原来工作班子中的六七位同志一起研究。由于人太多,各人的想法差异很大,无法进一步讨论总结文章抓什么主要问题,基本观点是什么。于是,改为由两位同志按各自的想法分头写作。但写出的稿子,大家看后认为,主要问题不清楚也缺乏分析,没有讨论和修改的基础。最后,关志豪同志提出,我有责任使这个讨论善始善终,由我来写总结,陈汉涛参加;但他对总结该如何写没说什么意见。

我们花了一个月,完成了文稿。题目定为“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全文分四个部分:一,重新探索人生意义是历史的必然(后改为“需要”);二,正确认识“人的价值”;三,科学地看待“公”和“私”;四,在振兴祖国的奋斗中开拓人生之路。

第一部分主要是对这场讨论的发起由来、历史背景、必然性和必要性等做出解释。

20世纪80年代初之所以有这样一场人生意义的大讨论,是缘于当时的社会矛盾、时代需要和青年思想。我们把内在的深刻原因主要归纳为三条:一是一代青年对十年动乱的深刻反思,要求在实践中检验的基础上清理过去的人生信条,重建新的人生信念。二是面对当时社会的不正之风、诸多弊端和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难题,青年们感到原有的简单的、水晶般的人生观解答不了复杂问题,因而要求找到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支柱和可供遵循的、正确的行为准则。三是改革开放的新政策新观念及其同旧有做法和观念的冲突,要求人们在科学的基础上重新审视和评判旧有的种种价值观念(包括人生观)

——或者肯定,或者否定,或者修改,或者做新的理解……重建科学的、可信可行的人生观,是一代青年成长的需要,也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中国青年》经过大量调查、深入研究,决心开展这场讨论,是基于深厚的历史必然和需要。

文章的第二、第三部分是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回答讨论中集中争论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关于正确认识“人的价值”。我们充分肯定青年们在讨论中提出的观点:“社会应重视‘人的价值’,集体应重视‘个人价值’,个人应自觉地按照社会需要提高‘自我价值’。”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把“人道主义”、“人性”和“人的价值”等与“人”沾边的东西,都当成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的。这是一种误解。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是重视“人”和“人的价值”的。

再一个是关于“公”与“私”的关系。这是人生观的一个中心问题。首先,它们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其次,“公”与“私”又存在着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又是分裂的甚至对立的。正由于“公”与“私”既统一又矛盾,所以“主观为自我”与“客观为别人(社会)”之间也是既统一又矛盾的,“主观为自我,客观为别人(社会)”这个命题具有正确和错误的两重性,关键在于“一定条件”。

第四部分主要回答怎样认识和对待现实社会的问题。须要明确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我们的社会还有弊病,但同时存在着同弊病作斗争的力量;我们的社会还有黑暗,但光明面毕竟占主导地位。经历过祖国沧桑的人,会公正地看到,我们的时代毕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的祖国已经从十年浩劫的巨大创伤中站起来了。我们确信,历史的灾难必将历史的进步来补偿。而科学地认识社会,是为了找到前进的路标;对人生意义的真切理解,还须要投身于创造与改革的社会实践——人生的真谛,不在“自我归宿”中;“自我”的实现,应该在振兴祖国的神圣事业里。

编辑部考虑到这个讨论在社会上的广泛影响,决定把文稿送请中央宣传部长王任重同志审阅。王任重同志很快批复说:稿件阅过,基本可以,请中宣部理论局再组织几位专家帮助看看。中宣部副部长王惠德同志、理论局局长洪禹同志约请了邢贲思、汝信、顾锦屏、王贵秀和严家其五位专家,与我和陈汉涛共同讨论。王惠德同志和专家们都明确说,专家的意见仅供参考,接受什么、如何修改,还是你们作者酌定。从2月23号至25号,讨论三天。我们先介绍了《中国青年》开展人(下转54页)

# 我的1978年

## ● 高 放

1978年不仅开创了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新时期,而且也是我个人第二次沸腾的思想解放和第二个燃烧的教研青春的新起点。

### 我获得第一次思想解放后,又陷入对领袖的个人迷信

我祖籍福建省长乐县龙门村,全村都是姓高的族亲。1927年正月初三(公历2月4日)生于福州市一个职员之家。按祖先规定的名号,我这一辈人排名属“元”,父亲本为我取名“元宏”,因我五行缺水,就改为“元法”。这个“法”字在古汉字中是象声词,意为浪涛宏亮的声音。如公元3世纪晋朝文豪木华《海赋》中有“崩云屑雨,泐泐汨汨”佳句。我上小学、中学、大学一直都是用这个名字,至今我的一些老同学还有这样呼叫我的,老朋友念旧显得格外亲切。1946年我在一所著名教会学校——私立福州英华中学毕业后,到上海考进北京大学。在北大一年多时间内,在地下党和周围先进同学帮助下,我读了不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著作,在学生民主运动中受到初步锻炼,1947年6月参加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并且被委为支部书记。由于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愈益不满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独裁和贪污腐败,同时深感在政治系死啃英文版的政治学原著太脱离中国实际,不如尽早奔赴解放区直接投身革命斗争为好,所以1948年1月25日就悄悄离开北大,到晋冀鲁豫解放区去了。到解放区后摆脱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和精神压制,顿感获得思想解放,同时又为了割掉残留在我名字上的五行缺水的封建迷信的尾巴,因此我改名为高放。

我先在晋冀鲁豫边区的北方大学文法学院学习,1948年7月北大与晋察冀边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解放区的华北大学。我被选拔为历史研究室研究生,在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何干之指导下精读马列主义原著。1949年3月华大从河北正定县迁进新解放的北京城,我即结束了研究生学习,调为学习助理员(助教)。这一年年底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表明了我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决心。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以华大为基础创办新中国第一所社会科学综合性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我即被调到人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执教至今。回顾平生,我自以为从1948年到解放区起就已经获得了思想解放,实际上从那时起直至1978年,长达30年之中我陷入了对领袖的个人迷信之中,思想依然备受束缚,在课堂讲授和文坛发文中,处处都以领袖的经典著作作为依据,不敢独立思考,更难以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有时发现斯大林与毛泽东对某个问题的观点不一样,那么在教学中要怎么讲呢?例如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问题,斯大林于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这样说:“反轴心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它一开始就具有反法西斯的、解放的战争的性质,恢复民主自由也是其任务之一。”而毛泽东于1939年9月14日发表的《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讲演提纲》中却认为,“第二次为帝国主义战争同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一样”,是属于非正义的掠夺性质的战争,“因为这二次战争的目的都是为了掠夺世界人民,而丝毫也没有其他的目的,丝毫不利于其本国与他国的人民”,许多人“以为德国固然是非正义的,英法却是民主国家反对法西

斯国家,波兰则是民族自卫战争,以为英法波方面总多少带有一点进步性,这是极端糊涂的见解。”究竟是斯大林的观点对还是毛泽东的观点对呢?我记忆犹新,1951年秋后教研室教师在集体备课中曾经热烈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都认为斯大林是国际共运公认的最高领袖,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斯大林的结论是1946年做出的,毛主席的论断是1939年提出的,我们在课堂上应该按斯大林的观点讲。我当时是教研室最年轻的教师之一(24岁),也主张要以斯大林的观点为准绳。可是又想到,如果学员(当时人有很多调干生,他们年岁比我大,工作经验丰富)在读了指定书目之后向教师提出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解释呢?我们能说毛主席的说法不对吗?为此教研室好几位教师都要我代表大家执笔写信请示中央宣传部。信发出后一直没有得到回复。后来我从延安出版发行的《解放》周刊中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39年11月11日发表的关于俄国革命22周年的宣言,才得知当初在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就是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非正义的、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英国法国德国的统治集团都是为争夺世界霸权而战”。这也是斯大林本人的观点,毛泽东在1939年发表的看法,与斯大林、共产国际是完全一致的。到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和1946年战后总结历史经验时,斯大林才改变了看法。1951年时由于我幼稚无知,未深入了解历史,才在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不同观点之中去按领袖的地位来判断是非。这种对领袖的个人迷信,现在看来十分可笑!

由于对斯大林迷信、崇拜得五体投地,所以1956年听到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所做的揭发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传达报告后,我思想上震动很大。我认为斯大林从1929年起长期大搞个人崇拜,迫害那么多党政干部,至死都得不到纠正,是同他破坏民主集中制、实行个人专断制有紧密联系。同时我很赞同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三和”路线(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我当即于1956年6月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教学与研究》月刊上发表《列宁关于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对于1956年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我认为苏联第一次出兵干涉加剧苏匈矛盾,使局势更加恶化。我在学习讨论会上

还表示南斯拉夫工人自治的实验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尝试,值得我们重视。到1957年5月整风鸣放期间,我对教研室主任的不民主的专断作风又提出批评意见,我同他在编写科学社会主义教学大纲中又有不同看法。就这样,我遭到打击报复,差点被这个教研室主任倚权划为右派分子。幸好得到吴玉章校长的保护,他亲自审阅了批判我的错误的所有材料之后,指出我的错误是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这样我才免遭灭顶之灾,然而还是被内定为中右分子,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关于我发表赞成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文章,更是连续被批判多年。

从1956年我开始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之后,又更深地陷入了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内心以为吸取了斯大林的错误教训之后,毛主席不会重犯那些错误,在斯大林之后唯有毛主席才是国际共运的最高领袖。从1960年我们党开始批判赫鲁晓夫的现代修正主义起,我一直紧跟党中央,认真学习中央文件,在课堂上文坛上和教材中大讲大写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现在看来,这才真正是我犯下了推行“左”的路线的严重错误。

## 我是怎样迎来第二次思想解放和第二个教研青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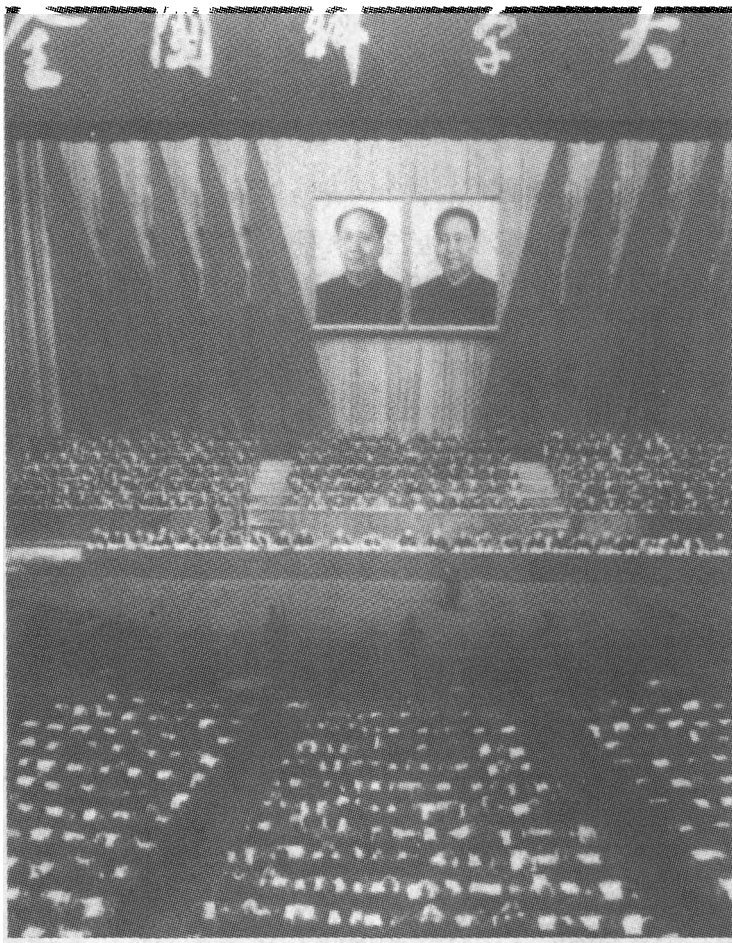
即使我在1957年被批判后已经在紧跟党中央,但是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我发表过和平过渡的文章和一些“错误”言论,依然被群众揪出来作为我们系的“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迫低头弯腰认罪,被抄家,甚至被毒打。“文革”中的种种异常现象,促使我逐步觉醒,逐步摆脱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个人崇拜。

我迎来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进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是1966—1975年。“文革”中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不断升温使我内心深感毛的错误超过斯大林。如出现“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等拜神教仪式。1967年元旦在西单大街十字路口我亲眼看到赫然挂出“迎接毛泽东纪元元年来临”的横幅标语,全国各地各处大树高大型毛泽东塑像等。我知道林彪在井冈山时期对“红

旗到底能打多久”丧失信心,而在“文革”初期的宣传中却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这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而且在1969年九大的党章中还把林彪明文规定为“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这在国际共运史上是从无先例的。我还知道林彪身体很不好,恐怕天不假年,难以指望他能接班。就是这样一个钦定的接班人却在1971年9月13日几乎全家人乘飞机逃跑。我心想毛、林之间的矛盾必有难以告人的隐秘。而毛泽东从1942年在延安整风起就十分信任并最早树为接班人的刘少奇,居然在“文革”中查出他在历史上是叛徒、内奸、工贼,这实在难以置信。当时公布的定案材料多是个别人口供,缺少真凭实据。“文革”中还出现打、砸、抢,乱批斗,自杀他杀,各单位都分为两派,甚至发生武斗等异常现象。我心中日益感到即便毛泽东在历史上大多正确,他发动并且这样开展这一场“文革”,却是犯下大错。当时只能自言自语或者与个别信得过的莫逆之交悄悄交换意见,连对自己妻子也不敢言真(“文革”中夫妻互相揭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字报常有出现)。

第二步是1976—1977年。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病逝的噩耗在次日清晨播出后,我在床上嚎啕大哭,悲痛不已,深感折此栋梁,党和国家危难弥深。对于江青等人“不许戴白花”、“不许设灵堂”压制人民群众哀悼周恩来,甚为不满;对毛主席不出席周总理的追悼会,甚为不解;对江青等人那样飞扬、嚣张,甚感不祥;对毛主席那样器重、纵容江青等人,甚感不妥。从这一年2月起全党全国开始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并且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理论指示,我思想深处更是不通。1973年中国人民大学解散后,我们国际政治系教师都并到北大国际政治系。1976年春按照领导部署,我正在给工农兵学员讲哲学课,指导学员选读几本马列主义经典原著。我在课堂上讲解毛主席名著《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敢于讲出:如果仅在理论上认识到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而在实



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

际上却把人民内部矛盾都当做敌我矛盾来处理,那将危害极大。3月10日《人民日报》社论摘录毛主席的指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当时我心中感到把党内走资派等同于党内资产阶级,实在说不通。党内走资派是共产党领导人犯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路线错误,他本人是属于无产阶级,怎么就变成资产阶级呢?即便是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也不构成一个党内资产阶级啊。可是当时在北大的同行教师中竟有人紧跟形势,跟风跑步,写出文章,在北京市委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讲体会、作报告,用大力去论证党内资产阶级是继自由资产阶级、垄断资产阶级之后第三阶段的资产阶级,是最后阶段的资产阶级。意即只要战胜、消灭党内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全面胜利了。我内心鄙视这种做法与观点,但是当时也只能对此保持沉默,决不随声附和,更不在学生中散播。1976年4月4日清明节,天安门广场自发聚集人民群众达

200 万人次,哀悼周总理、愤怒训斥江青等人的高潮,连续两天达到顶点。没有料到,4月5日天安门的群众运动竟被毛主席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并且解除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随即“批判邓小平、反击右倾翻案风”更加升温。领导要我们教师指导学员写文章批判邓小平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等等,我只好敷衍塞责,虚与应付。同时,我在指导学员学习普列汉诺夫著《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时,特别强调要细读该书第6章。其中讲到法国皇帝路易十五宠爱贪求虚荣的彭帕杜尔美人,这个宠妃大力挺举庸碌无能的苏俾兹将军,为此使法国军队在七年战争中屡战屡败。我稍微借题发挥:由此可见,这个贪求虚荣的宠妃之所以能在历史上左右战局、起这么大的消极作用,根本原因在于有至高无上的皇帝宠信她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这在当时是相当大胆而又精心设想的巧妙讲法。

9月9日毛主席逝世。我预感到国内一定会出大事,会结束不正常局面,会发生大变化。10月6日“四人帮”被拘留隔离、审查的消息传来时,我喜出望外,兴高采烈地立即投入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和谬论。在北大这样“四人帮”严密控制的单位,当时要批判“四人帮”,不少人都有思想如何转弯的问题。我由于早已开始破除对领袖的个人迷信,所以顺理成章,得心应手。当时在课堂上较为系统、深入地批判林彪和江青两个反党集团的种种“左”的谬论,我心知肚明,实际上这两个集团都是迎合或者贯彻毛泽东个人的思想观点的,这两个集团也都是毛泽东个人扶植起来的。所以当时名为批判“四人帮”,实为改正毛泽东的错误。正在这个历史重要拐点上,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等两报一刊社论传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方针,这实际上是要把毛泽东晚年所犯的“左”的错误延续下去。4月间邓小平写信给党中央,批评了“两个凡是”的方针,这成为全党思想解放的先导。7月中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全党开展了如何看待“两个凡是”的讨论。我积极投入了这次学习与批判,更确信毛泽东晚年犯了重大路线与理论的错误。

第三步是1978年。3月间就得知中央已经

恢复中国人民大学,4月间又听说中央已着手纠正1957年错划右派分子的工作。这实际上都是在改正毛主席的错误决定和决策,我感到异常兴奋,因为这两件事与我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5月初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五四”科学讨论会上,我提交了《巴黎公社的原则和“四人帮”的篡改》的论文并做了报告。文中所批判的“四人帮”篡改巴黎公社的原则,实际上都是在毛泽东怂恿之下出现的。只是在“四人帮”做得过头之时,毛泽东才出面为之煞车。例如,“四人帮”于1967年2月5日擅自宣布成立名为上海人民公社的新的政权机关,自吹“上海公社是恢复巴黎公社的原则”。到2月19日中央通知各地:新的政权机关一律称革命委员会,这才迫使“四人帮”摘下“上海人民公社”的牌子。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从此全党全国展开了长达半年多时间的大讨论、大争论,促进了包括我在内的广大干部的思想解放,打破了长期以来唯上、唯书的教条主义禁锢,确立了一切理论都要由人们的实践来检验评定,辩明是非。12月间得知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会上发扬党内民主,许多老同志畅所欲言。尤其是邓小平在发言中强调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个重要讲话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这次会议还决定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深得民心。12月23日我异常激动地反复细读了报上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从这个公报可以体会到:我们党认真总结50年代以来的历史经验,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路线,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实现了党内民主生活健全化。这次中央全会的意义远超过一次党代表大会,这在党的历史以至国际共运史、国际关系史上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它标志着我们党从此起步由僵化封闭转向改革开放,由过度集权转向民主自由,由与世抗斗(60年代我们曾经提出“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转向融入世界,同各国长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与合

作,致力于构建和谐世界。

1978年这一年我个人最大的变化是7月间我从北大回到已停办8年之久的中国人民大学。如前所述,人大本来是建国初期1950年党中央新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化社会科学综合性重点大学。在五六十年代的媒体报道中,首都大学的排名顺序是人大、北大、清华、北师大,简称人、北、清、师,可见当时人大在全国大学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位居最前列。1968年7月22日《人民日报》发布了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四人帮”据此就于1970年10月通过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下令停办作为文科综合性大学的人大。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刚恢复工作几个月就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的谈话中明确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69页。)恢复人大实际上也是在改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到1978年3月中央已正式决定人大复校,经过4个月加紧筹备,原来分散到北大、北师大、北师大等校的人大各系所教工都集中回到人大。人大重建后首先对过去被错误处理的教工进行复查平反工作。到年底校党委正式通知我,改正1957年以来对我的种种批判,撤消过去强加给我的处分,终于使我卸去压在头上多年的沉重包袱,获得精神、思想大解放。9月开学后,我即参与编写新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纲要,深入思考如何从以往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中解放出来,重新总结一百多年国际共运史的历史经验。12月4日成立校学术委员会,我代表我们科学社会主义系成为校学术委员之一。同时参加校学术委员会主办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专题讨论会。校方选定9个人在会上发言,我的讲题是《马列主义理论为什么还必须由实践检验》。这9篇文章随即公开发表在我校主办的《教学与研究》1979年初复刊第1期上。这是我自从“文革”初期被当做“反动学术权威”打倒之后,相隔13年之久,第一次以个人署名重新发表重要文稿。这可以说是人民大学正式为我在全校和社会上恢复了名誉。

总之,从1978年起我迎来了第二次沸腾的思想解放和第二个燃烧的教研青春。尽管这时我

已年过半百,仍然以不减当年的朝气和锐气,不断反复思考如何清除个人崇拜的长期毒害,破除迷信,纠“左”防右,重新学习并发展理论,满怀激情,满载活力,日以继夜,奋不顾身地投入新的教研工作,以弥补受左的路线干扰而流失的时光和造成的损失。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人民大学举办复校后第一次科学讨论会,我在会上做了《反对个人迷信是国际共运史的优良传统》的报告。文中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来反对个人迷信,只是从30年代起斯大林开始破坏国际共运的这个优良传统,大搞个人迷信,到70年代毛泽东时期个人迷信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只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根绝个人迷信。同年5月我受教育部政教司委托,主持编写全国高校使用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学大纲》,7月在教育部于上海召开的高校政治理论课教师讲习班上专门讲解国际共运史教学应如何清除“左”的流毒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我提出:斯大林带头实行的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使得个人崇拜代代相传,给国际共运带来重大危害。著名社会活动家、社会科学界泰斗、跨越三个世纪的陈翰笙老前辈(1897—2004)当时听到别人对他转述我在上海的讲话要点后十分赞赏,他曾经半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的名字什么时候取的?取得真好!高放就是思想高度解放,和三中全会精神完全一致。”近30年来我开设过八门新课,发表过约500万字文稿,主编或参与编写近40部书稿,出版过4部专著、9本文集。

30年来,我的思想解放并非一帆风顺。每次刮起“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旋风时,我几乎总要遭到根深蒂固的“左”的势力的袭击。然而,我既已摆脱了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掌握了寻求真理的正道,总能从实际出发,不顾个人得失安危,勇往直前,绝不回头,坚持不懈,继续探索。思想解放没有止境。我一生追求科学与民主,当今更加坚信只有科学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振兴中华,并且促进世界大同。有生之年我将依然竭力弘扬科学,呼唤民主,从事教研工作,旨在资政育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鞠躬尽瘁,奋斗到底。

(责任编辑 萧 徐)

# 反 腐 三 十 年 的 沉 思

● 辛 宇

三十年来,如果不是按中央的方针坚定不移反腐败,腐败的形势将比现在还要严峻;如果各地各部门反对和防止腐败的认识再主动一些,行动再坚决一些,制度创新再多一些,权力结构的改革再快一些,腐败形势也不会有现在这么严峻。

## 腐败已进入权力流通领域

三十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呈现这样三大变化:

1. 在形态上,由实物形态向货币形态转变,货币形态又向虚拟货币形态转变。

2. 在领域上,由消费资料领域向生产资料领域转变。

过去送电冰箱、电视机,包括手机,都是消费资料。现在是生产资料,比如你的国土资源、矿产资源、石油资源等,腐败已经渗透到这些方面,钱和权一交换,全部齐活,最后形成的是一种腐败的利益集团,有人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这种趋势非常可怕,过去送一个大衣柜、一台电冰箱、一个电视机满足他个人或家人的消费需要。现在消费资料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贪欲,发展到生产资料,要的是一座矿山、一片森林、一大批土地,要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国家大量的生产资料据为己有。

3. 在环节上,由商品流通环节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

过去,腐败和不正之风多表现于商品流通环节,或批条子、或拿东西,现在已经不是在商品流通环节了。它现在进入到权力流通环节,其表现就是有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骗官、杀官的“六

官现象”。杀官就是说副职想当正职,把正职干掉,或者两个副职一个把另一个杀掉。腐败一旦进入权力流通环节,将由官场腐败造成整个社会和伦理道德的败坏,从而使经济领域的腐败蔓延为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的腐败。

## 不是“越反越腐”而是不反更腐

这些年,老百姓流传一句话,“反腐反腐,越反越腐”。其实,这种感觉是因为角度不同造成的。因为老百姓看到身边的情况越来越严重,但却较少关注中央反腐败的决心越来越大,措施越来越加强。当然,三十年来,反腐败的形势仍然严峻,不光上上下下有这种感觉,实际数字也有这个证明。据今年10月26日的中新网报道:“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今天透露,近五年来,在判处的罪犯中,原县处级以上公务人员4525人,同比上升77.52%。”县处以上公务员犯罪率上升如此之高,形势严峻显而易见。但是,也必须明白,不是“越反越腐败”,而是不反更腐败。从反腐蚀到反腐败搞了三十年,形势仍然严峻,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我以为,主要是解决腐败滋生蔓延这一问题的方法远离源点。

## 腐败滋生蔓延与制度漏洞有关

首先,要明白腐败与制度的漏洞有关。如果腐败大范围地滋生蔓延,肯定与重要制度存在严重弊端有关。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如果你的重要制度是健全的、科学的,就不会有大规模的腐败。无论是计划经济、商品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乃至小农经济,封建主经济、奴隶主经济,都如此。

因为腐败的要件是权力的私有,腐败的猖獗是权力私有的泛滥。以权谋私即腐败。而这种权力之所以能够私有,私有权力在某些方面还能够泛滥,它与你的制度设计有关。它是制度漏洞使然,而不是与所谓的经济形态有直接关系。

其次,这种制度漏洞与我们的制度设计有关。我们在推进改革的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我们奋勇直前、大刀阔斧,而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却步履蹒跚、思前虑后、畏首畏尾。这两个不同步,就如一个人左腿步幅太大,右腿却迟迟不能跟上,于是他的屁股只好迅速下移,如果下面是一滩泥水、一个粪坑,他就会沾上泥水、沾上粪水,我们现在就是这种状况。

不同步造成了巨大的缝隙和漏洞,用邓小平的话说,使我们相当多的干部、一大批干部卷了进去,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二十多年前邓小平就看到了这个问题,明确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但时至今日,我们还没有把这一步迈上去。好在是中央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十七大报告中,已经把多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前面的固定词组“积极稳妥”四个字变为“深化”两个字。这也就预示着政治体制改革将可能有实质性的动作和推进。

此外,这种制度漏洞与我们先天不足有关。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无产阶级第一次执政。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这篇经典文章里,从中引申出两个重要论断,一个错误的论断:公社应当是同时兼有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即“议行合一”领导体制,我们沿用到今;一个正确的论断,但我们迄今不用:用等级授职制代替普选制是根本违背公社精神的,就是说一旦你掌握政权,渡过政权初创的困难时期,就不能再搞等级授职制,一定要采用普选制来解决权力来源的合法性、权力代表的广泛性、权力回归权利规律性问题。在权为民所授这个根本的前提下,才能真正保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才能真正保证掌权者不至于由“人民的公仆”蜕变为“社会的主人”。

巴黎公社以后,几乎所有执政的无产阶级国家都是用暴力革命取得政权,政权初创时复辟和反复辟的残酷斗争,使执政的领导者们不敢轻易

采用普选制。他们担心一是由于没有经验会出大问题,二是会被其他野心家利用,三是敌对势力会借此操纵选举而威胁甚至夺取政权。这些顾虑是客观的。但是,当政权初创的危险期过去后,我们没有用普选制取代等级授职制,也没有用试点先行的办法来逐步解决大面积的问题。长达近六十年的执政,各级各地一直沿用的等级授权制,从而在一些地方和单位,造成了一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最后什么理想信念宗旨,什么党性原则纪律都可以在这个人身依附关系中淡化乃至消亡。

## 改革开放有利于遏制腐败,但我们目前还没有做到这点

腐败与改革开放当然有联系,这种联系更多地应该表现为改革开放有利于遏制腐败。不仅可以“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引申出这个结论,而且可以从封闭性的国家、社会、组织的演变趋势中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国之路。但是,任何机遇同时也是陷阱,机遇总是与风险并存。改革开放中如果处置不当,也会滋生腐败。所以在吸取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中,不能只学别人经济技术方面的有益成果,而要同时学习别人政治文明方面的有益成果。别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防止权力滥用,如何防止贪污和腐败的那些经验教训,如果不认真总结吸取,那么在改革开放中你就会出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与腐败的滋生蔓延同步,甚至出现高于并快于你经济增长速度的局面。

腐败不是由改革开放带来的。但如果有选择性地,特别是一些有特殊利益的人有选择性地去改革去开放,就会形成对他有利的就改就放,对他不利的就不改也不放。这种以其个人或小集团的特殊利益为取舍的改革或开放,吸取的可能就不是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而是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的东西甚至包括糟粕;或者是一手硬一手软的借鉴吸取。那么就有可能重蹈清朝末年所谓维新变法的覆辙,就会助长腐败,就会助长特殊利益集团的坐大。

由于我们在两大体制改革的同步上做得不够好,从而使改革开放有利于遏制腐败这一理论

命题,只在小范围得到一些印证,而在目前大范围的实践中还没有能够完篇。

## 反腐目标为何降低

### 1. 由于放缓了政治体制改革。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实现社会风气的根本好转,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到1996年,江泽民在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努力把消极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限度”。之所以出现这种降低目标的提法,其实也很好理解。当我们提出根本好转的时候,当时中央想的是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你及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可以实现根本性好转,这毫无疑问。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客观原因的出现,放缓了政治体制改革,当然就没法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的根本性好转了。但是,由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放缓,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倒是如期实现了。

### 2. 只看到老百姓对腐败的承受力在不断增强。

由于较长时期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条腿没跟上来,所以你只能提一个非常模糊的目标,可能的最低限度。这个最低限度是多少?看似没有,其实有一个度量关系。那就是腐败的滋生蔓延速度与老百姓心理和实际能够承受的程度的对应关系。现在老百姓对腐败的承受力非常强,远高于改革开放初期,不仅对贪污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元熟视无睹,而且对包二奶包三奶见惯不惊。处死的成克杰当时受贿4000多万元已让人觉得是天文数字,可是最近判处死刑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受贿居然过亿元,其中一笔受贿就超过8000万元。面对这些大案要案,老百姓好像司空见惯,看似无所谓。甚至对杀与不杀都没有了往日的关注。

但是,这已经非常危险!任何金属都会疲劳,何况百姓的承受力?瓮安“6·28”事件,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它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一些地方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关系的紧张程度。瓮安“6·28”事件的直接起因,最初与政府没有任何一点关系,后来老百姓居然发展到去烧政府。

要从一个高度认识类似的事件。这非常危险,它再次提醒我们另一腿要迅速(我们已经错

过了及时)跟上来。你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公信力从哪里来?不推行政治体制改革,你的合法性从哪儿来?

### 3. 前瞻性的认识与刚性利益之间的博弈。

20世纪90年代放缓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对腐败的判断有失误,也不是感觉不到腐败对党的生命的威胁。邓小平早就明确提出不坚决反腐败会亡党亡国。陈云也讲到这是攸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认识归认识,利益才是刚性的。一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到重大的特殊利益,他们就会想方设法影响并延误决策。于是你很难从政治体制改革的高度去反对和防止腐败,只能局限在技术层面,通过查处典型个案来反腐败。好在是中央越来越认识到制度反腐的重要,提出了“三个更加注重”,重视建立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工作规划。当然,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关键是看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和推进的速度能否遏制住腐败滋生蔓延的速度。

### 4. 市场经济程度较高通常腐败程度相对较低。

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的进程我们看到这样的现象,哪个地方腐败,哪个地方经济自由更好;哪个地方腐败,哪个地方自制会有更多的空间。”这其实是腐败“润滑剂理论”的变种,是一个错误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现象没看到本质。实际上恰恰相反,浙江的市场经济做得很好,也是违法违纪官员犯罪比较低的地方,而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穷乡僻壤,却也是腐败严重的地方,从省委书记刘方仁,到瓮安事件。所以正好相反,市场经济程度比较高的地方腐败程度相对较低。全球历史证明,凡是经济落后的地方,腐败相对严重。

正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未跟上,行政管理过紧,这个时候为了得到利益,就会有人去赎买权力。这就是“贿随权集”。但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市场化中,得到利益的是那些买通的和被买通的人。这种所谓的润滑剂作用,其实最大地损坏了国家利益和群众的利益。它促成这种“市场化”,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市场化。这种与权贵嫁接的市场化,是一种坏的市场化。我以为,这种坏的市场化,与其说是市场化,不如说是权力化,是一

种权力市场化。

## 我国三十年来反腐思路和方法的变化

**第一,在观念上发生了变化。**我们一开始不承认有腐败,只承认有不正之风,需要反腐败。后来发现不是这个问题了,发现反腐败斗争和纠正不正之风解决不了不断滋生蔓延的腐败问题。于是才正视,面临的,确实是一场反腐败斗争。80年代初我们用的是“反腐败斗争”,到了90年代初我们才正式开始称“反腐败斗争”。

**第二,在认识上逐渐深刻。**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认识,说是个体腐败,不认为是群体腐败,更不认为是利益集团,因此我们搞的是单兵作战,是“今天查处一件受贿案、明天惩处一个贪污犯”的游击战,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战术反腐思路。所以那时候一门心思查个案,纠歪风,被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牵着鼻子走,忙得不得了,但是效果不佳。到后来我们才开始注意到反腐要从整体入手。

**第三,在抓法上找到根本。**我们开始时十分注重教育,认为这是抓根本。总认为腐败的出现是因为一些干部在思想上过不了改革开放这个关。总想通过加大教育的力度,提高教育的针对性,加强领导干部的自律来解决问题。后来发现,教育见效不大,不是教育本身的问题,而是教育缺乏载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开始逐步认识到光抓教育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开始注意制度建设。现在党的建设包括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没有制度建设这个根本建设,思想建设没保障,组织建设没措施,作风建设很虚幻。所以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根本建设。而制度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权力结构。权力结构安排好了以后,其他的都好说。

**第四,在重点上注重了预防。**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反腐败,无论在精力时间、力量摆布上,还是政策研究、方法重点上,我们在惩治方面下的功夫远多于预防。案子越查越多,级别越查越高,金额越查越大。不到十年,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就杀了6个。严峻的现实,使我们越来越认识到,

不坚决惩治腐败不行!但单靠惩治,遏制不了腐败的滋生蔓延,即使拿省部级开刀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我们惩处了几十年,案子查了数百万件,案子越办越多越办越大,解决了吗?靠惩处遏制不住,要靠预防。尉健行同志最早认识到源头治理的问题,提出重大决策、重大项目安排、重要干部任免、大额度资金使用,必须经过党委集体研究决定。这就是“关口前移”,从“三重一大”上预防。吴官正同志带着丰富的地方工作和基层工作经验主持中央纪委工作,在何勇同志的配合下,在反腐败已有方针“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后面,加了八个字“惩防并举、注重预防”,反腐败工作由过去的注重惩处开始转向注重预防。同时,还提出拓展反腐败的工作领域,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并以巡视和派驻为支撑点,强力推进纪检体制改革,使预防腐败在工作方针、工作领域、工作部署、工作任务等层面开始着手落实。贺国强同志长于组织工作,精于队伍建设,上任即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机关开展“做党的忠诚卫士,当群众的贴心人”主题实践活动,并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强力推进《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2年工作规划》。

**第五,国家预防腐败局在其职责权限的范围内,做了大量工作。**但是要进一步发挥作用,必须通过深化改革来实现。这就需要讨论如何预防的问题。其实最根本最关键的预防,不是思想预防、技术预防,而是制度预防!这是其他任何预防都替代不了的。教育可以对思想观念预防起一定的先导作用,技术预防可以对腐败泛滥起一定的延迟作用,但都起不到根本的预防作用。在现有制度架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胡锦涛总书记所说的“监督的制衡力”很难体现。群众戏称,我们现行的监督体制是儿子监督老子,你说可以监督多少?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腐败不亚于我们现在,但它从权力结构入手,从监督体制的相对独立性入手,在香港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贪污腐败现象也同时得到很好遏制。透明国际今年刚刚公布的清廉指数排行表,香港在亚洲位居第二,仅次于新加坡。当然注重预防,并不是要否定惩治,反而还需要加大查处力度。因为,不严肃惩治则难以预防。但是,最根本的是靠制度,而制度的核心在于权力结构。所以,反腐败三十年来,我

们的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从教育、办案、监督,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发展到“三个更加”即: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

## 制度反腐要求改革权力结构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大体经历了运动反腐、权力反腐、制度反腐三个阶段。运动、权力、制度都是反腐的载体而非主体。制度反腐不需要创造新的主体。运动反腐的主体是群众,权力反腐的主体是掌权者,制度反腐的主体包括群众和掌权的领导。

### 1. 制度反腐最大变化不是主体,而是载体。

制度反腐是主体以新的权力结构(而非旧的权力结构)为载体而开展的反腐败斗争。由于制度最核心最具实质的是权力结构,健全有效的制度必然是科学合理的权力结构。权力反腐与制度反腐,这两者的实质区别可简而言之。所谓权力反腐,就是依托现有的权力架构进行反腐;所谓制度反腐,就是改革完善现有权力架构而进行的反腐。实际上,制度一词有两层含义:即浅层意义上的规章、守则,和深层意义上的组织体系。前者是要求大家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大多以写在纸上、说在嘴上、贴在墙上的形式出现,后者是保证上述行为准则得以坚决实施的组织体系,这一组织体系是否健全、完善,取决于构成其结构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个子系统的设置是否科学,结构是否合理,操作时能否有效地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

如是没有科学合理的组织体系作支撑,那些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即使制订得再多,规定得再详细,也是一张白纸,很难起到什么作用。因此,那不叫制度反腐。

如果现在我们搞的还是计划经济,那么沿用过去的权力反腐或许还有效。但是,现在是一个开放的市场经济,甚至是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搞改革开放。在这种情况下,停留于计划经济时代的权力结构,怎能反得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腐败呢?显然是反不了的。因此,必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改革现有的权力架构。

### 2. 我们现在正在努力向制度反腐迈进。

在反腐败斗争的实际过程中,有的人已经敏感地意识到必须从改革权力结构入手,走制度反腐的路子;也有的领导隐约感觉到这个问题。目前关于制度建设的各种提法不少,但是更多的人并没有意识到制度建设的核心是权力结构。因此并没有真正做到依靠制度反腐。只能说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开始倾向于解决这个问题。

### 3. 利益的刚性决定了权力结构的改革非常困难。

一些人想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不想改革现有的权力结构。改革现有权力结构之所以非常困难,就在于任何一个领导干部要做这件事,要对现有的权力结构进行改革,他所面对的既得利益的势力太大,所要承担的责任太大,所要冒的这个风险太大。没有上级的及时支持,没有中央的强力支持,成功的几率不高。因为这种做法是以个体去挑战群体,是以对己无益去挑战既得利益,是以大多的无依无据去挑战甚至违反很多的现有规定。

### 4. 香港廉政公署的经验可借鉴,但不能照搬。

我们可借鉴他们“教育、惩治、预防”三管齐下的方法,相对独立的权力设置,但是不可照搬他的模式。因为,香港廉署是城市反腐的一个成功模式,而不是国家反腐的成功模式。甚至还可以再缩小来讲,香港是城市反贪的一个成功模式,而不是国家反腐的成功模式。它主要是反贪,贪和腐还不是一个概念,腐包括很多政治上的、文化上的东西,香港廉署解决这些东西也没办法,它重在解决反贪,不是针对反腐。而我们现在不仅是贪的问题,更是腐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只能借鉴它的一些机构设置、权力手段这方面的做法,而不能一律照搬。

## 反腐倡廉的三条建议

### 第一条,“发展民主、强化监督”的八字战略方针。

关于发展民主。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腐败是一种邪,你现在就是要强基固本。而“本”就是发展民主,民主是党的生命。十七大进

一步提到,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你的生命力旺盛了,腐败就解决得了。全世界反腐成功的没有一个是离开民主的,凡是不民主的地方反腐很难成功,凡是民主推行得比较彻底的地方,腐败很难蔓延。习近平同志在浙江主政期间,市场经济发展既好且快,与此相适应,浙江的民主发展也不错,无论是党代会常任制,还是乡村的选举制,无论是村务公开、厂务公开,还是政务公开党务公开,都有明显进步。在这种比较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下,腐败的滋生蔓延速度、大案要案的频发烈度,都明显低于别的地方。

关于强化监督。民主是最好的防腐剂,而监督是最有效的制衡力。过去我们一直是讲监督制约。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第一次提出“监督的制衡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强化“监督的制衡力”,就是要强化监督权对执行权违规、违法、犯罪的制衡力度。

当然,强化监督不是在同体监督上的简单强化,而是要分解同体监督为异体监督,从而使它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强调党内的异体监督,是因为我们有几个给定的前提:党外不允许有党,党内不允许有派。那么这种异体监督来自哪儿?只能来自党内,那就是党内分权。我们可以先搞这样的试验,看看党内权力结构能不能通过科学分解、合理配置,使异体监督产生出对腐败的制衡力。

**第二条,党内分权和党代会常任制两个战略行动。**

第一个战略行动是党内分权。科学分解、合理配置党内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形成一种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权力架构,尤其是我们党内的权力结构。目前我们相当多的一些地方和单位,“一把手”的专横独断,超过了我们党建党和执政的任何一个时期。所以才会出现那么多的群体性事件和那么多的矿难事故。

五千年来,特别是秦统一以来的中国社会,在治理上有一个与别国不同的特点就是信官,一旦老百姓不信官了,一个朝代就结束了。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干群关系、党群关系、官民关系相当紧张。必须引起各级高度警惕!

第二个战略行动是深化党代会常任制的改革。我们现在的党代会常任制演变为党代表任期

制。党代会常任制按毛泽东 50 年代的想法,是要形成一个党内的国会,党内有人大常委会那样的常设机构来进行党内决策。但现在却变成党代表任期制,党代表每年开一次会,旁听一些会议,走走形式,这种任期制的党代表连个进行决策的家都没有。就像没有人大常委会的话,人民代表参加或旁听一些政府或政府有关部门的会议,有什么用呢?

党内的科学分权应该这样:党代会选举产生一个决策机关——县委全委会,原来的县委书记作为全委会书记,全委会实行委员会制,县委书记的一票也只是一票,搞民主决策。同时设立一个在全委会领导下的执委会,作为执行机关。原来的县委副书记作为执委会书记,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统战部长和县委办公室主任,作为执委会成员。执行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但在用人上只有提名权,最后提交全委会票决。另外,还设立一个在全委会领导下的纪委或监委会,纪委不承担对全委会书记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只负责对执委会书记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党内的决策、执行、监督三个机关还可以相互监督和制约。

**第三条,建立政治体制改革和纪检体制改革的试验区。**

有了这个试验区,就可以减少阻力,控制风险,拷贝成功,推进体制、机制、制度等层面上的改革。1995 年湖南张家界市曾进行过一项改革,市委把下级纪委主要领导的提名权赋予市纪委,市纪委负责下级纪委主要领导的提名,最后由市委常委会来决定。这项改革推动了整个张家界市的纪检工作上台阶。可惜上面迟迟对其改革不予表态和肯定,最后这一提名权的改革,在当地无疾而终。多年后,一些省市纪委书记交叉任职,异地任职,甚至空降任职,这些都是反映了纪委提名权的发展改革。关键是要将这些经验和成功做法制度化。日前,全国法院系统动作既快且大,已经确定了三十个司法改革的试点。

提名权可以改革,巡视制度也需要深化改革。巡视员虽不直接办案,但是派人下去,就可以克服看不见的问题。目前要继续加强巡视组工作方式的改进、机构建设的规范和人员素质的提高。

派驻机制改革。比如江苏东海县纪委,经过

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分散在全县 24 个乡镇和 36 个县城机关的纪委书记,无法形成有效解决信访、及时加强监督、认真查办案件的整体合力。于是,他们根据毛泽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强敌”的原则,他们把全县分散的承担同体监督任务的纪检监察干部,统一集中到县纪委,分成 8 个工作室实施异体监督,其中 6 个对农村乡镇,2 个对县城机关。这样,该县的纪检监察力量不仅得到有效整合,而且变同体监督为异体监督,克服了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的死角禁区盲点。此做法,很快使全县的党风廉政建设见到成效,继连云港市推广后,江苏省也在全省予以大力推广。

其实东海县的改革,无非印证了实行异体提名、异体巡视、异体派驻,才能形成真正有效监督。

### 沉思与启示

反腐三十年,给我们以这样的沉思:

反腐败不仅是我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而且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如何有效地惩治和

预防腐败,还不能轻言已经找到成功的路子。不仅是群众并不认可,而且我们也拿不出有力的数据,来证明腐败滋生蔓延的严峻态势,已经得到有效遏制。

反腐三十年,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反腐败是一门我们还知之不多,识之不深,悟之不透的科学。正如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需要不断学习深刻反思一样。2004 年年 9 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越是长期执政,反腐倡廉的任务越艰巨,越要坚定不移地反对腐败,越要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有鉴于此,反腐倡廉既需要集中全党的智慧全力攻关,也需要建立试验区进行创新和试点。只有这样,才可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责任编辑 萧 徐)

### 公 告

凡未收到稿酬的作者,请将联系地址、邮编和身份证号码告知我社。

联系人:肖林 电话:010-68525374

### 广 告

广告审查批准文号:苏医械广审(文)第 2008040039 号 京医械广备字第 2008050153 号

SIEMENS

西门子助听器

#### 服务中心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甲16号  
电话:010-64071474 64074641 64002810  
传真:010-64055026  
邮编:100009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46号天恒大厦508B  
电话:010-84608848 传真:010-84608847  
邮编:100027

SW 声望听力 网址: <http://www.sw-tl.com>

解决听得见  
听不清  
耳聋  
耳鸣的烦恼

# 国庆仪式创新漫笔

## 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意味着什么？

● 智效民

今年国庆，胡锦涛等九常委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它不仅体现了国庆纪念活动的重大改革，而且还意味着最高当局执政理念的一种历史性转变。

回想 59 年前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典礼和群众集会，会后还有大规模的游行活动。从此，阅兵典礼和有组织的群众游行，就成为国庆庆典的基本模式。群众游行本来应该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但是为了政治的需要（包括展现伟大的成就、表达对领袖的热爱等等），就必须把包括大中小学学生在内的各行各业的群众组织起来，在统一任务、统一思想、统一步伐、统一口号的基础上进行排练。于是从每年九月初开始，以学生为主体的游行队伍就进入演练阶段。为了扎彩车、排方阵、走队列、练团体操，全国上下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国庆节那天，当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广场上数十万及至上百万游行群众挥手致意的时候，“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就会响彻云霄……

这种国庆节纪念活动，已经成为举国上下最隆重的仪式，并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都经历了这种仪式的洗礼，从而对毛泽东崇拜得五体投地。到了 1966 年，毛泽东在很短的时间里八次接见红卫兵，又把这种仪式推向极致。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的所作所为，就是这种仪式的产物，与当时个人崇拜的社会环境有着必然联系。

凡事有利就有弊。由于大阅兵、大集会和大

游行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制度，一种必不可少的隆重仪式，因此国家领导人必须在国庆节那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否则就会暴露包括领导人健康状况或党内斗争在内的“国家机密”。于是这种制度或曰仪式也给最高当局带来很大负担，很多麻烦。直到 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事件”突然爆发后，由于无法向外界交代，最高当局只好将以大阅兵、大集会、大游行为主的国庆纪念活动悄悄去掉。

改革开放以后，当局又把国庆纪念活动改成在天安门广场放焰火、开联欢晚会。届时，中央领导人同样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以便体现一种“与民同乐”的景象。这种改革虽然比过去有所进步，但它仍然给人以高高在上的感觉，与“人民公仆”的说法形成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

如今用一种新的方式纪念国庆，至少可以从两方面进行解读。第一，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它表明中央新一届领导集体已经为自己找到比较合理的定位：他们既不是解民于倒悬的“大救星”，也不是什么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是要树立一种继承革命前辈遗志、实践“执政为民”的公仆形象。第二，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纪念方式比以往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体现了新领导集体的确是在努力倡导一种求真务实、力戒浮华、避免浪费的工作作风。

明年就是人民共和国成立 60 周年了。大集会、大游行、大阅兵是否举行不得而知。如果举行，可以为新一届领导人提供一个登临天安门城楼的机会。但是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来看，大阅兵不仅耗费巨大，徒具形式，而且还是冷战时代的产物。因此我们从胡锦涛等常委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的新闻中，有理由判断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可能不会干那种劳民伤财的事。

## 国庆仪式的创新

● 丁 东

当今世界,以现代民族国家为政治单元。国家不论大小,都有自己的国庆日。节日的庆祝方式五光十色,多姿多彩。国庆活动本身,往往具有凝聚国民心理的作用。所以,不少国家都要举行有领导人参加的公共仪式,以示庆贺。但各国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不同,庆贺仪式也各异其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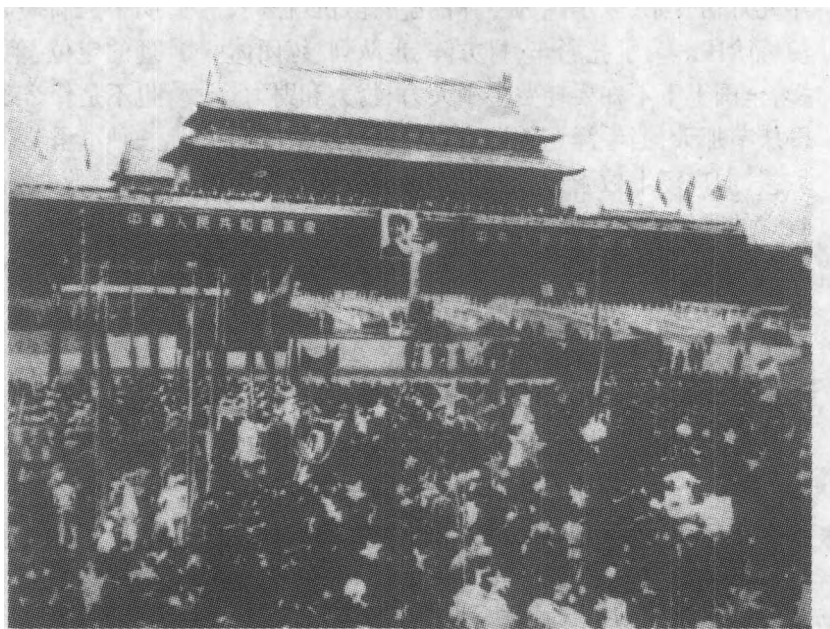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成立,一直采用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和群众游行的方式,作为每年的国庆节的中心仪式。其中有几次还增加了阅兵仪式。直到1971年发生九一三事件,临时将集会游行改为游园活动。此后,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他登临天安门城楼检阅游行队伍。一年一度的国庆游行才划上了句号。以后的领导人,在国庆35年和50周年再次举行了隆重的游行和阅兵。明年是建国60周年,届时选择什么仪式进行庆贺,是一个公众关注的问题。

我认为,包括明年在内,今后每年都可以选择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人士到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方式,作为国庆节的主要仪式。坚持这种国庆仪式的创新,有两点重要意义。

其一是节约人力、物力、财力。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和阅兵仪式,往往要调动上百万人员,事前排练数月,对人们正常的生活和工作不可能没有影响。花费的资金,更是天文数字。如果将这些资金用于解决民生的急需,也许更符合公共财政的本义。十年前,参加过开国大典并且为之自豪的李慎之先生,已经指出过放弃这种耗资巨大的庆典方式的历史必要性。他的意见也得到了无数人内心的共鸣。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库日趋充盈,一些官员滋长了铺张

排场的风气。地方的政绩工程、豪华庆典,屡禁不止。如果中央政府明年能够选择俭朴的仪式庆贺建国60周年,既是对地方政府的良好垂范,也是对奢华的官场风气的警示。

其二是对主权在民的政治理念的宣示。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各级官员,应当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往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广大人民群众在广场上欢呼万岁的方式,实际上暗示着一种权力关系,领导人处于权力的上位,平民百姓处于权力的下位。存在决定意识,中国人在上个世纪的几十年间的确经历过普通人无条件忠于领袖、亿万人崇拜领袖的历史。当时人们乐于接受这种仪式,和国人普遍的文化心理是高度吻合的。经过上世纪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醒悟:从来没有救世主,领袖不是大救星。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而是领袖应当忠于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再让人们向领袖山呼万岁,就不合时宜了。今年国庆的天安门广场,国家领导人和各界人士以平等的身份参与仪式,领导人以谦恭的态度向先辈表示敬意,向人民表示忠诚,这符合现代民主的执政理念,也容易为公众接受。如果今后每年的国庆节,都能以庄严郑重的仪式宣示主权在民的理念,对于推动中国公民社会的建设,将颇为有益。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

# 对明年国庆的希望

● 赵 诚

今年国庆节，以一种新的形式进行了纪念。没有大型集会，没有盛大阅兵，由国家领导人和首都各界人士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致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有着近现代历史叙事的浮雕。近年来国内史学界对近现代历史事件学术上有不同的看法，海峡的另一边对历史也有自己的记忆和见解，但目前，在中国社会各界对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寄予的认同是没有分歧的。它是对近代以来为中国的自由和进步所牺牲的，有名的和无名的先烈们的一个全国性标志纪念物。所以，每当人民共和国有大事，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成为全国官民的瞩目之地。外宾来访也来此纪念。今年的国庆庆典，采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纪念先贤的方式，是个有创意的革新，这个新形式是国家在国庆日纪念仪式上的一个重大进步。

从世界的视野看，各国对国庆日的纪念有所不同。如大英帝国这样的老牌国家，对建国日全国各地人民没有一个认同的日子，权以女王的“官方诞辰日”来替代，它只是一个全国性假日，并没有什么国家庆典。美国的国庆也只是“独立宣言”纪念日，由美国人民自己庆贺，并没有耗费巨资的大型的国庆庆典或阅兵传统。俄罗斯的国庆节现在是6月12日，1990年的这一天，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并发表了主权宣言，宣布俄罗斯主权独立。目前俄罗斯每年的国庆节也没有庆典，只是一个全国性假日。当然不同国家有自己对国庆的纪念的不同方式和纪念内容，如法国每年还在阅兵，但这既不能说明法国强大，也不说明这是一个最好的国庆纪念方式。多数发达国家并不在国庆日大阅兵。中国的大阅兵也是当年“一边倒”时从苏联模式学来的，如今中国已有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路子，仿苏式的国庆“逢十”大庆的大阅兵可不必再行效仿。何况炫耀军事力量的阅兵，也不代表人类文明的未来方向，它只是代表人类的过去，代表在野蛮时代，在“丛林政

治”的世界上，人类不把自己武装到牙齿就无法安全生存的状态。在“丛林政治”的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军事强国可以长盛不衰。那种军事强大的荣耀都是暂时的。瑞士人在中世纪一段时间曾是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能征善战，但国民并不能长久幸福，最后走上现代文明的和平发展道路后，反成了人类文明的一种楷模。

中国改革开放已30年，尽管社会有了很大进步，但人民的生活仍不很富裕，特别是很多农村和中西部地区人们的生活还是较贫困的。50周年大庆，已花了大量财力重修北京和天安门广场，今年奥运会对北京又进行了大量投资改善交通市容，当前国家如有剩余财力，应在灾区、中西部和教育上加大投入，首都不必锦上添花了。明年是共和国60周年大庆，希望领导人能走出传统模式，继续沿用今年的方式，办一个简朴有意义的国庆仪式。还可在纪念碑前点燃纪念火炬，为中国社会走向政治文明做出一种标示。在国庆日，对那些为国家自由和进步而牺牲了的国民进行纪念，比用国家军事力量进行炫耀能更好地引起后人对先烈理想、精神的追思和传承。

（责任编辑 吴 思）

## 本刊扩版调价启事

应作者和读者要求，从2009年1月起，本刊篇幅从84页增加到92页。由于扩版和纸价大幅上涨，自2009年1月起，本刊定价从5.80元提高到6.90元，全年82.80元。

炎黄春秋杂志社

## 敬告读者

《炎黄春秋》精品书系（91年—95年）库存不多，欲购从速。本书系定价125元，另加邮挂费12元，合计137元。

汇款地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炎黄春秋杂志社，邮编：100045，电话：010-68532048。

炎黄春秋杂志社

# 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

## ● 杨继绳

统购统销,从1953年开始直到1992年底停止,共施行了39年。今天,回顾这一段历史,会给我们以新的启迪。

### 统购统销以前的粮食情况

据国家统计局数字,城镇总人口由1949年的5765万增加到1954年的8249万,5年增长了43%。(《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81页。)粮食部统计的1953年城镇人口为9182万,这是从粮食供应的角度统计的。以粮食为原料的工业的发展,对粮食的需求也大幅度增加。国家对粮食的征收和收购数由1950年的355亿斤增加到1953年的721亿斤,3年增加了一倍以上,但还不能满足城市的需要。当时中央14个直辖市(京、津、沈、旅大、抚顺、鞍山、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上海、武汉、广州、重庆)的粮食销售量,以1950年为100,1951年为147,1952年为228,粮食供求矛盾十分尖锐。在1952年7月1日到1953年6月30日这个粮食年度内,国家的粮食收支出现了40亿斤的赤字。(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4年,9月。)

表1 1950—1953年全国粮食征购与产量的比较

| 年份   | 产 量  |     | 征收和收购 |       | 征 收 |       | 收 购 |       |
|------|------|-----|-------|-------|-----|-------|-----|-------|
|      | 数量   | 百分比 | 数量    | 百分比   | 数量  | 百分比   | 数量  | 百分比   |
| 1950 | 2646 | 100 | 356   | 13.45 | 266 | 10.05 | 90  | 3.40  |
| 1951 | 2876 | 100 | 479   | 16.66 | 299 | 10.40 | 180 | 6.26  |
| 1952 | 3271 | 100 | 596   | 18.22 | 282 | 8.62  | 314 | 9.60  |
| 1953 | 3318 | 100 | 721   | 21.74 | 316 | 9.52  | 405 | 12.21 |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粮食部资料室,1954年。注:征收,即农业税(公粮),是无偿的;收购,即交易,是付款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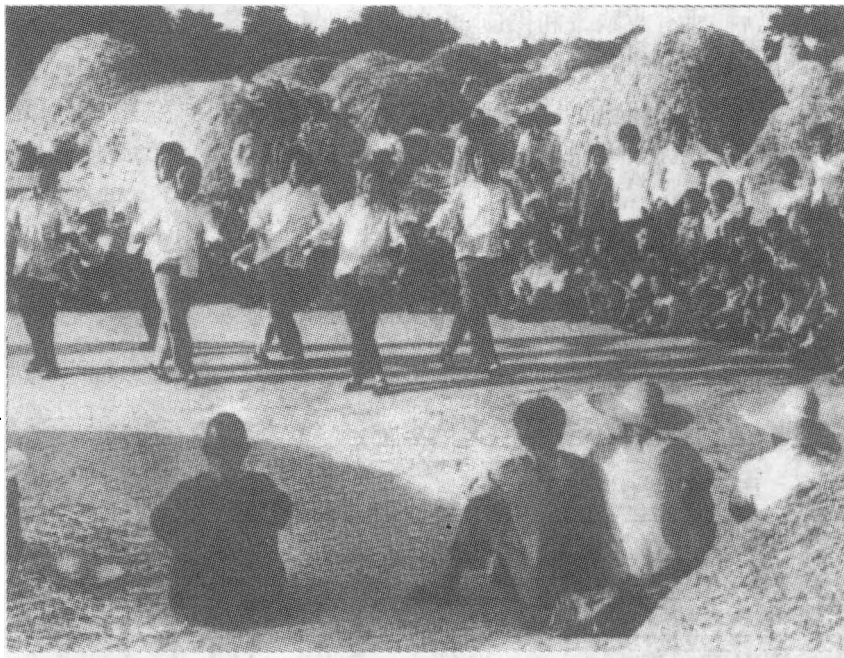
随着工业建设的发展,城市人口继续大幅度增加,粮食供应形势日益严峻。1953年6月的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的结论是:问题很大,办法不多,真有点难以为继。(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55、256页)

1949年以后,由于结束了几十年的战争,加上土地改革,粮食产量是逐年增加的,粮食产量以1949年为100,则1950年为117,1951年为128,1952年为145,1953年稍高于1952年,1953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最高年度的10%。(章乃器:《五年来的粮食工作情况——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4年,9月)但是,国家征购的增长高于粮食产量的增长。而国家征购的增长又赶不上对粮食需求的增长。1953年,需要国家供应商品粮的人口为24788万人,需要商品粮总数为659亿斤(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粮食部资料室,1954年),此外还有军粮和出口粮食。1953年,国家征购粮食721亿斤,和1952年相比,产量只增加1.44%,而征购数量却提高了20.1%。

表1可以反映出国家征购粮食数量急剧增长的情况。国家从农民手中拿走的粮食(公粮加上收购),1950年占产量的13.45%,1953年增加(单位:亿斤)到21.74%。这是统购统销以前的数,在以后的年代,这个比重继续大幅度提高。

粮食紧张,除了城市人口和工业用粮增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停止了城市的粮食进口。1949年以前,大城市的面粉工业的原料有相当一部分是进口小麦。据交通大学研究所的调查统计,从1922年到1930年平均每年进口洋麦

2516956担,上海面粉工业所用的洋麦占其面粉产量的28.78%,即每年有三个半月用洋麦做原料。自1931年以后,洋麦人口激增,低价倾销我国。上海进口洋麦数逐年增加,到1933年,每年12个月中有10个月用洋麦做原料。(交通大学研究所调查报告:《解放前洋麦进口情况》,1954年)粮食部长章乃器1954年9月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自豪地说:“我们扭转了50多年来依赖洋米、洋麦的进口趋势,米麦反而有一些出口。”



1978年凤阳县产粮2.9亿斤,1981年达到6.4亿斤。

图为凤阳县农民在打花鼓庆丰收

为了搞好粮食供求平衡,1952年成立粮食部。像财政部保

证财政收支平衡一样,粮食部保证粮食收支平衡,尽可能多收入,尽可能少支出,按月、按季分析粮食收购和销售情况。粮食部成立之初,还没有进行城乡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搞统购统销,还有粮商,有粮食市场。因此,国家必须和私商争粮。来自公粮征收和市场收购的比例,1951—1952年度为39:61,1952—1953年度为44:56。当时估算,1953—1954年度,国家需要掌握粮食700多亿斤,除了农业税可以拿到275亿斤以外,还需要收购431亿斤(上年度实际收购243亿斤)。靠市场收购这么多粮食是不可能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第258页)

章乃器在上述发言中认为:“我国粮食问题的本质,反映了国家计划经济与小农经济和自由市场的矛盾;反映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与农民自发势力的矛盾……归根结底,是反映了社会主义因素与资本主义因素之间的矛盾。”作为一名非执政党人士的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表的这一看法,显然是代表了当时权力主流的看法。

## 陈云肩挑一担炸药

面对粮食短缺的尖锐矛盾,毛泽东让中央财

经委员会拿出办法。中财委负责人陈云顾不得养病,1953年7月23日急忙赶回北京。中财委开始提出8种方案,最后选定统购统销的方案。陈云1981年回忆说:“我下决心搞统购统销,钻了两个礼拜。那时候许多同志不赞成……到了十月一号,在天安门城楼上,我跟毛主席讲,不搞这个我们没有出路。”(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传(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618页)所谓统购统销就是借助政权的强制力量,农民生产的粮食全部卖给国家,全社会所需要的粮食全部由国家供应,农民自己食用的数量和品种也得由国家批准后才能留下。全国城镇5000多万个家庭每家一个粮本,凭粮本供应粮食。在市面上没有国家的粮票买不到一口吃的。1953年10月10日,在全国粮食会议上陈云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一个,都是危险家伙。”(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陈云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8页)

1953年10月2日晚,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了陈云的汇报,采纳了陈云的建议。10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以后政务院又发布了相关命令和执行办法。

从此以后“所有收购量和供应量,收购标准和供应标准,收购价格和供应价格等,都必须由中央统一规定或经中央批准”。统购统销不仅是解决城市粮食问题的手段,也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

当时全国自耕农户有一亿几千万户。国家直接向一家一户收购粮食遇到了技术上的困难。于是,把分散的农户组成合作社就成为必要。农业集体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也是粮食

1954—1955 年粮食年度,征收 309.8 亿斤,收购 569.73 亿斤(指标分配到各大区)。二者合计 879.53 亿斤,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21.98%。(《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委给粮食部下达的计划指标》,1954 年 6 月 15 日。),而 1954 年是百年不遇的大水灾。

在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以后,还对生猪、鸡蛋、糖料、桑丝、蚕茧、黄红麻、烤烟、水产品实行派购,品种多达 132 种。对这些产品农民都不能

表 2 1956 年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 (单位:市斤)

| 居民类型               | 十五个城市<br>的标准 | 国务院<br>规定标准 |
|--------------------|--------------|-------------|
| 平均数                | 26.07        | 27.70       |
| 特殊重体力劳动者           | 51.72        | 55.00       |
| 重体力劳动者             | 41.49        | 44.00       |
| 轻体力劳动者             | 32.57        | 35.00       |
| 大中学生               | 32.75        | 35.00       |
| 一般居民及<br>10 周岁以下儿童 | 26.15        | 27.50       |
| 6—10 岁儿童           | 20.56        | 22.00       |
| 3—6 岁儿童            | 8.85         | 9.00        |
| 3 周岁以下儿童           | 7.89         | 8.00        |

资料来源:粮食部计划司统计资料,1956 年。

统购统销的需要,即国家控制粮食资源的需要。

在统购统销中,国家规定了城镇人口每月的粮食定量。各省为了使自己有一定的余地,在国务院规定的定量中又扣除一部分,使居民的粮食定量低于国家的定量。今天看来,城镇这个定量并不低。但当年副食供应很少,吃不上油,吃不上肉,粮食是人们热量的主要来源。虽然城镇居民总是感到饥肠辘辘,但对农民来说,这种有保证的粮食定量是一种求之不得的特权。

统购统销是 1953 年 12 月实行的。1954 年 9 月,粮食部长章乃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粮食问题的发言中说,1953 年 7 月—1954 年 6 月粮食年度,粮食收购数比上一年度增加了 77.78%,1954 年 6 月底以前的库存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51%。这仅是统购统销实行半年的成果。

章乃器部长说粮食库存比上一年同期增加了 51%,这是事实的一面。但是,还有事实的另一面,即由于粮食需求增加,使库存逐日减少。第二年,统购任务进一步提高,1954 年 6 月 15 日,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给粮食部的计划是:

自由买卖。价格也由国家统一规定。全国城乡居民所需要的粮食、布匹、食油、猪肉等生活资料全凭国家印发的票证供应。票证达十几种,成了第二货币。国家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低于其价值,而卖给农民的工业品高于其价值。这就是所谓“剪刀差”。“剪刀差”实际上是一种“暗税”。农民向国家除了缴“明税”,即公粮以外,在售农产品的同时,还上交了“暗税”。从实行统购统销到改革开放期间,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到底从农村拿走多少财富?专家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计算,其中最高估计是 7000 亿元(牛若峰,1992),

最低估计是 4481 亿元(徐从才、沈太基,1993)。剪刀差使中国农村一贫如洗。统购统销也加剧了城乡分割,拉大了城乡差距。然而,正是中国农民这一份可贵的奉献,为中国工业建设提供了原始积累,从而建立了初步的工业基础。没有农民的奉献,也不会有“两弹一星”。

## 统购统销和中国农民

统购统销以后,征购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比实行统购统销以前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左右。从表 3 中可以看出,1954—1955 年度征购比重最大,多收了 70 亿斤粮食,造成了农村粮食十分紧张,后两个年度的征购数不得不下降。国家收购的应当是农民的余粮,但把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也收购走了。超过余粮部分称为“过头粮”。由于征了“过头粮”,不得不再“返销”给农村。每年返销给农村的粮食中征购粮食的比重达 38.9%到 49.3%(见表 4)。这些粮食在城乡之间往返运输,造成了很大的浪费。尽管浪费,政府先

把粮食抓到手比较稳妥放心,“过头粮”还是年年征。返销给农民的粮食比“过头粮”要少。

自从实行统购统销以后,中国农民就一直处于半饥半饱状态,刘少奇曾经坦率地承认这一点:

现在国家对粮食的需要量,同农民愿意交售的数量之间,是有矛盾的,而且矛盾相当尖锐。如果按农民的意愿,他只愿意在自己吃饱了以后才把多余的粮食卖给国家。假如让农民统统吃饱了,然后国家才征购,那末,我们这些人就没有饭吃了,工人、教员、科学家以及其他的城里人都没有饭吃了。这些人没有饭吃,工业化也搞不成了,军队也要缩小,国防建设也不能搞了。(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27日,载《刘少奇选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1—442页)

饿着肚子把粮食卖给国家,农民当然不乐意。因此,为了完成过高的统购任务,必须施以政治压力。有些地方,对没有完成任务的农民随便扣上种种“帽子”进行斗争。封门、搜查、捆绑、吊打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均有发生。有关文献记载:“广东省新会县莲溪乡党支部在县委负责同志指示下捆绑农民,全乡捆绑了八九个人,乡干部拿着秤挨家挨户收粮食,不卖的当场绑起来。将一名用粮食喂鸭子的中农进行斗争。甚至没收了不卖余粮的农民的土地证。高要县第九区在购粮中捆打了53人、搜屋36户。湖南全省因购粮问题被迫自杀者111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委员会办公厅:《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第291—293页)据粮食部统计,1954年统购中死亡710人,其中自杀566人,自杀未遂35人,送粮而死的74人。主要是被迫自杀。其中湖北150人,河北130人,河南108人。显然,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关于统购统销的报告》,1955年)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1955年2月2日《华南分局关于目前农村紧张情况与措施的报告》反映实行粮食统购以后,农村的紧张情况:一,在购粮运动后期(1954年12月下旬),各地都普遍发生

表3 “大跃进”以前粮食产量和征购情况 (单位:亿斤)

| 产量与征购         | 1953—1954     | 1954—1955     | 1955—1956     | 1956—1957       | 1957—1958          |
|---------------|---------------|---------------|---------------|-----------------|--------------------|
| 产量            | 3337          | 3390          | 3678          | 3855            | 3898.2             |
| 征购数<br>(折贸易粮) | 1003<br>(828) | 1078<br>(903) | 1041<br>(860) | 994<br>(838.48) | 1038.3<br>(854.74) |
| 占产量比重(%)      | 30.1          | 31.8          | 28.3          | 25.8            | 26.6               |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

表4 “大跃进”前返销回农村的粮食数 (单位:亿斤)

|                    | 1954—1955    | 1955—1956    | 1956—1957    | 1957—1958    |
|--------------------|--------------|--------------|--------------|--------------|
| 返销回农村的粮食<br>(折贸易粮) | 494<br>(401) | 405<br>(334) | 490<br>(402) | 429<br>(351) |
| 占征购粮食的比重(%)        | 45.8         | 38.9         | 49.3         | 41.3         |

资料来源:粮食部统计司1957年7月表格和粮食部1958年2月6日表格,1957—1958年度不是最后数。

农民大量杀猪杀鸭的情况。二,在中山、新会、南海等部分地区,发生农民退田,甚至交土地证,认为这些土地产量低,负担不起购粮任务。三,农民吃不饱,生产积极性不高,出勤率大大降低;四,农民对粮食问题顾虑很大,中山县港口镇附近的农民在晚间偷偷去看粮仓中的粮食是否运走,农民看到调运粮食的船开走后站在河边哭泣。没有领到购粮证的缺粮户到干部家中哭哭啼啼。五,对党和政府普遍流露出一种不满情绪。“辛苦一年没得吃”,“共产党好是好,但是现在整死了”。这篇报告还透露曾发生过群众性暴乱事件——“中山港口事件”。(黄道霞、余展、王西玉主编:《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231—232页)

1955年4月22日,国务院第一办公室提供的几篇题为《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中反映,山东郓城县按实际产量只能购余粮2022万斤,上级下达了3300万斤任务,实际完成2900万斤。由于任务过重,干部强迫命令,比较普遍对群众捆打游街。三区一副区长在彭庄乡陈庄领导秋购中,造成自杀3起。区干部在杨庄集逼粮,打8人,扒衣服挨冻16人,吓跑3人,一些群众不敢在家里睡觉。郓城县自统购统销以来,曾发生两起群众骚乱。浙江金华地区在粮食征购中,违法情况严重。据东阳、义乌、浦江、金华、兰

溪、寿昌、建德、汤溪、淳安等9个县统计,共有570名干部有强迫命令和违法乱纪行为。其表现:搜仓、封仓、封碾257户;非法关押、斗争、捆绑、吊打、刑讯逼供农民178人,罚款24户。(国务院第一办公室:《关于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调查》,1955年4月22日)

浙江省1954年粮食产量141亿斤,征购51亿斤,占总产量的36%强。由于统购粮食任务重,农民顶牛,干部强迫命令。1955年粮食工作中,除附加7%外,又扫了几年尾欠。全省公粮完成112%。统购中顶牛,死了134人。龙游县因粮食供应不足饿死4人。衢州地委副书记到开化县一个村了解,全村72户,只有3户有饭吃,农民吃树皮、草根,脸色青肿。开化县126个村,这样的村有39个。农民说:“共产党把我们当鱼鹰,脖子一压,大鱼小鱼都吐出来了。”杭县开扩大干部会,乡村干部哭的就有20多个。上面批资本主义尾巴,群众骂不实事求是。(《浙江省农村工作部长吴植榛在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发言》,《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4页)另一报告也反映了浙江统购统销以后的情况:“现在猪、羊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卖家具,吃种粮,要饭,卖子女,请愿,老弱者躺在床上饿死等现象已续有发生,呈不稳之象。”(《杜润生、袁成隆关于浙江省农村情况的报告》,1955年4月11日,《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242页)

在统购统销期间,出现了大量的农民反抗。在甘肃通渭、贵州麻山曾发生过大规模的骚乱。湖南常德地委做出决定:“对破坏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反革命分子,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治罪。”(《常德地区志·粮油贸易志》,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2页)云南在统购统销实行初期,发生过批斗农民,导致多起死人事件,也发生过暴力抗拒(《云南省志·粮油志》,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51页)。四川省德昌县在1954年成立“保卫粮食统购统销办公室”,召开群众大会25次,判决29人,其中死刑1人,有期徒刑23人(《德昌县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615页)。1953年四川石柱县法院与公安局组成“保卫收购办公室”召开公判大会9次,判处死刑2人,有期徒刑5人,管制2人(《石柱县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449

页)。1954年福建省邵武县发生群众骚乱,定性为“反革命煽动群众,破坏粮食统购统销”,逮捕114人,16人被处决,56人判有期徒刑,9人管制(《邵武市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3年,第1297—1299页)。

农村粮食的确紧张。粮食部门怎样看农村粮食紧张呢?1955年粮食部为李先念副总理起草的报告中是这样说的:

有人认为,今年春季,我国农村粮食情况的某些紧张,主要是由于国家统购的粮食过多了。是不是这样的呢?不是的……两年来粮食统购数量我认为没有超过农民可能的限度。我们供应给农村的粮食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如果还要我们多销,那是说不过去的。

报告列举了地主、富农闹粮的例子后接着说:

农民叫喊缺粮食是虚假的,都是农民自发势力的叫喊。粮食紧张是不是出口多了呢?不是。1953年出口粮食32亿斤,1954年出口39亿斤,为了进口机器设备,不出口是不行的。

令人悲哀的是,粮食部门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左右了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思想。不管农民怎样发出饥饿的哀嚎,上面都当成是“自发势力”的叫喊,而当时认为农民中间的“自发势力”是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甚至当做反革命煽动的结果。情况最严重的可能要算广西。由于虚报产量,征购过多,1955年广西饿死的人数以千计。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有的干部不服,认为饿死人是统购统销造成的。说这些话的干部被开除党籍。

## 多征少销 确保库存

1957年7月16日上午,全国粮食工作会议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会议由陈云、李先念主持。这是1957年的第二次粮食会议。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两位主管粮食的最高领导人深受粮食紧张之累。陈云首先在会上叫苦:

上一年度挖了六七十亿斤库存。亏得四川调入了50多亿斤才救了急。目前全国可供调拨的粮食极少,已经发生了调度不灵的情况。如果再遇到一个灾荒就不行了。现在看来,国家的粮食库存,要能够应付两个灾年才行。我们能够对付两个灾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稳定的。《《全国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7月)

两个灾年需要多少库存呢?这次会上分析,国家应付一个灾年需要430亿—450亿斤库存,应付两个灾年需要480亿—500亿斤库存,最好能有600亿斤库存。

当时全国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陈云在8月31日的讲话中说,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和粮食购销工作结合起来,用社会主义教育推动粮食收购工作。乘着社会主义教育和年景较好的机会,应当多收一点粮食。陈云传达毛主席的话说,正常年景粮食征购不得少于850亿斤(《1957年第二次粮食会议文件》,1957年8月)。这次会议初步认定1957—1958年度粮食征购计划为856.32亿斤(贸易粮),销售计划为757.20亿斤,财政供应粮食(即军粮)18亿斤,出口36亿斤。收支相抵,可以有45.12亿斤补进库存。1斤贸易粮大约相当于1.15斤到1.2斤原粮(这个折算范围依原粮质量好坏而定)。国家征购的都是贸易粮,而给农民的口粮都以原粮计算。社会主义教育实际就是批判资本主义,把大批判和粮食征购结合起来,强化了征收过程的暴力性。

但是,这次粮食会议上定的计划遇到各省的抵制。经过中央和地方反复讨价还价,在1957年9月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国家对粮食征购计划减少到852亿斤,销售提高到767亿斤,再加上出口和军粮支出,库存只能增加31亿斤。陈云在会上说,据农业部估计,1957年全国粮食产量可达3685亿—3700亿斤,比上一年增产35亿—50亿斤。从中央到省到专、县,层层下达季度、月度统购统销指标,专、县两级只能执行,不能改变指标。省里可以改变指标,即对中央下达

的征购指标稍加提高,对中央下达的销售指标稍加压缩,为省里留下一定的调剂余地,省里改变指标可以先斩后奏。又经过和各省领导人的讨价还价,原来的852亿斤的征购指标还是不能落实,减为847亿斤。李先念根据毛主席“压缩销量”的指示,将销量由原来的767亿斤,减为748亿斤。军粮18亿斤和出口36亿斤不变。中央与地方的这一轮博弈,中央取胜:中央库存增加计划由原来的31亿斤增加到45亿斤。

进入1958年,粮食购销形势使中央政府更加焦虑。195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购销工作的指示》(中发[58]104),这个文件指出,要完成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任务相当艰巨,现在个别地方有些农民开始闹粮,其中有些是真缺粮,有些是假缺粮。中央要求销售粮食力争不要突破计划,收购粮力争超额完成任务。在这期间,中央和地方正在博弈。1957—1958年度最后的实际结果是,征购920.11亿斤,销售842.09亿斤。征购比计划增多,销售比计划减少。在博弈中还是中央占优势。

1958年冬个别地方开始出现饿死人的情况,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继续发展,农民是守着几百亿斤粮食库存饿死的。1959年4月到1960年4月,是饿死人最多的一年。在这期间,库存粮食最高达887.03亿斤(1959年11月初),最少也有319亿斤(1960年5月)。1960年4月,是春荒最为严重的时候,这时粮食库存为403.51亿斤。(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历史资料:粮食部计划司1962年统计表。)这是贸易粮,折合原粮为482亿斤,按当时口粮标准计算,相当于1.4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拿出一半库存粮食来救人,也不会饿死人!

## 改革使统购统销退出历史舞台

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统购统销可能一直继续下去。1978年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提高,粮食真正多了起来。1984年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其他农副产品也大幅度增长。

此时农民强烈要求取消统购统销。但城市职工和国家财政难以承受。国家只能兼顾城乡利

益,采取折中和逐步的方式。

1983 年中共中央 1 号文件指出,“对重要农副产品实行统、派购是完全必要的,但品种不宜过多。”

1984 年中共中央 1 号文件又指出,“要随着生产和市场供给的改善,继续减少统派购的品种和范围。”

到 1984 年底,统派购品种从 1980 年的 183 种减少 38 种(其中 24 种是中药材)(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年,第 207 页)。实行了 32 年的统购统销开始瓦解。

1985 年,国家不再对农村下达指令性的收购计划。而是采用“合同定购”的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

1985 年底,中央提出了“逐步缩小合同订购数量,扩大市场议购”的新方针。

然而,只要粮食价格不放开,没有粮食市场,统购统销就不能真正取消。而粮食市场的形成,必须由市场供求定粮价。在统购统销实行的几十

年间,为了适应城镇职工的低工资,农产品实行低价政策,即靠农民支付的“剪刀差”来补贴城市职工。1979 年,国家提高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政府卖给城镇居民的粮食价格低于从农村的收购价。差额由国家财政补贴。1991 年,粮食价格补贴 400 多亿元。其中城市补贴 200 多亿元。平均每个市民补贴 130 元—150 元。用这些钱可以买好大米 100 公斤(杨继绳:《邓小平时代》,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 398 页)。但是,放开粮价的政治风险太大,迟迟不能决定。五六十年代,玉米面提价一分钱,事先要层层开会,做好充分的思想动员,还让党员以党的纪律保证不去抢购。1992 年底,各地的库存粮食多,库存粮食占压不少资金。这时放开粮食价格,不仅不会出现抢购,还会给粮食部门减轻负担。

1992 年底,全国 844 个县(市)放开了粮食价格,粮食市场形成,统购统销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责任编辑 萧 徐)

(上接 32 页)生意义讨论的基本情况,陈述了我们写作总结的思路和思考。专家们对此十分感兴趣,因此介绍和陈述占了很多时间。然后大家对文稿各抒己见。专家们对文稿的基本观点和论述方式没有提出什么修改意见,只是有的专家提了一些具体表述问题,如对于社会不正之风的批判措词应缓和一些,又如对于认识上存在争议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观点是否不宜多引和展开阐述。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专家们的看法并不一致,进行了一些争论。我和陈汉涛也谈了对这些意见的看法。26 号,我俩认真修改并打印,花了一天时间,主要是删去一些关于不正之风的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有争议的语句。27 号上午把修改稿送交王惠德同志。28 号下午,王惠德同志即阅毕退回。

随后,团中央主管宣传的书记高占祥同志肯定了稿子,但提出要加上共青团十届二中全会号召青年投身四化建设要有“脚踏实地的创业精神”、“勇于献身的气概”,要当“身体力行、兢兢业业的‘实干家’”等话语。我们按此意思在文稿第四部分增加了一段话。至此,总结文章最后定稿。

1981 年 3 月,第 6 期《中国青年》以 10 页篇幅,登载了《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署名为“本刊编辑部”。

总结文章登出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读者纷纷致

函编辑部。他们说:《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是对‘人生意义’问题讨论的一篇公正的答卷”;“受到很大震动,泪水夺眶而出”;“真是雪中送炭,忍不住成段地摘抄下来”;“我决不让‘文化大革命’留下的心灵创伤继续‘留’下去,要同亿万青年一道开拓人生的道路”……

《中国青年报》全文转载了总结文章,《人民日报》以整版篇幅刊登摘要。

从 1980 年 5 月开始的这场有历史意义的“人生意义”大讨论,以 1981 年 3 月第 6 期《中国青年》刊出总结文章《献给人生意义的思考者》为标志,宣告结束。以后,《中国青年》上还发表过什么有关“潘晓讨论”的文章,那已经不属于这个讨论本身了。1983 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我因主持这个讨论而受到严厉批评,要我作检查,说“潘晓讨论”的核心问题是宣扬个人主义。我不能认同这种说法,拒绝检查。随后,就调离了中国青年杂志社。嗣后,《中国青年》刊登了对“潘晓讨论”的批判和检讨。

尽管我遭受不公正的批评和很大的压力,可我对于主持“潘晓讨论”从不后悔,我毕竟做了一件我很想做的有意义的事,我自己也从中受到启迪,获得很多教益。

(作者是中国妇女杂志社原社长兼总编辑)

(责任编辑 吴 思)

# 胡耀邦约黎白写《湘潭黎氏》

● 黄宗江

《湘潭黎氏》是一套五厚册长篇传记,写的是上个世纪以来,这一书香门第涌现了八兄弟,在学术界、科学界、艺术界、音乐界和教育界都大有成就、很有代表性的大知识分子——黎锦熙、锦晖、锦耀、锦纾、锦炯、锦明、锦光、锦扬,人称黎氏八骏。这一系列列传是他们的子侄黎白所撰,妻张梦媛助阵。我尚未展卷,首先想到的,是幼时学过注音字母,亦称国音字母,就是锦熙所创;唱过“小白兔乖乖……”就是锦晖的词曲。我再也没想到和我有相同经历的,就是在作者后记里提到建议他写出此书的胡耀邦同志。胡是长征中一红小鬼,我则白区一学童,居然有如此共识。

1948年,是60年前了,在太原前线,胡耀邦是一兵团首长,对小兵黎白说:“我小时候读书不多,可学过注音字母,那是你大伯父创造的,唱过‘小白兔乖乖,把门儿开开……’那是你二伯父写的,全中国小学都是必修的音乐课程。在红军里,我们唱的一首歌就是用《桃花江》的谱曲。我和萧华同志在少共国际师都会弹琴,弹奏手法就是你二伯父发明的,弹的曲子也是你二伯父写的呢!”

事隔30多年,耀邦已任中共中央主席,偶见黎白,一眼就认出来了,劈头就说:“我有一个建议,要你写一本你们湘潭黎家的长篇传记文学。我这个湖南人对你们湖南黎家还是有一些了解呢!你的几位长辈,对中国革命、中国语言文学、文学艺术、音乐歌曲、工程铁路、普及教育都是有很大贡献的。你是作家,知道毛主席讲过,《红楼梦》是反映中国封建社会上层社会的横断面,《金瓶梅》是反映中国封建社会底层社会的横断面。写你们黎家,我看是反映辛亥革命以来的民主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知识分子阶层的横断面。意义很大。我看应该从辛亥革命写起,写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写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你看怎么样?”

又说:“我可不是以中央主席来命令你的啊,

是建议,一个很认真的建议。几年前,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争论时,我就想过要组织作家写一些真正实事求是反映我们国家几十年近百年历史的文学作品。今天是巧遇,碰到你嘛,就找你商量商量。我是热心建议你写的,只要下决心,有困难就给我写信,帮你找找历史资料,我还是力所能及的。我建议你写小说,但主要人物要用真名真姓,大历史背景要真实,细节由你去编,这样写影响不同,对不对?”他还把他的办公室和家里的电话写给黎白,又说:“至少,我可以帮你向中央档案馆要材料嘛,你开个单子给我就可以了。我有信心,等着你的大作呢!这可不是一桩小事,不是一般的文学作品,你一定要看到重要性和必要性啊!”他看看表,朝黎白一笑:“我开会去了。你认真想一想,写黎家,我不找你找哪个?”说罢他匆匆走了。

于是黎白十年准备,六年笔耕,从资料搜集、访问亲友,至完成全稿,共用了一十八载,终于完成了耀邦交代的任务。黎白著《湘潭黎氏》五部十二卷就摆在我们的面前了。

我飞速翻阅,奔马观花,感慨万千。我难置一辞,谨录后记中耀邦原话,此巨作的意义尽显。我不禁联想起中国诸多书香世家,如津门梁启超氏(原籍广东新会)后裔诸思辈,周叔弢(原籍安徽安庆)后裔诸良辈,他们的学问都是如何地丰富了中国文化史、思想史乃至社会史、政治史。

他们均未能逃脱沦为“臭老九”的命运。黎锦熙长毛泽东三岁,毛受业称师,书中存毛年轻时致黎六封书札。数十年来,黎对毛是充满了希望,又不禁失望,乃至绝望了。此书虽未能尽言,倒也吐露真言了。想起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者,认为当年始皇帝焚坑尚不足!悚然!

我无力亦无须为此数百万言书简述,谨写千字文,为当今书生介绍。此书所涉及的一百多位人物完全都是用了真名真姓,重要的历史人物如

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钱玄同、胡适、赵元任、鲁迅、周作人、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聂耳，还有朱德、贺龙、聂荣臻、滕代远、谭延闿、唐生明、张道藩、戴笠……还有至亲密友黎莉莉、罗静予、黎明健(即于立群)、徐来等等。

我谨做此简而又简的简介。巴金生前多次提出“惟有不忘过去，才能做未来的主人”。我近年作文常引此语，却均被京津沪各大报删去。有权者不知为什么就想让人忘记过去忘记历史，甚至忘记包括此书的倡导者、被人民尊敬的共产党人

胡耀邦。在这里说个惨痛的笑话做结束语：

几年前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我的亦师亦友的阳翰笙同志的百年纪念。我要了我厂的一辆小车，司机中专毕业，正巧是翰老同乡内江专区人。我说：“阳翰笙是四条汉子的一个，这四条汉子你不晓得，四人帮你是晓得的？”他说：“当然！”我问：“哪四个？”他立即回答：“江青嘛！”我再问：“还有呢？”他略迟疑，响亮回答：“胡耀邦嘛！”呜呼！总想让人忘记历史的人——祸国殃民！

(责任编辑 萧 徐)

| 书 名                           | 作者或主编               | 定价    | 邮 费  |
|-------------------------------|---------------------|-------|------|
| 夹边沟记事                         | 杨显惠                 | 34.00 | 7.00 |
| 沉思录                           | 马可·奥勒留著 何怀宏译        | 20.00 | 5.00 |
|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             | 傅国涌                 | 30.00 | 6.00 |
|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              | 赵 诚                 | 28.00 | 6.00 |
|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 戴 煌                 | 21.00 | 5.00 |
| 民主是个好东西——俞可平访谈录               | 闫健编                 | 35.00 | 6.00 |
| 李锐反“左”文选                      | 李锐著                 | 22.80 | 6.00 |
| 1978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台前幕后 | 于光远                 | 36.00 | 7.00 |
|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 鲍·斯拉文著 孙凌齐 李京洲 李桂兰译 | 26.00 | 6.00 |
| 大寨寓言——“农业学大寨”的历史警示            | 陈大斌                 | 38.00 | 7.00 |
| 抹不掉的记忆——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             | 张广友                 | 32.00 | 7.00 |
|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 张纯如                 | 28.00 | 6.00 |
| 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           | 刘 冰                 | 34.00 | 7.00 |
| 张国焘传                          | 姚金果 苏 杭             | 39.80 | 7.00 |
| 恍若隔世——回眸夹边沟                   | 邢同义                 | 24.80 | 6.00 |
| 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               | 张 胜                 | 45.00 | 7.00 |
| 知情者眼中的周扬                      | 徐庆全                 | 24.00 | 6.00 |
| 淮海战役秘密战                       | 夏继诚                 | 33.00 | 7.00 |
| 辽沈战役秘密战                       | 松 植                 | 35.00 | 7.00 |
| 平津战役秘密战                       | 松 植                 | 36.00 | 7.00 |
| 综合哲学随笔                        | 高亮之                 | 22.00 | 5.00 |
| 庐山会议实录                        | 李 锐                 | 18.00 | 5.00 |
| 赫鲁晓夫回忆录                       | (俄)尼基塔·谢·赫鲁晓夫       | 29.00 | 6.00 |
| 沧桑十年——1966—1976共和国内乱的年代       | 马识途                 | 38.00 | 7.00 |
| 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           | 冯建辉                 | 29.80 | 6.00 |
| 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                   | 张素华                 | 28.00 | 7.00 |
| 红墙大事——共和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上下)        | 张树德                 | 69.80 | 8.00 |
| 马寅初全传                         | 彭 华                 | 35.00 | 7.00 |
| 1958—1962年的中国知识界              | 罗平汉                 | 32.00 | 7.00 |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注：邮购三本书以上，可按总书价的10%付邮费)

## 代购代邮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作者因提出“神化与特权”问题，开始了长达21年的“右派”生涯——一段疯狂、荒唐与阴暗的岁月在这里定格，一段惨痛、悲苦与抗争的生命历程在这里展开……

《夹边沟记事》这是一段尘封四十年的历史，讲述了大饥荒中发生的故事。当年的幸存者散落在各个角落，没有人问过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年的死难者早已化为白骨，连他们的后代也不知道埋在哪里。

《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1949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一年，本书选取当时不同年龄、不同倾向并做出了不同选择而各有其重要影响的十四位著名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日记、书信、回忆等最能袒露心迹、折射历史的文字与口头资料，使许多生动的细节、曲折的过程和未曾披露的真相一一呈现在读者面前。

《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见证一代伟大的水利学家黄万里先生高贵、执着的沧桑人生。

《李锐反左文选》1957—1978年的20年，中共走了一条漫长的“左”的错误道路：反胡风，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四清”社教，直到十年“文革”灾难。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的恶果之一。

了解中国政治，必读李锐文章

《尚未结束的历史：戈尔巴乔夫访谈录》

阅读此书，你不仅可以了解到苏联总统对后改革时期叶利钦十年的评价，对他领导国家过程中主要的消极成果的评价，对叶利钦及其班子不加批评地接受西方极端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批评。你还将了解到为什么现在戈尔巴乔夫支持普京的政策。通过阅读此书，你会对苏联第一位和最后一位总统及其观点得出自己的结论。

# 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

● 赵淮青

1967年2月23日下午2时许,《青海日报》印刷厂的前门和后门,忽然枪声大作,数百名“八一八”造反派倒在血泊中,酿成文革中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见证人,我应该把这个悲剧记录下来。

## 仇恨发芽便疯长

文革开始不久,中共青海省委机关报《青海日报》得风气之先,根据1966年5月16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精神,于6月3日刊出一篇题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的社论,鼓吹把全省搞它个天翻地覆,天下大乱。这篇社论见报后,许多干部群众乘车或结队到报社提出抗议,要求省委严肃处理报社负责人。在这种情况下,出于一种压力,中共青海省委把这篇社论定为毒草,并撤销了报社总编的职务。

也就在这个时候,江青把持的“中央文革”闻到了个中气味,把首都的“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航红旗”等造反组织,以及哈尔滨军工大学一批天兵天将派到青海来。他们下车伊始,就要为“六三社论”平反,并在青海日报社首先组织起“八一八”红卫战斗小组(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的日期命名)。这就是“八一八”红卫兵司令部的雏形。嗣后各行各业陆续组织起“八一八”造反组织。于是,全省以破“四旧”为名,开始了打、砸、抢、烧运动。

进入1967年,得到毛泽东支持,在上海首先兴起的夺权运动,波及到青海。青海省级单位的党、政、财、文大权摇摇欲坠。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红卫兵闯进省委各部门串连,如入无人之境。《青海日报》红卫小组最先夺了报社的权,并发出号召全省夺权的社论,把夺权运动推向全省。与此同时,报纸上也出现了“批判省军区刘邓反动路线”、

“打倒省军区一小撮走资派”一类的论调,埋下了军队与造反派冲突的隐患。

## 青海军区领导层的分裂

1967年元月下旬,毛泽东发出“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广大左派革命群众”指令。以省军区司令员刘贤权为代表的部分领导做出决定,要大力支持“八一八”造反派组织。刘贤权曾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一个师长,后来升为军长,是林彪的老部下。林彪在文革初期,就培植亲信,排除异己,控制和扩大自己的力量,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八一八”造反派组织起来后,刘贤权很快与之挂钩,同时把斗争矛头指向中共青海省委第二书记、省长王昭。王昭曾任国家公安部副部长,是此时已被打倒的中央军委负责人罗瑞卿大将的老部下,在青海人民心目中很有威望。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为代表的另一方坚决反对刘贤权的这一举动,军区内部大部分机关干部支持赵永夫,与刘贤权对抗。

有个背景应在此交代。1967年1月中旬,全军“文革”小组改组,江青当了顾问。并立即动手抄了总政主任肖华的家,这是部队上层机关乱起来的一个信号。江青的做法受到部队高层领导的抵制,以中央军委领导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几位元帅为代表,坚决反对把部队搞乱,他们认为,军队的稳定是党和国家根本利益之所系。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据说林彪也支持),经过多次与上边磋商,毛泽东认可了,1967年1月28日,颁布了一个中央军委的红头文件“八条命令”,内容包括:不许冲击军事领导机关;不许武斗;不许抓人抄家;不许串连等。据权威人士分析,这个文件反映了毛泽东既希望把部队的“文革”进行到底,又担心军队失控,影响整个局势稳定的矛盾心理。“八条命令”的颁发,摆脱了军队领导机关的瘫痪状

态。

“八条命令”下来后,青海军区内部,赵永夫的观点更加占了上风,刘贤权陷于有职无权的境地。“八一八”造反派多次到军区附近张贴“打倒省军区一小撮混蛋”、“革命军人要掉转枪口,对准叛变革命的指挥员”等内容的大字报,军区大院门前,多次出现辩论场面。可是,由于广大官兵长期接受部队传统教育,老作风、老信念依然很有影响,对红卫兵的种种作为产生强烈抵触情绪。

### 部队接管《青海日报》遇到抵抗

以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为首,联络青海其他驻军领导——205 部队领导张晓川以及军区直属部队独立师的领导,组成了“联合指挥部”。他们决定尽快接管《青海日报》,因为报纸天天号召造反,号召夺权,号召大乱,他们无法接受,认为这样的报社领导班子必须改组。而“八一八”造反派也横下一条心,要守住这块已经夺到手的舆论阵地。先是,部队在市区一些街道,张贴大字报,指名道姓揭发“八一八”组织不纯,是社会渣滓……2月3日,部队又出动250多辆军车,满载荷枪实弹战士,在西宁街头进行武装游行,沿途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等口号,以显示力量,威慑造反派。2月14日,部队公开宣布《青海日报》是非法的,必须实行军管,并派出十多个连队,占领了五个制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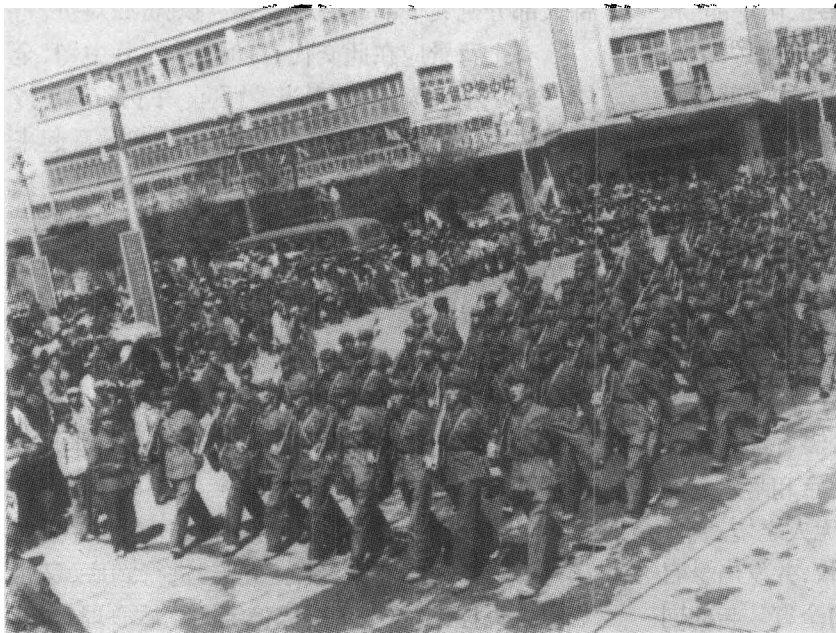
点,对报社印刷厂大院进行包围,一场生死搏斗,一触即发。

“八一八”造反派针锋相对,从各行各业调来上千队员,日夜轮流守卫报社。他们带着红袖箍,把守通向报社的各个路口。入夜,报社印刷厂大院点起堆堆篝火,为人们驱寒照明。部队多次派代表与造反派领导交涉接管报社事宜,均遭到严词拒绝,有时甚至被驱逐出来。2月19日,“八一八”造反派组织示威游行,对部队表示强烈抗议。当游行队伍经过报社大院门前,与对立面组织——“捍卫队”发生冲突。捍卫队一个女队员惨死在车轮之下。捍卫队当即抬着尸体游行,仇恨在斗争中升级,矛盾进一步激化。2月23日清晨,部队联合指挥部公开宣布,“八一八”红卫兵为反革命组织,下令立即取缔。

### 相持九天九夜,枪声大作

《青海日报》印刷厂大院坐落在湟水岸边,那些天成为两种势力对垒的焦点所在。“八一八”的头头们驻守在此,人称“八一八”司令部。而部队领导赵永夫则坐镇西宁宾馆,亲自进行指挥,与报社大院相隔只有一箭之遥。在斗争最激烈时,刘贤权曾派人给“八一八”头头送信,要他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这时造反派的情绪日趋狂热,北京红卫兵的广播车在不断呼喊“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八一八”的高音喇叭更是破口大骂,什么“把披着黄皮的保皇狗赶出去!”“砸烂省军区一小撮混蛋领导的狗头!”……漫骂声不堪入耳,这使部队官兵更加磨拳擦掌,仇恨之火在心中燃烧。赵永夫原来认为,“八一八”会藏有大量枪支弹药,曾说“就是用刺刀挑,也要占领报社!”也说过:“如果‘八一八’开枪,我们坚决还击!”而实际上“八一八”造反派却没有枪,而且对部队开枪,也缺少思想准备。

1967年2月23日,也就是部队包围报社的第九天,上午11



1967年2月,解放军武装游行,向搞打、砸、抢、烧的造反派示威(李景瑞摄影)

那间，震耳欲聋的高音喇叭戛然而声，部队的第一枪是对着“八一八”的高音喇叭发射的。这时，报社院子里混乱起来，人们小跑着出出进进。但是枪声很快停了。人们在等待。下午二时，枪声大作，像大年夜的爆竹声一样，从报社的前门响到后门。有冲锋枪声，也有机关枪声，连成一片。开始还能听到语录口号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后来就看见许多人扑倒在地，许多人向四处奔逃……



中共青海省委书记王昭摄于文革前夕

因为五个制高点都由部队占领，一处开枪，对面制高点的部队，误以为子弹是从报社大院里打出来的，当即还击，于是四面枪声交叉齐鸣，局面无法控制。赵永夫一看死了那么多人，也傻了眼。

半小时后，解放军押着“俘虏”队伍由西向东移动，其中多数人受伤，行动一瘸一拐的，向中共省委大院走来。伤员们被同伴抬着或架着，胳膊或小腿悬空摇荡，仿佛仅仅连着一小点皮肉。人们一个个灰头土脸，身穿蓝布羊皮大衣，大半是省公路局的工人，今天正巧轮着他们值班守卫报社。这支队伍最后被押到省委大院的操场上，有几个解放军班长、战士手持冲锋枪，飞快攀上附近的省委食堂房顶，铁青着脸，大声喊叫：“不许动，谁动打死谁！”而受伤的人们，有的在地上打滚，有的在地上翻跟头，翻几下也就不动了。还有人嘶哑着嗓子喊叫：“快来给我包扎，疼死我啦！”而在战士眼里，这些人都是洪水猛兽，是青面獠牙，谁会管他们呢！

清理战场时，死者170多人，重伤近200人，“俘虏”约2000人。就在响枪的那天晚上，有近万人被关进监牢，各机关、各单位开始残酷逼供，刑罚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单位用烟头烧，铁丝捆，甚至用上了“老虎凳”。

## 来自北京的声音

开枪的当晚，赵永夫给中央军委一位元帅打电话汇报情况，对方回答：“林副主席指示，打得好，打得对，总结经验。”直到“北京三司”红卫兵赶回首都，与“中央文革”江青、康生等人接上头，江

青又向毛泽东做了汇报，1967年3月11日，毛泽东在一个书面材料上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就值得研究了。”后来，“中央文革”做了调查，主要是听信返京红卫兵的一方汇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否认了他讲的“打得好”那些话。3月24日，经毛泽东同意，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做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决定》认为，青海省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次反革命政变，是赵永夫夺了刘贤权的权；成立以刘贤权为首的

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为“八一八”革命群众组织平反，抚恤死者，等等。

“八一八”造反派平反后，对待支持部队那一派，施行了同样残酷的批斗。仇恨一旦发芽，就要疯长。严刑拷打比比皆是，骇人刑罚时有所闻，虽未枪杀，也算是血腥报复吧！有一次，拥护赵永夫那一派的头头脑脑近二百人，被带到掩埋被部队打死的工人、学生的墓地（有人称为“短期烈士陵园”），通通下跪，被打得鬼哭狼嚎，皮开肉绽。在那次报复性的行动中，被打伤打残者不在少数。

那一时期，同事之间，乃至家庭间、亲友间，为了“革”与“保”之争，能够发展成你死我活，不共戴天。青海日报社一个美术编辑的妻子，“揭发”其夫要谋害伟大领袖，给那位美编带来了灾难。笔者所在的单位，当“八一八”得势时，一位领导曾拿一张放大照片给我看，说是从厕所墙壁上拍下的“反标”，上书“打倒‘八一八’反革命”。他问我是不是一个年轻记者写的，并说据此可把他打成“反革命”。我说，“不像是他的字。”又问：“也许是左手写的呢？”我仍然说：“不像是他写的。”心想，又不是要打倒共产党和伟大领袖，反对一个群众组织，就能打成反革命吗？后来查无实据，才不了了之。无独有偶，当“八一八”造反派被部队打成反革命时，那个年轻记者也来找我，说他从兰州把那个想把他打成反革命的领导抓回来了，省军区领导与他意见一致，应该枪毙。我知道，当时杀个人就像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平常，于是建议说“这可不是件小事，应该请示一下总社领导。”那位年轻记者与总

社代社长王唯真通了电话,王问:“什么罪状?”接着又说:“你们先打个报告来,再定罪不迟。”后来那位领导被关进监狱,却没有被枪毙,是王唯真救了他一命。

## 省委书记王昭的冤案

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指定由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又明确点明,青海“八一八”群众组织被镇压,“同原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真是天大的冤枉。此事与王昭并无关系,而王昭却为此受尽折磨,最后死在狱中,是全国有名的一个冤案。

王昭是河北平山人,1932年参加共产党,抗日战争中是晋察冀地区一个美名远扬的地委书记。与国民党作战时,参加过华北和西北的几大战役,指挥有方,战功卓著。从抗美援朝前线胜利归来,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受到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的赏识。1961年春夏,与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一道,去甘肃、青海两省解决饥饿问题。此后即留在青海担任第二书记、省长,实际上负主要责任。他不畏艰苦,到缺氧的高原地区作调查,并顶住重重阻力和极“左”势力,解决青海积重难返的问题,特别花大力气解决群众的吃饭问题和死人问题,恢复被破坏的草原,纠正平叛中一些过激做法,平反冤假错案,坚决与违法乱纪做斗争,被老百姓誉为“王青天”。

“文革”开始,王昭敢作敢为,敢于承担责任,与当时省委第一书记遇事往后缩的做派形成鲜明对照。但他没有表态支持哪一个群众组织,尽管他对“八一八”造反派的所作所为有自己的看法,比如“八一八”有些组织大搞所谓破“四旧”,搞打、砸、抢、烧,侮辱和迫害省里文化界、宗教界有威望的人士,他是非常不满的。但是,青海流血事件发生前后,他因胳膊摔坏,前往河南洛阳疗伤,没有参与“八一八”造反派与部队的矛盾冲突。中央宣布《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时,他被召唤到场,曾大声疾呼:“此事与我无关,我冤枉!”

早在1966年11月间,中共青海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刘贤权得到上层的信息和授意,在会上“揭发”,说王昭与已被打倒的彭真、罗瑞卿关系密切,是他们派到青海来的,应该拔掉这个钉子。

《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后,林彪、江青、康生等人,指令把王昭押回青海接受审查,在动身之前,周恩来当面叮嘱刘贤权和“八一八”负责人,“王昭不是黑帮,是踏踏实实工作的人,你们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可是当时的周恩来,说话已经不能令行禁止,王昭一回青海,当即被栽赃为“‘二二三’流血事件的总后台”,一下子被推进仇恨的旋涡中去,受到“八一八”造反派以及死者家属的残酷迫害。一个月时间,被批斗近五十次,每斗必打,每打必伤,胳膊多次被扭断,耳朵多次被撕坏,脸上被钉子扎了许多孔洞……后来又被送进南滩监狱。王昭有严重的糖尿病,在治疗上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不久又被诬陷为“叛徒、特务、里通外国”,有关人还得到指示:“不能放虎归山,不能让他活着出去!”1970年2月,年仅53岁就惨死在狱中。1977年,胡耀邦出于无私正义的爱心,多次过问王昭的事,那年8月邓小平做了批示:“王昭问题是个冤案,应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中共青海省委常委,领导全省公、检、法工作的王仲方,和王昭同时遭到诬陷。就在那次为“开枪事件”定性的中央碰头会上,很少发言的林彪,听到在公安部为罗瑞卿任十年政治秘书的王仲方,正在接受审查,竟说道:“王仲方这个人,我找他很久没找到,他是罗瑞卿的心腹,罗的事他全知道,要把他搞起来!”几句话,把王仲方推进五年多铁窗生活,历尽劫难,九死一生。他父亲王肖山是辛亥革命老人、教育家,竟受他株连被活活饿死。王仲方直到1978年才彻底平反。

在批斗王昭、王仲方的同时,全省还有近百名厅局级干部被折磨迫害,不少领导干部和群众被致残,甚至致死,罪名是“王昭死党”,“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上站错了队”。

赵永夫还算万幸,虽经多次残酷批斗,总算保全了性命。他在住医院期间,受到部下保护,全身被打上石膏,使施暴者无法下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平反,取消了“反革命政变头子”的说辞,从监狱中放出来,调回北京重新安排工作。但他的妻子因丈夫株连治罪,这位精干刚强的知识分子,宁死不屈,卧轨自杀。

“文革”——全民族的互相摧残戕戮,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

(责任编辑 萧 徐)

# 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

——《我的父亲齐燕铭》序

● 于光远



齐燕铭

齐燕铭同志的名字,我是上世纪40年代开始知道的。1943年,延安上演过一出京剧《逼上梁山》,演出很轰动,受到边区军民的热烈欢迎。剧本是中央党校的研究员杨绍萱写的,编剧和导演就是齐燕铭。毛泽东特地致信杨、齐,称赞他们做了“很好的工作”,高度评价:“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这“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代的开端。”我那时在延安,当然也知道这件事,但不熟悉他本人。

同燕铭同志熟识,是建国以后了。50年代和70年代,我们曾经两度共事。1956年国务院设立专家局,他兼任局长(他的主要工作岗位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我兼任副局长之一(我的主要工作在中宣部科学处)。1975年国家计

委设立经济研究所,我兼任所长(我的主要工作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他是这个所的顾问之一。关于这两段共事,我写过一篇回忆,收入了我的《朋友和朋友们》书里,这里不再赘述。

我的印象中,燕铭同志是一位儒雅、善良、有些书生气的共产党人。我知道他早年就读中国大学,颇受吴承仕教授影响和栽培,毕业后在多所大学包括母校中国大学任教。除了国学造诣,燕铭同志还多才多艺,善诗词歌赋、金石书画,而且对京剧一直有兴趣并有研究。这样的人,党内实在不太多。他多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在城工部、统战部、国务院都是总理得力可靠的助手。60年代后,总理派他到文化部,曾任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这是专门同知识分子、同文化人打交道的工作。分配燕铭同志做这样的工作,我觉得是用其所长。他不仅文化素养和思想水平高,思维缜密,考虑周到,办事细致,更重要的是,他本人就是知识分子,同文化界、知识界有一种天然的情感,与之有良好的沟通。

作为周恩来总理的助手,燕铭同志席不暇暖,呕心沥血,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很得周恩来赏识;作为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他对我国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做出了许多努力和可贵贡献。可是他后来的遭遇,却令人痛惜。1963年、1964年,毛泽东做了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严厉批评当时的文艺界,说“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毛甚至挖苦道: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这样的帽子,当时足以在政治上置人于死地。燕铭同志因此受到严

厉批判,被免职外放;“文革”一来,更是历经磨难,身陷囹圄,备遭摧残。直到1974年,在周恩来的干预下,燕铭同志才被“解除监护”。粉碎“四人帮”以后,燕铭同志担任了全国政协秘书长、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正当他倾心竭力、重新施展才能时,疾病却夺去了他的生命,其时,“文革”结束刚两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他走得太早了!想起这些,就唏嘘不已。

燕铭同志一生中的一“誉”一“毁”,很有些耐人寻味。一“誉”:一封信函,备加赞赏;一“毁”:两个批示,极尽指责。历史证明,那“誉”至今经受了考验,那“毁”却是根本错误的。“文革”后,燕铭同志恢复了名誉;对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化工作也有了新的评价:建国十七年的文化工作包括燕铭同志主持文化部时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两个批示背离了实际,导致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错误批判。这个结果,倒是用得上毛泽东的那句话:颠倒的历史又被颠倒了过来。

燕铭同志去世后得到彻底平反,但他多年的遭遇却令人沉思。在曲折复杂的政治生活中,燕铭同志以及从事文化、教育、科学工作的党内干部,心理可能十分复杂:一方面,他们自觉遵循中央高层的决策,“紧跟”最高领导人的部署;另一方面,他们心底又有许多困惑、许多痛苦。良知使得他们把知识分子当成朋友,“指示”又迫使他们不能不把知识分子作为斗争对象。政策“宽松”时,他们尽其所能缓和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尽量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政策收紧时,他们又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知哪一天自己的一切努力又将被政治运动吞没。造成他以及许多类似于他那样的个人遭遇,是我们党的历史悲剧。几十年里,在文化方针路线方面、在知识分子政策方面,我们党有太多的深刻教训。

建国以后,对知识分子的观念和政策发生了大问题,可以说是走向了严重的误区。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应该如何确定?1950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规定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这个决定还特别指出,高级职员,如工程师、教授、专家,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相同,也就是说,把他

们也划入了工人阶级范畴。中央人民政府的决定,无疑应代表中央高层集体的共识。

然而,50年代初,党确定的知识分子政策,叫“团结、教育、改造”。这个政策蕴含的前提,就是认为知识分子还没有确立工人阶级立场,思想上还属于小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还要通过“改造”来转变立场。既然没有转变到工人阶级立场,知识分子是否还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呢?问题又变得模糊和暧昧了。事实上,50年代前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思想改造、批判电影《武训传》、“三反”、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批判胡风集团和内部肃反等等,几乎无一不是把知识分子当做对象,很难说把他们归入“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1956年初,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中央召开了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报告中,明确肯定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六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次会议,我参与了一些筹备工作。会后,中央做出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根据周恩来报告的意思,也肯定知识分子的基本队伍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这个指示稿的起草,我也参与了。

这年九月党的八大召开。八大当然开得很成功,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国内阶级状况的变化,确定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是集中力量,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八大却没有采纳周恩来报告和知识分子问题指示的论断,还是提“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第二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讲话,说大多数知识分子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有些人出身工农家庭,世界观基本上也是资产阶级的,所以“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知识分子与资产阶级划在一起,确定反右斗争主要是在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进行。反右运动之后,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的观点,断定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一个是被打倒了的地主买办阶级及其他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一个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它的知识分子。总之,知识分子是被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毛泽东的这个观点,被八大二次会议接

受,成了党关于知识分子属性问题的“法定”结论。

60年代初,实行经济调整的同时,政治和社会关系也进行了调整。1962年3月召开有名的广州会议(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座谈会),会上周恩来、陈毅宣布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的桂冠。我参加了科技工作会议。周恩来讲活前,专门约集聂帅、陶铸、张劲夫、林默涵、范长江和我等人座谈,讨论这个问题。我记得总理还问我:于光远,你是中宣部的,说说你的意见。我也表示赞成。回到北京,周恩来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宣布:“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积极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且愿意继续进行自我改造的。毫无疑问,他们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如果还把他们看作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显然是不对的。”周恩来的报告经过了中央政治局讨论,是中央做出的正式结论。这个结论,当然是对毛泽东和八大二次会议结论的重大修改。

然而,党内对周恩来做出的这个论断有分歧,有些人不赞成对知识分子属性的这个判定。陈伯达非常不满,向主席告状。毛泽东尤其表示了不以为然的態度。几个月后,在北戴河开会,讲到摘掉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帽子时,毛泽东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些人阳魂过来了,但是阴魂未散;有的连阳魂也没有过来。实际上否定了周恩来在广州会议、人大会议的结论。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再度紧张,周恩来等人所做的努力付之东流。北戴河会议再次强调阶级斗争,随后,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系列批判运动接踵而至,批昆剧《李慧娘》,批“有鬼无害”论,批“合二而一”,批孙冶方的经济思想,批翦伯赞的史学观点,直到批《海瑞罢官》;认为有一条文艺“黑线”,建国十七年来“一直专我们的政”;教育领域,则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统治了我们的学校”。燕铭同志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横遭批判的。至于“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是陷于灭顶之灾,被侮辱成“臭老九”,排列于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

回顾从建国到“文革”的历史,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从来是“灰头土脸”。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他们阶级属性判定上的严重错误,而这个错误的根源在于“皮毛论”,即所谓“皮之不存,毛将

焉附”。长期以来,知识分子被认为是“毛”,它只能依附于某个阶级的“皮”,依附和依赖于统治阶级而生存。今天来总结历史的教训,我觉得,认识知识分子问题,必须突破“皮毛论”这个框框。知识分子本身就是独立的社会主体,而且是代表社会最为先进的力量,也是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的中坚。任何社会、任何政党、任何政府,如果不是依靠(绝非仅仅是“团结”)知识分子,而视知识分子为敌人、为“异己”,那只能是对历史的反动,其结果只会被前进的人类社会所抛弃。

《我的父亲齐燕铭》就要出版了。它的出版,对读者了解燕铭同志的生平、业绩、思想和人格,无疑会有所帮助。前些年,他的女儿齐翔延告诉我编这本书的事,我答应作序。今年是燕铭同志去世三十周年,现在书稿即将付梓,我写下这些话,既是兑现我的“承诺”,更是表达我对他的纪念。

2008年5月

(根据于光远口述 韩钢执笔)

(责任编辑 萧 徐)

中国期刊协会主办



《中外文摘》(半月刊)

**独特的个性,令它与众不同**

纪 实 观 察 话 题 浮 世 绘  
男 人 女 人 往 事 历 史 讲 义 人 物  
深 度 阅 读 揭 秘 自 由 谈 新 聊 斋  
作 品 拍 案 惊 奇 自 然 与 人 意 林

每期一篇大稿(8页):最新事件、人物、书摘、  
刑案、小说,可读性极强。

邮发代号:82—619 每册定价:4.50元 电话:65237095

# 评《国史札记》兼论高饶事件

● 王海光

林蕴晖教授的新作《国史札记·事件篇》(东方出版中心 2008 年 8 月出版),大量利用了近年来公布的新史料,以新的史观方法,钩沉梳理了建国以来党史上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以个人的独立研究,剔抉发微,廓清了一些历史之谜,于历史研究中给人们以现实的思考,可称为是中国当代史研究中不断推陈出新的扛鼎之作。阅读该书,可对学界的中国当代史梳理工作一窥端倪。

林教授是党史学界的知名学者,治学严谨,笔耕不辍,著述颇丰。笔者以为,这本书虽系札记,但以新知新见为取舍标准,学术价值丝毫不逊于林教授其他的很有些社会影响的学术专著。以现在便利的出版条件,想出版一本书并非难事。当下学界中就有一些人,能出著作,但搞不出一篇真正意义的学术论文。而对学者而言,写一篇真正具有独到创见的学术论文,所花费的功夫往往要多于写一部过眼烟云的专著。遑论专著本应是研究者水到渠成的结果,如果没有个案研究的微观基础,宏观论述的学术专著也是难以衍生出来的。

《国史札记》收集作者自 80 年代后期以来的治史论文 34 篇,俱是具体历史事件的个案研究,涉及党史国史上诸多历史谜团。关于这些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不仅社会大众是一头雾水,就是学界小众也难能言说其详。正如林教授在书中自述说:“就连我这个从事多年中共党史和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也多有迷惑不解。”该书反映的即是林教授的由“不解”到“有所解”的心路历程。以笔者拙见,书中写于 80 年代后期的几篇文章,价值在于提出问题。而此后的文章,特别

是 2000 年以后的文章,价值则在于解读问题。这也反映了这些年中国当代史学界在史料和史识上的进展。

该书虽以国史冠名,实则论述的还是建国后的中共党史,而且主要是关于党内高层一些重大事件的诸多问题。作者解读历史,从建国伊始一直延伸到 1992 年的邓小平南方之行,时间跨度很大。主要集中于这五个问题:1.毛泽东与刘少奇政见分歧的发端与发展;2.高岗、饶漱石事件的前因后果;3.1950 年代围绕工会工作方针的两次争论;4.中苏两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分歧和关系破裂;5.1958 年军队反教条主义事件和 1959 年的庐山会议;6.“大跃进”运动与 1960 年代的中国政治走向;7.个人崇拜与“文化大革命”关系等等。由此可知,其研究的主体部分是毛泽东执政时期的历史,重点在 1950 年代。后面有关改革开放的诸篇文章,可看做为总结这段历史教训而提出的反证。

这些历史事件和有关问题,大部分是党史界和国史研究中一直颇有争议的重大问题。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度较高,坊间流传的书籍很多。但这些书籍很少是成于专家之手,大部分都是因袭旧说,传抄拼凑之作,以讹传讹,不足征信。《国史札记》的作者则是以史家的耐心和毅力进行十几年的跟踪研究,从近年新公布的文献、年谱、日记、回忆录中钩沉史实,采访历史的当事人,不断发掘历史事件的细节,以改革开放的新视野拓宽研究的深度,自成复原历史真相的一家之言。读者从中可以了解近年来国内学界对这段历史研究的最新水平,读之会有耳目一新的感觉。这正是史家修复历史原貌的本分所在。据笔者所知,林教授对大跃进死亡人口的问题也做过研究。这也是当前社会关注度很高的一个热点问题,有关

非正常死亡人数的说法，从一千多万到四千多万，还有更多的，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不知为什么，本书中没有纳入这个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该书叙述的这些建国后重大事件，前后衔接，互有关联，可以看出作者梳理出的一条建国后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逻辑。作者把1954年党内高层发生的高饶事件，作为解读建国后党内分歧和斗争的轴心问题，用力最勤，落笔最足。这是该书匠心独具的地方。也是读者最应着眼之处。书中前面的十几篇文章，都是围绕高饶事件展开的。高饶事件是建国以后第一次重大的党内斗争，反映了党内在是否坚持新民主主义建国纲领上的政治分歧，并由这场政见分歧而产生的高层冲突并导致矛盾激化。这场党内斗争长期被称为“高饶反党联盟”，其发生原因和组织处理方式，影响极其深远。在理论上，这场党内斗争可以看做是党内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的最初冲突。因为此时中共所理解的社会主义还是斯大林模式的经典社会主义，所以这个“什么是”和“怎样搞”问题的滥觞所出，是集中在是搞一段时期新民主主义，还是马上就搞社会主义的政见分歧上。这就是高饶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在书中叙述的以后发生的党内斗争事件，也都与此密切联系着。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开始“走自己的路”，实则并没有脱离斯大林模式的窠臼。此后的党内斗争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在经济建设上快与

稳的速度之争，一是个人专断和集体领导的权威之争。这两个问题都是前期党内斗争的延续和发展。1959年的庐山会议，敢于直言犯上，痛陈“大跃进”失误的彭德怀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并又和“高岗反党联盟”挂起钩来。“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所列“罪行”基本上也都是当年高岗、饶漱石攻击刘少奇的材料。

在治国方略上，国家领导人之间出现政见分歧本是再正常不过的政治现象，但在当年却一再引发了党内政治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严重，伤害的人数一次比一次更多。这当然不能仅仅归咎于领导者个人因素，更根本的还是体制问题。书中最后两篇，也就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一篇是《由“谈不拢”到达到一致的诀窍》，论述的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解决党内分歧的策略，即让时间和实践来做结论，不必非得剑拔弩张地一决高下；另一篇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与苏东巨变》，论述的是邓小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局势，毅然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天条，引领全党确立了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从而避免了中国改革夭折的危险。中共老一代领导人在历史关键时期表现出的政治智慧，正是吸取了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取得的历史进步。以这两篇做该书结尾，也可见得作者的用心良苦。

## 二

历史的梳理过程，就是一个由粗及细、由表



1954年，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代表合影（后排右三为张秀山）

及里的过程。对历史问题的梳理,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样也表现了一个现实社会对过去历史的担当能力。

以1954年高饶事件的研究为例。这是中共中央放弃新民主主义建国方略,进入社会主义轨道的历史转轨过程中发生的一次重大党内斗争。高岗和饶漱石利用毛泽东对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不满意,考虑中央分一线二线的机会,进行倒刘的活动,被定性为“分裂党及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活动”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并且牵连了一批党内高级干部。在1955年3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大会做出《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饶的党籍。随后召开中共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这个决议。在过去党史上一直把这一事件作为党内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称为高饶反党联盟。而且,高饶反党联盟还成为了一个罪行标志,又和以后的党内斗争继续保持联系。庐山会议后,批彭德怀就将他列入这个反党联盟中。林彪事件后,批林彪中又把林彪纳入这个反党联盟来。足见其余音未绝。

“文化大革命”之后的拨乱反正中,许多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都得到了平反昭雪。因高饶事件被错误处理的原东北局一批领导干部也给重新安排了工作。邓小平从当时政治稳定的大局考虑,提出了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基于这个原则,邓小平否定了高饶事件是“路线斗争”的传统说法,但仍坚持当时对高、饶的处理是正确的。据此,《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虽然称高、饶是“阴谋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家,但过去路线斗争的说法是没有了。高、饶问题由此从群案变成个案,然而也没有给出个明确的说法。在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回顾》中,关于高、饶问题的篇章,称他们是“政治野心膨胀”,“高岗向党发难,进行了一系列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饶漱石密切配合”。对当年被列为“参加高、饶反党联盟活动”的山东分局书记向明、东北局第二副书记张秀山、第三副书记张明远、秘书长赵德尊、原办公厅主任马洪、组织部长郭峰、旅大市委第二书记陈伯村等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1955年3月31日通过]),

薄书已不再提及,还认为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尽管薄书中还是在说,“当年党中央把他们(高、饶)称为‘高饶反党联盟’不是没有道理的”(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308、319页),但说话的底气已显然不足了。倒是坊间有关书籍,不明究里,仍是以“死亡联盟”之类的话语进行炒作。

2000年以后,随着更多的史料浮出水面,人们对建国初期中共进行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历史认识越来越深入,肯定了新民主主义历史阶段的独特价值,对高饶事件的再研究工作也重新放到了学者们的案头。一些在高岗事件中的历史当事人,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相继写了他们的回忆史料。其中,张明远、张秀山和高岗秘书赵家梁等人的回忆,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情况,有非常重要的存史价值。我们从中得知,高饶事件中的两次关键会议,1953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要远比官方正式渠道公布的情况复杂得多;高岗的问题和饶漱石的问题,南辕北辙,是很难“联盟”在一起的。特别是张秀山的回忆录中,首次披露了毛泽东在1953年初密令高岗调查刘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事情(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321页),社会反响极其强烈。这些新史料的出现,对原来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的历史结论产生了巨大的冲击,需要学界重新梳理和解读这一历史事件。

林教授在《国史札记》中,根据多年收集的文献资料和治史心得,对这些新史料进行了梳理,澄清了关于高饶事件中的一些关键问题,提出了自己新的认识 and 解读。主要观点有:1. 建国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建国方略上发生政见分歧,使毛泽东产生重选接班人的想法,意欲高岗为接班人;2. “批薄射刘”的财经会议,并不是高岗在背后策划的反党活动,而是毛泽东以新税制为靶子,通过批薄一波,达到把中央高层思想统一到过渡时期总路线上的结果。3. “讨安伐刘”的组织工作会议,并不是高岗、饶漱石背后预谋的反党活动,而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指导,检查中组部工作。张秀山所谓“反党”的会议发言,是毛、刘定的,与高、饶无关。4. 高岗的非组织活动被陈云、邓小平告发,毛泽东出

于无奈把高岗端了出来；5. 高饶事件的处理并不是“比较宽的”，而是有严重的宗派主义倾向，株连了不少高级干部。由高岗株连的东北局张赵马郭“五虎将”冤案，由饶漱石株连的上海公安局杨帆冤案，都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大抓“反党集团”的错误处理的结果。

通过新近发现的史料和学界对史料的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高饶事件发生的基本脉络。在建国初期，中共党内在治国路线上出现了重大政见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坚持新民主主义路线方针不满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产生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有意让高岗主持一线工作。高岗1953年进京后，清楚毛泽东的意图，积极串联进行拱倒刘少奇的活动。在1953年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上，毛泽东看到了倒刘的党内阻力很大。而高岗打着毛的旗号进行的非组织活动，传播毛与他的私下谈话，打乱了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战略部署，更是有造成党内分裂的危险。在1953年底，毛泽东遂下决心解决高岗问题，连带解决同有反刘倾向的饶漱石，转而强调党内团结。1954年2月，中共召开七届四中全会，以解决高岗、饶漱石进行派别活动的问题。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全会，指示要开成一个“和平会议”。会上，高、饶做了检查，刘少奇等也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央书记处认为高、饶的检查是避重就轻，决定立即分别召开高岗、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对证高、饶反对刘、周的活动事实，公开揭发批判高、饶。高岗以自杀（未遂）对抗，使问题更加复杂化。随后，东北一批领导干部受到株连，被打成高岗反党集团。1954年8月，高岗自杀身亡。罪案再无回旋可能。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正式给高岗、饶漱石做出了“反党联盟”的政治定性。

### 三

对历史事件真相的澄清，不能狭隘地认为是在做“翻案文章”。应该看到，这正是为了真正吸取历史的经验，真正达到政治上的安定团结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高饶事件的背后，无疑是毛、刘在建国方略

上的政见分歧。从事后看，与毛泽东观点一致的，多是在长期农村革命战争中走出来的一批干部；与刘少奇、周恩来观点一致的，多是知识层次较高，熟悉城市，懂得经济工作和社会管理的一批干部，也就是国外研究者所说的“技术官僚阶层”。在中共成为执政党后，有知识懂管理的干部很自然地要走到国家管理的前台。这就带来了一个权力分配上的成分变化。那些抱有“打天下坐天下”的封建意识浓厚的农民出身的干部，对这些知识型干部占据国家部门要津是有失落感和不满情绪的。高岗到处散布的“根据地 and 军队的党”和“白区的党”之论，响应者甚众，也正是党内这种情绪的反映。从毛、刘关于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争论中，同样也可以看到程序理性和非程序理性的治国理念之争。这些理念上和利益上的碰撞，在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中是不可避免的。高饶事件的发生就是这个碰撞的一个结果。

但是，这些党内矛盾和冲突并没有在民主共和的政治框架下得到正常的解决。要改变《共同纲领》的新民主主义建国方针，这么重大的国体变动，不仅没有任何全民公决等现代政治形式，而且在执政党内也没有经过充分酝酿。对于由此产生的党内矛盾和冲突，不是摆到桌面上进行公开讨论，辨明是非，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达到全党认识的一致，而是由最权威的领导人背地议论，暗箱操作，大做一言堂的文章，把正常的政见分歧变成了一场权力斗争，致使高饶事件的出现。这是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的政治操作不可避免的结局。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饶漱石都是党内生活缺乏民主的牺牲品。

更重要的是，高饶事件及其处理方式，形成了中共党内斗争中“有罪推定”、“一棍子打死”的模式，助长和发展了党内“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的恶劣风气，对党内政治生活造成了很不好的长远影响。一个人一旦被打倒，马上就是大家伙一拥而上“痛打落水狗”，深挖“反党集团”，株连其余。从以后的历史可以看到，斗争者在给别人制造绞索的同时，实际上也给自己的将来制造了绞索。今天的斗人者，也就是明天的被斗者。

无论是一个社会，还是一个政党，有各种不同意见的存在，本来就是一个组织充满生命活力

的标志。而要使组织具有蓬勃的生命活力,关键是要有一个解决意见分歧的机制,把非组织活动变成有组织活动。这个机制应包括三个部分:能够让人们充分表达意见的机制,能够让人们保留自己意见的机制,允许不同意见合法存在的机制。特别是要有保护不同意见合法存在的机制,正是民主政治的精髓。权威者认为对的,未必是对的;多数人认为是对的,也未必就是对的。同理,当时都认为是错误的,以后的历史并不认为就是错误的。如果扼杀了不同意见合法存在的权利,也就堵塞了通往正确的道路。

高饶事件的历史教训是深刻的,但深刻的历史教训未必都能被现实政治所接受。即使在民主已成为人类社会普世价值的今天,我们在关于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建设上还是有许多没有搞清楚的问题。比如说“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原则,本意是要完善党委内部的议事和决策机制,改变党内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但谁具有“个别酝酿”的权力呢?毛泽东的个别酝酿是毋庸置疑的组织行为,高岗的个别酝酿就是非组织行为的反党活动。这在我们的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可看到,书记的个别酝酿是正常的组织活动,委员的个别酝酿则是非组织行为的私下

串联。在这里,组织与非组织的划分界限就是权力。从组织学的角度看,党委制属于委员会制,各委员之间应是平权的关系。过去我们把书记与委员的关系作为班长与一班人的关系,这是对委员会制的误读。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班长可以游走在各位班员之间,一个一个地“个别酝酿”,制造出能够贯彻自己意图的会议多数。这实质上是由集体负责的个人专权。所以,从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看,高饶事件的教训对今天仍还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历史的复原过程,是填补历史认识空白点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历史学家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能够发现历史的疑点,然后发掘证据予以解决之。在高饶事件中,也是有不少这样的疑点。例如七届四中全会是强调加强团结的会议,为什么会后接着又开了公开点名批判高、饶的座谈会?陈云、邓小平在高饶事件中的角色和作用是什么?毛泽东从对高岗信任有加到决心打倒高岗的转折关键究竟在哪里?高岗为什么非要自杀不可?毛泽东为什么对高岗一直念念不忘?……这些疑问只能留待以后的历史研究逐步予以解决了。笔者相信,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化,对现实生活总是不无裨益的。(责任编辑 萧 徐)

广 告

## 大午温泉度假村

大午温泉度假村位于保定市徐水县,距北京 110 公里(京石高速徐水出口),是以大午温泉地热井为依托兴建的一处园林美景。

大午温泉地热井深 3003 米,井底水温 62℃,出井水温 56℃,日出水量达 1200 立方米。温泉是地壳深处经过几亿年的蕴酿而成,含有多钟具有活性作用的微量元素,如钙、钠、镁、钾、锶等离子,有一定的矿化度。大午温泉水质卓越,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

大午温泉度假村地处乡村田野,绿树环抱,鸟语花香,清幽娴静,远离尘嚣,初入使人有世外桃源之感,可谓“源于自然、高于自然、虽由人作、宛若天成”。度假村下设温泉贵宾馆、温泉佳宾馆、温泉游泳馆、温泉露天池及大午企业文化主题公园,馆内设休闲大厅并配备大、中、小型会议室,集温泉泡浴、按摩保健、休闲娱乐、会议接待、餐饮住宿、度假旅游多功能于一体,可观赏田园风光,品尝乡村野味。宾馆高档舒适,价格低廉,服务超值,适合工薪阶层全家出游,更适合离退休老人的休闲疗养。

“古有武陵源,今有大午城”,大午的天是蓝的,水是甜的,人是善良的,诚实善良的大午人,欢迎您的光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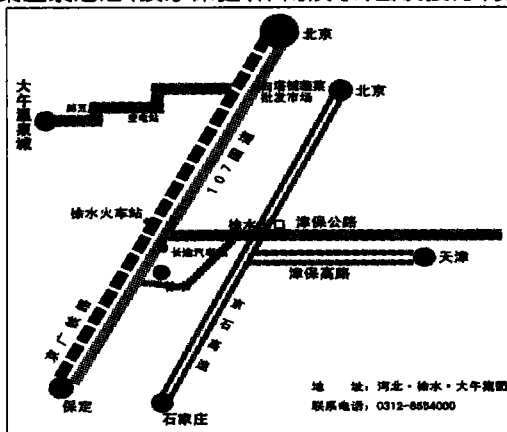
客房价目:大午庄园标间 60 元,温泉佳宾馆标间 280 元(含温泉门票 48 元)。

地 址:河北省徐水县河北大午农牧集团

联系电话:0312-8554000 8554999

自驾:京石高速徐水出口下,沿 107 国道北行至白塔铺蔬菜市场,沿大午集团指示路牌西行 5 公里即到。

火车:从北京西客站搭火车到保定火车站或徐水火车站。大午温泉度假村距徐水火车站 5 公里、距保定市 25 公里。保定市 12 路公交车直达大午温泉度假村。



#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 章立凡

为史学前辈吴晗先生的代表作《朱元璋传》重版作序,我深感冒昧,更有一种难以名述的悲凉。回顾自己对历史的兴趣,就与小学时代读吴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以及《地理小丛书》有关。当时我对这三套丛书是每出必买,搜集得很齐全。上中学后,又读了《朱元璋传》、《读史劄记》等专著,对其考证方法及夹叙夹议的文体印象深刻。“文革”结束后我选择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与这段早年的阅读史不无关系。

此次重版《朱元璋传》,系依据 1949 年的版本。但作者在 1965 年版的自序中,曾对 1949 年版本做了三点检讨:一、有超阶级思想,对彭莹玉和尚的评价和史料引用不当;二、当时不懂马列关于国家的学说,以为国家机器只是官僚机构和军队;三、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故对朱有苛评。其实,这三点主要是来自毛泽东的批评。对朱元璋这位专制君主的评价,领袖与学者的视角从来就不在同一地平线上。

作者既如是说,而这次重版仍采用这个版本,确实需要说明理由:一、在存世的四个版本中,1944 年版本是战乱年

代急就而成的历史通俗读物,1954、1965 年版本有过多的政治意志介入,只有 1949 年版本真实地表达了作者本人当时的观点;二、与 1949 年版本相比,后来的版本虽然贴上了阶级与国家学说的标签,但叙事骨架仍是原来的;三、目前流行最广的是 1965 年版本,而 1949 年版本发行量相对较少(2001 年海天出版社有重印),且未受到相应的重视。

《朱元璋传》曾四易其稿。其中 1944 年的版本有两个,重庆胜利出版社版书名《明太祖》,在创出版社版书名《由“僧钵”到“皇权”》。1947 年末,此书的增订稿章节开始在一些刊物上刊出,1949 年正式以《朱元璋传》的书名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作者 1948 年到石家庄时,曾将书稿进呈毛泽东。毛曾对书中对起义领袖彭和尚“功成不居”的评价提出异议,认为:像彭和尚这样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有逃避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问题。阅读后退还稿本时,毛还特地给吴晗写了一信,着重谈到史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辰伯先生:

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

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谨致

革命的敬礼!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四日

除信中提及的两次晤谈外,另据吴晗追记,同年 12 月还有一次长谈。毛当时提出:第一,彭(莹玉)的下落是消极的、道家的,称赞不当;第二,国家机器由军队、法庭、特务机构等组成,而不是由官僚机构和军队组成;第三,朱元璋由农民阶级转变为地主阶级,不是由个人的人性物欲决定的,团体利益决定个人利益。这次谈话产生了 1954 年的修订稿本,但未付梓,仅油印百余册征求意见。上述追记即用钢笔记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稿本上,吴晗同时以毛笔加注曰:

下面这一启札记是 1948 年 12 月间毛主席的当面指示,地点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毛

主席的住处。谈话时间从下午6时到12时。主席指示的话很多,当时所记的仅仅是对于这一稿子的主要的话。吴晗追记。1954年4月1日。

由是可知,两人在西柏坡的晤谈,至少有三次。另据吴晗的妻姐袁溥之记述,毛还提出了这样的意见:“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的好点,不要写的那么坏。”(袁溥之:《忆吴晗同志二三事》,《北京盟讯》1981年第三期。)直到1965年,作者才将最后一个修订稿本交付三联书店出版。“文革”结束后,北京出版社于1988年出版《吴晗文集》,收入了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的《朱元璋传》1954年油印稿本以及1965年三联书店版两个版本。

《朱元璋传》初版对传主有“三个伟大”的评价,即“最伟大的军事统帅”、“最伟大的政治家”及“伟大的民族英雄”,其中前两个还是“最伟大”。但在第二版中突出了朱元璋残暴嗜杀的性格,加上了“以屠杀著名的军事统帅”“最阴险残酷的政治家”。吴晗在1965年版的自序中,也承认“以朱元璋影射蒋介石”。蒋的形象在抗战时期是“民族领袖”,战后竟演变成反民主的独裁者,作者对朱元璋先褒后贬,折射出知识分子对这位历史人物的情感变迁。

毛泽东对吴晗曾有“将来成就不可限量”的勉励,吴晗1950年发表《我克服了“超阶级”观点》一文,也谈到伟大领袖的教诲:“特别指出彭和尚

这一条,给了我极深刻的阶级教育,挖出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他诚恳接受毛泽东的批评,根据新发现的史料修改了对彭和尚的评价,在1954年版本增加了让步政策论,1965年版本又增加了中小地主阶级论,肯定朱元璋功大于过。评价确实是“写得好点”了,但似乎仍未领悟深意,辜负了领袖的期望。9个月后,作者即因1961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稀里糊涂成了“文化大革命”祭旗的头道牺牲。

以往学界对此书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影射史学”上,兼有评及引用史料的粗疏之失。一个学者的政治倾向,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乃至对研究对象的历史评价,使吴晗成了中国历史学界“影射史学”的代表人物,其中既有其本人的原因,也有传统政治文化上的原因。身处一个泛政治化的时代,一旦成为这种“代表人物”,其一切著述都可能被贴上“影射”的标签,而现实中的千古风流人物,也随时可能自动前来“对号入座”。

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不自信,当草莽枭雄或外族首领坐定龙庭时,不免对新归顺的士大夫阶层心存疑忌,生怕被这帮舞文弄墨的家伙愚弄。早年读此书,印象最深的是引用明徐祯卿《翦胜野闻》中的一段轶闻:朱元璋外出私访入一破寺,见墙上画一布袋和尚,并有题诗一首,墨迹犹新,立即派人追捕作者,未获。其诗曰:

大千世界浩茫茫,

收拾都将一袋藏。

毕竟有收还有放,

放宽些子又何妨?

囊括江山创立明王朝的朱元璋,毕生紧抓权力从未“放宽”过,他通过特务政治和文字狱,屠戮功臣、知识分子和百姓,本是不争的事实;而《朱元璋传》解读雄猜之主自私的深心,可谓层层剥离直入堂奥,读后令人倒吸一口冷气。

中国士大夫总摆脱不了事功的传统,治学中偏好帝王之学,希望辅佐明主并有所建树,其实这是一门如履薄冰的学问,君心依然深不可测。从“影射史学”转向“遵命史学”,从改写《朱元璋传》到发表《海瑞骂皇帝》,作者曾力图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熊鱼兼得,却迷失自我身陷黑箱。“影射”的猜疑如影随形,“遵命”的研究事与愿违,对君臣关系的揣摩越深入,后果越致命。这期间,从上到下最缺的,是现实与历史之间的平常心。

将历史作为现实的参照系,应该是一种正常的思考和表达模式。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亡”,只是将史实当做一面镜子去对照现实,无须作为讽喻刺隐的手段,这是正常“映射”与非正常“影射”之区别。“影射史学”只是专制时代的一种表达方式,是缺乏言论自由之社会的特殊产物;它同时也可以被利用,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文革”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即是其中的著名范例。以今度之,“影射”无非是严肃的“恶搞”,“恶搞”往往是非正规的“影射”;

在社会生活正常化之前,各种另类表达之纠缠亦无从摆脱。

作者早年师从胡适,并在其指引下专攻明史,胡适对作者的学术和人生道路有重大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全世界左倾的年代,虽然吴晗曾潜心考据不问政治,但正如其自述的那样:“1940年以后,政治来过问我了。”1943年他加入民盟后,其政治倾向导致师生之间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胡适亦曾惋叹:“吴晗可惜,走错了路。”一个甲子过去,当今学界正热衷于重新解读陈寅恪、胡适、钱穆和傅斯年,却已很少有人评价吴晗的学术成就。

这位左翼历史学家与同时代的大批激进知识分子一样,真诚地投身革命并积极跟进,

检讨自己也伤害过别人。身为独立意识薄弱的学者之一,“工具化”的史学犹若一把双刃剑,令历史学家成了自身专业的受害者。在走过了春风得意的十几年后,作者终因一出历史剧《海瑞罢官》身陷文字狱,落得个家破人亡的结局。造化弄人,革命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其个人悲剧不仅在于如何研究和演绎历史,更在于误踏历史悲剧的大舞台,且无意中成为演员之一。这结局自1948年献书时即已注定,同时也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宿命。

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至今仍被广泛引用。历史场景总是以惊人的相似重复着,戏外有戏,戏中有戏,

但戏还是老戏,只是改编了剧本并换上了新演员。一个历史悠久积淀厚重的民族,如果屏蔽历史拒绝反省,将难以走出“周期律”的循环怪圈,更无法把握未来。

生活在多元化的信息时代,互联网络可提供更丰富的历史参照物。史家大可不必着意于“影射”,只须让翔实的史料自己说话;读者会一代比一代更精明,对历史的解读将越来越个性化。无论是治史或读史,当你打开这部史学名著之际,作者的命运也在昭示后人:欲洞察真相求取真知,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第一要务。

2008年7月12日风雨读书楼  
(责任编辑 萧 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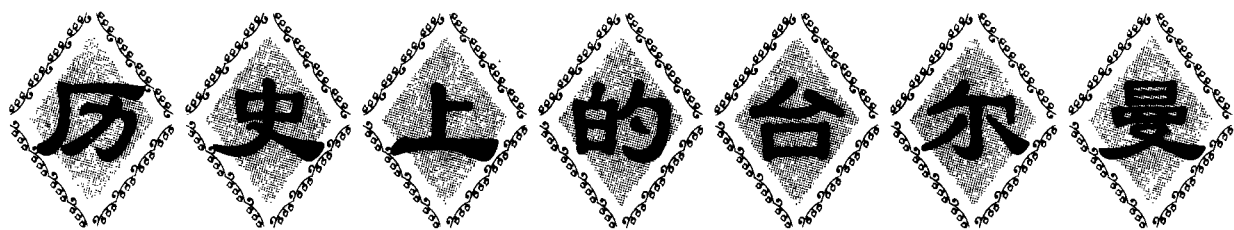
## 书 评

这是一本刘少奇的亲属们回忆刘少奇的文集,作者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子女刘爱琴、刘平平、刘源、刘亭亭和刘潇潇,还有王光英等。

刘少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在十年“文革”中他成了一个悲剧人物。这不仅是一位国家主席的悲剧,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剧。本书的作者们提出了不少值得今人思考的问题。

文化大革命已被风吹雨打去,但我们民族的心灵创伤却难以愈合。假如惨痛的教训也云消雾散了的话,类如刘少奇的悲剧还会重演。记住刘少奇,记住历史,就是这本书出版的意义。

本书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根柢资料,值得阅读,更值得收藏。



## ● 施用勤

台尔曼曾是德国共产党主席，在纳粹上台后被捕，关押在集中营里 11 年，于 1944 年被杀害。身后备享反法西斯战士的哀荣。在中国发行量极大的《外国民歌二百首》中，还有一首《台尔曼之歌》。

去年央视热播的系列片《世界历史》中有关纳粹崛起的那一集中，称颂台尔曼为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

不过，上述对台尔曼的评价只是斯大林与他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一家之言，与历史上的台尔曼大相径庭。

其实，在希特勒上台之后，第三国际的某些领导人也想让台尔曼充当替罪羊，但被斯大林否定。因为他深知，否定台尔曼和德共所推行的方针政策，也就是否定他本人和他领导下的第三国际的方针政策。

但是，为遮掩斯大林在导致纳粹上台过程中的战略战术错误而抬高台尔曼，却严重地损害了马克思主义。在纳粹从一个小党发展成为执政党这个关键时期，台尔曼一直是德共的一把手。如果台尔曼真的是反法西斯斗争的象征，那么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德国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工人有强大的组织，又素以组织性、纪律性强和富有斗争经验而著称，在那个危机阶段，德共也是一个有数十万之众的大党；然而，当时德国社会、经济危机不仅没有让德国革命成功，反而是极端反动的纳粹势力获胜，这不是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十月革命是冒险，是侥幸成功的例子吗？

因此对台尔曼做出公正的历史评价，关系到的决不仅仅是台尔曼个人，也不仅是当时的德国共产党以及领导它的斯大林和第三国际，还关系到对十月革命的评价问题。

### 台尔曼上升的背景

台尔曼于 1924 年上升到德共的领导层，是因为他在 1923 年汉堡起义中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当时的德共领袖布兰德勒作为这次失败的起义的替罪羊而被清算

之后，台尔曼与马斯洛、路特·费舍、乌尔班斯等人一起进入德共领导层。这些人的崛起都有俄国共产党的背景，后三人追随的是季诺维也夫，台尔曼追随的是斯大林。1925 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与斯大林反目后，马斯洛等便被清除出德共的领导层，台尔曼就成了德共的一把手。

台尔曼在他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并担任主席后，主要工作就是根据莫斯科定的调子批判托洛茨基，清除德共中托洛茨基的支持者，后来清洗对象又增加了季诺维也夫的支持者。在这些年的工作中，台尔曼学到的主要是在党内排除异己、维持自己权力的手段。至于领导全党为未来的革命做准备，独立地对德国和世界形势做准确的判断，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并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克敌制胜，在这样的党内斗争中是学不到的。

### 台尔曼遭遇“第三阶段”

这种状态直到 1928 年才结束。那是因为斯大林在国内外，在政治经济上遭受了一系列严重的失败后，尤其是遭遇 1927 年爆发的粮食征购危机，他意识到他伙同布哈林推行的右倾内外政策是行不通的。他接过了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加速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纲领。在国内政策上向左转之后，在对外政策上也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他的代理人莫洛托夫在 1928 年共产国际第十次执行委员会上提出了所谓的“第三阶段”理论。

这个荒谬的理论如今已鲜有人知，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也很少有人提到。然而，正是这个理论对德共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失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阶段”理论把从 1917 年十月革命至 1928 年这段时间分为三个阶段。1917 年十月革命到 1923 年为第一阶段，是革命高潮阶段；1924—1927 年为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相对稳定阶段，也就是革命低潮阶段；第三阶段从 1928 年开始。莫洛托夫声称在这个阶段中，资

本主义世界的所有矛盾即将总爆发,世界革命形势一派大好,资本主义世界即将土崩瓦解。

这种出于转变政策的需要而做出的对世界形势的判断,成了新策略的基础,共产国际领袖据此制定了让全世界共产党人必须执行贯彻的策略任务:一是进行总罢工,二是占领街道,三是“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相对于前两个任务来说,第三个任务更加有害。因为前两个任务不是凭主观愿望就能完成的,但拒绝与改良主义组织联合的任务,只凭主观愿望就可以执行。共产国际麾下的各国共产党实际上惟一贯彻到底的就是这第三条,直到共产国际开始推行人民阵线策略为止。

托洛茨基以革命政治家的视野和敏感,意识到德国纳粹的兴起对工人运动和人类命运的威胁,清醒地看到“第三阶段”理论将使这一威胁变成现实。“第三阶段”理论刚一出笼,他就在他个人创办的《反对派通报》上结合奥地利危机,撰写《奥地利危机与共产主义》一文,批评“第三阶段”理论及其策略。1930年1月出版的《反对派通报》第8期的全部版面用于刊登托洛茨基的长文《共产国际错误的第三阶段》。他以法国的现实为例,逐条驳斥了“第三阶段”理论对形势的判断。他根据1919—1929年法国的相关数据,描绘出了这10年间法国工人罢工次数和参加人数的曲线,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法国近两年的罢工与1919年后罢工连续衰退相比较,仅仅是克服了衰退的惯性,当前的罢工斗争还仅仅是经济性的,“绝没有提供可以使人得出革命阶段或哪怕是革命前阶段的迅猛发展的画面”。

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再次拿出一定的篇幅驳斥“不能与改良主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联合”的策略。他指出,当改良主义者因形势所迫向前迈进一步或半步时,必须与他们进行阶段性的联合。他强调在与法西斯的斗争中,更不能切断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具体协议的途径。

当然,作为“布尔什维克化”的德国共产党的领袖的台尔曼,是不会听信托洛茨基的“异端邪说”的。在莫斯科的指挥棒下,台尔曼“双脚迈进了第三阶段”并在这个阶段中走向了他本人和德共的覆灭。

## 台尔曼的反法西斯斗争

“第三阶段”理论一下子把台尔曼从党内倾轧中推到了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场上。这是真正表现领袖的理论水平、胆略、战略策略素养的地方。然而,这显然不是台

尔曼的强项。他擅长的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击败党内对手,而不是在阶级斗争的战场上克敌制胜、夺取政权。

台尔曼是怎么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呢?网上的台尔曼简历没有详细介绍,只说他参加1932年的总统选举,指出“投兴登堡的票就是投希特勒的票,而希特勒就是战争”。另一场斗争是在希特勒上台后,他的冲锋队向德共总部挑衅,台尔曼在《红旗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希特勒的阴谋,并率领10多万工人上街游行,抗议法西斯的暴行。此后他就被捕入狱,在狱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了。

不过,从托洛茨基当时就国际和德国反法西斯斗争所写的系列文章中,可以更加具体地看到台尔曼是如何进行反法西斯斗争的;还可以看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战术(因为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反对自下而上的反革命的斗争,而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为这样的斗争提供正确的战略战术),不仅可以阻止纳粹上台,还可以使无产阶级成为这场斗争的胜利者。

从1928年台尔曼遵照第三国际的指令进入“第三阶段”以来,搞过总罢工、各种红色日、占领街道,人为地制造革命形势,除了使党丧失声誉和力量之外,没有带来任何结果。反对社会法西斯党的斗争也未能把该党的工人群众争取到共产党一边来。在跟着莫斯科的指挥棒徒劳地转了两年多之后,台尔曼和德国共产党遇到了真正的社会危机,也是真正的革命形势。

1929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对德国产生了致命的影响,造成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正是在这种危机形势下,在1930年的德国国会选举中,本来是一个极右翼小党的纳粹党,它所得的选票从上一次的80多万张一下子飙升到600多万张,一跃成为国会第二大党。从此,德国真正面对法西斯的威胁。

托洛茨基以他特有的政治家的敏感和对法西斯本质的清醒认识,意识到从此时起,国际共运和国际形势的关键在德国,欧洲和全人类的命运都将取决于德国共产党和法西斯之间斗争的结局。从这时开始到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前,托洛茨基写了一系列文章,结合德国形势的每一次变化,对共产国际荒谬的“第三阶段”理论以及台尔曼推行的错误政策进行批判,并提出正确的斗争策略。然而,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各支部的改组是彻底的,德共领袖不仅没有能力对形势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判断和预见,甚至连大难临头时的预感和自保的本能都丧失殆尽,只会鹦鹉学舌般地重复斯大林定下的调子,对托洛茨基的睿智的分析和用心良苦的规劝报

以恶毒的讥讽和咒骂。

### 1. 被胜利冲昏头脑

危机的来临使德共在 1930 年 9 月的德国国会选举中从上一次的 300 万张增加到 450 万张。台尔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台尔曼为共产党增加的 150 万张选票沾沾自喜,无视纳粹选票的更加迅猛的增长。德共机关报《红旗报》在选举后的第二天的社论中写道:“昨天对希特勒先生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但纳粹分子在大选中的所谓胜利仅仅是它末日的开始。”几个星期后,这家报纸又说:“9月14日是纳粹运动在德国的顶点,继之而来的只能是退潮。”

托洛茨基立即对这次选举做出了反应,写下了对这次大选的评论。他在文章中指出,共产党增加的 100 多万张选票与纳粹增加的几乎 600 万张选票相比,就微不足道了。这表明,共产国际的所谓的“群众的激进化”不是对革命有利,而是对反革命有利。台尔曼之所以认为纳粹在大选胜利之后就会走下坡路,是因为他认为纳粹的兴起是遥远的 1923 年危机和继之而来的社会震荡的反响。托洛茨基则认为纳粹抬头不是过去危机的余波,它正在为未来的社会危机积聚力量。托洛茨基对大选的结论是:“尽管共产党在议会中得胜,无产阶级革命……仍然遭到了惨重的失败……而这次失败或许是致命的。”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他更加坚决地主张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建立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托洛茨基的这篇文章立即译成多种语言,出了单行本,并立即招致德共领袖的抨击。

德共的《红旗报》称托洛茨基是“惊慌失措的人”、“冒险家”和“布吕宁的代理人”,指责他妄图迫使共产党放弃无产阶级革命,迫使共产党“忘记如不先战胜社会法西斯主义,就不能战胜法西斯主义”。

对此,托洛茨基反驳说:“历史上一个最关键的时刻即将来临,作为革命因素的共产国际将被从政治版图上抹去整整一个历史时期。……我们应该振聋发聩地对普通工人说:继冒失、鲁莽、自吹自擂的‘第三阶段’之后,是惊慌失措、举手投降的第四阶段。”这一可怕的灾难被托洛茨基不幸而言中。但此话说于 1931 年 9 月、10 月间,由此到灾难的实际发生,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台尔曼还有时间再犯下更多严重错误,错失许多战败纳粹的机会。

### 2. “红色”全民公决

1931 年 7 月 21 日,德共中央委员会以最后通牒的

方式要求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在民主和社会两方面做让步,否则它就参加纳粹倡议的旨在推翻这个政府的全民公决。在最后通牒遭到布劳恩政府的拒绝后,台尔曼便率领德共投入了所谓的红色全民公决。

托洛茨基于 8 月 25 日就对此做出批评,撰写了一篇题为《反对民族共产主义——“红色”全民公决的教训》的文章。托洛茨基指责德共的这一行动与纳粹实际上结成了反对社会民主党的统一战线。但这也不是绝对不可以的。它是否是“红色”的,主要取决于力量对比。如果对法西斯有利,那么所谓的“红色”全民公决就纯属冒险;如果力量对比对无产阶级有利,则另当别论。托洛茨基指出,“红色”全民公决给德共带来了多重打击:巩固了社会民主党,因而加强了布吕宁—布劳恩政府,掩盖了法西斯分子的失败,把社会民主党党员和相当大部分自己的选民从自己的身边推走,从而削弱了自己。

第二年,历史就验证了托洛茨基的结论。当巴本取代布吕宁任政府总理时,以一纸法令取缔普鲁士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此时德共建议与社会民主党一起发动总罢工。这一建议不仅被社会民主党拒绝,就是在德共自己的队伍中,也是响应者寥寥。

### 3. 狼来了

早在台尔曼跟随莫斯科进入“第三阶段”时,就认为德国是在社会法西斯的统治之下。1929 年 10 月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震动了魏玛共和国,造成 600 万工人失业。1930 年 3 月,兴登堡总统任命海因里希·布吕宁为总理。布吕宁采取了紧缩政策应对危机,大量裁减国家职工,降低工资。这些措施激化了社会矛盾。“德国已经生活在法西斯的统治之下”之类的断言几乎每天都出现在德共的《红旗报》上。当巴本取缔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时,德共称其为法西斯政变。这样频繁地叫喊“狼来了”,麻痹了自己的队伍和社会对真正的法西斯的警惕性。纳粹就是在这样麻痹和丧失警惕的情况下不战而胜的。

德国危机刚刚开始,托洛茨基就对其实质做出了准确的基本判断,即德国当前的危机表明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和正常的统治方式都无力解决德国社会所面临的严重问题,这场危机有两种可能的结局:法西斯获胜或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也就是说,最后的决战将在无产阶级和法西斯之间展开。根据这个判断,他认为社会民主党政府、布吕宁以及巴本政府,都是最后决战前的序曲,是过渡阶段。他把布吕宁政府和后来的巴本政府界定为波拿巴主义政权,即企图依靠军队和警察统治而凌驾于

革命和反革命两个营垒之上的政权。他批评把布吕宁政权混同于希特勒政权的德共领袖,说他们这样做是把战斗前夜的局势和失败以后的条件混为一谈,是事先自认失败,实质上是在号召人们不战而降。

托洛茨基不断地敲响警钟,指出德共和社会主义党的不战而降的危险。他以他的全部力量和热情阻止这一可能性成为现实,然而……

#### 4. 德共不战而降

托洛茨基曾多次预言,希特勒不经过内战是不可能上台的;对无产阶级及其组织和它的政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都包括在内)来说,这是生命攸关之事,“工人和共产党员们,你们有数百万之众。……一旦法西斯掌权,它会像一辆可怕的坦克一样碾过你们的头颅和脊梁。”但是,他最不愿意相信和看到的事,还是发生了。

从未认真考虑过与真正的法西斯做斗争,也从未清醒地认识德国所经历的几个阶段的性质的台尔曼,在失败尚未来临之前,还是满口豪言壮语,他说,他相信德国“当然不会成为法西斯国家。我们在选举中的胜利就是反对这一前景的保障”。

台尔曼的大话空话的惟一基础,就是他相信,9月14日之后纳粹党就“不会有好日子”。一旦事实表明纳粹上升的势头依然不减,台尔曼就轻率地说,一旦希特勒夺取政权,工人就会把他消灭。

对此,托洛茨基尖刻地嘲讽说,共产党为希特勒准备了政权的陷阱,“总攻应该在希特勒取代布吕宁之前开始,应当在工人组织被取缔之前开始。……说什么希特勒一旦掌权便会被工人消灭……是为希特勒掌权清理道路。……如果德国工人阶级……允许法西斯掌权……那么就没有任何根据假定同一工人阶级会在一瞬间摆脱昏昏欲睡的状态而将法西斯一举推翻。”

即使是在希特勒当上总理后,德共与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共同与法西斯进行殊死搏斗,虽然与希特勒上台前相比更加不利,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托洛茨基建议的正是这条道路。他认为,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应不惜一切地把纳粹政权消灭在萌芽状态中,哪怕是动用红军的力量,把德国的内战国际化。当然,他的这一建议遭到了新一轮共产国际和德共的谩骂:“冒险家”、“妄图挑起德国与苏联之间的战争”等等。

然而此时台尔曼使用的仍是批判的武器,发表文章揭穿法西斯挑衅的阴谋,率领10多万工人上街游行。

难怪托洛茨基愤然说:“连法西斯的雷霆也无法将其唤醒,这样的组织……已经死亡,而且万劫不复。”

## 台尔曼的胜利

就是在1931—1933年之间,在那关系德国共产党、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命运的紧要关头,台尔曼在德共党内赢得了一场他个人的重大胜利。在这场斗争中,他依靠斯大林的支持彻底击败了他的党内对手,成为德共的主宰。只可惜好景不长,几个月之后,他在党内的新地位就随着德共被纳粹消灭而化为乌有。

在这场斗争中,他的主要对手是G.诺伊曼和G.雷梅尔等。这场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起源于政策分歧。

1931年初,雷梅尔因反对德共政策中的宗派主义(指的是德共推行的共产国际“第三阶段”中的不与社会民主党结成任何形式的联盟的指令)及其推行者而声誉鹊起。这引起了台尔曼的不安。

当德共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改变初衷,应和旨在推翻普鲁士政府的纳粹倡议时,德共党内对所推行的政策的不满表现得更为强烈。党内矛盾进一步加剧。

诺伊曼为缓和矛盾,于1932年1月7日致函台尔曼,说他认为他们之间没有根本的分歧,并保证服从台尔曼的领导。台尔曼次日回信予以驳斥,认为在全民公决中的不同立场就是根本分歧。他还指责诺伊曼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大大加强了共产国际方针中的宗派主义)不够积极热心。

其实,真正让台尔曼不能容忍的,是他认为诺伊曼想在党的领导层占据特殊地位。

台尔曼竞选总统的失败也使他与反对派领袖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在第一轮选举中,台尔曼只得到500万张选票,但他不承认失败,千方百计把失利归罪于党内的敌对力量,并点了雷梅尔的名字。

巴本政府下令取缔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

然而事隔4天之后,德共才做出了第一个反应。德共领导的消极引起了普通党员的强烈不满。这一事件激化了台尔曼及其支持者与反对派的矛盾。台尔曼决定在1932年夏天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彻底粉碎反对派。

1932年7月31日的国会选举中,纳粹成了国会第一大党,同年8月,兴登堡总统第一次召见希特勒,商谈纳粹入阁事宜,希特勒上台的危险已经十分清楚。但此时,台尔曼更加关注的是为即将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搜集诺伊曼和雷梅尔的黑材料。

7月29日,在普鲁士政府被推翻的9天后,在国会选举的两天前,台尔曼仍在全力以赴地策划给反对派以致命的打击,他制定了彻底铲除德共反对派的一系列严厉措施:当务之急是立即捣毁莫斯科的派别巢穴。他下令解除德共几个高层领导的职务,更主要的是必须让诺伊曼离开莫斯科,调往其他国家。

1932年底,德国的形势进一步恶化,纳粹上台的前景更加明确。

然而此时,在一次德共书记处会议上,雷梅尔发言反对拟议中的领导人事变动时,台尔曼竟然跳了起来,对他破口大骂,还挥舞拳头,扬言要痛打他一顿。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上,在共产国际领袖们的支持下,台尔曼如愿以偿地打垮了对手,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了把诺伊曼开除出德共政治局的决议。

台尔曼在这场斗争中彻底地铲除了对手,大获全胜,赢得了在党内至高无上的地位。

上述一切表明,台尔曼对他个人在党内地位的波动比纳粹对共产党和工人运动的威胁更加敏感,更加重视。本来大敌当前之,作为党的领袖应该团结全党力量一致对外,他却为他个人在党内的地位而展开了一场内部斗争,借助于斯大林的支持,打垮了党内较为清醒和理智的同志。然而,台尔曼还没来得及享受这场胜利的果实,他本人及德共就被纳粹的战车碾得粉碎,真是又可恨又可悲。

应该说,1930—1933年纳粹上台之前的德国形势,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历史早已宣判台尔曼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只会追随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没有能力科学地判断和预见德国形势的发展,更谈不上据此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了。甚至在大难临头之时,他还能对个人权力而集中全力打击自己的党内同志。在这样的领袖的领导之下,德共的覆灭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共产国际和德共拒不接受托洛茨基对德国形势的判断和他所提出的战略战术,反而对他大肆攻击谩骂,他提出的战略战术没有机会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但他判断德国形势的科学性,预见形势发展的准确性,均得到历史的证明。他提出的用自下而上的革命战胜自下而上的反革命,是有其现实可能性的。这

表明,作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应该能够指导无产阶级战胜法西斯,走向胜利,而蜕化的官僚领袖斯大林和台尔曼却使无产阶级不战而降。

这块试金石同时证明,德国社会民主党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它对当时的德国形势同样没有科学和清醒的判断和预见,更没有正确的战略战术。法西斯的兴起,其实就是社会民主党作为魏玛共和国主要执政党无力应对危机的产物。在布吕宁和巴本政府时期,它虽然已经削弱,但一直是国会第一大党。只是在1932年7月的那次国会大选中输给纳粹,让出了国会第一大党的交椅。它同样应该为希特勒上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承担责任。

(责任编辑 萧 徐)

## 书屋 2008年第12期目录

- |      |                 |     |
|------|-----------------|-----|
| 书屋讲坛 | 对有毒食品泛滥的文化反思    | 邓晓芒 |
|      | 第五种权力           | 刘畅  |
|      | 想起了熊彼特          | 林岗  |
| 口述历史 | 刘再复访谈录          | 朱爱君 |
| 流年碎影 | 可信的珍贵史料         | 李南央 |
|      | 转入地上工作五十九年      | 张宣  |
|      | 那消失的一方净土        | 李文熹 |
|      | 取舍与否君自知         |     |
|      | ——怀念许志英先生       | 张红娟 |
| 灯下随笔 | 有无“顾准现象”?       | 赵俊贤 |
|      | 方言存废:一场未竟之辩     | 毛翰  |
|      | 不要轻言“钩沉索引”      | 散木  |
|      | “仰视”与“愧怍”       | 董驹翔 |
|      | “至无”而“善动”       | 高筠  |
| 域外传真 | 诺曼·马内阿作品中的犹太性   | 孙传钊 |
| 旧事新识 | 火爆与沉寂 谭熙鸿轶事     | 司徒允 |
|      | 相识欲诉又彷徨         |     |
|      | ——赵清阁与老舍        | 桑农  |
| 前言后语 | 姐姐都老了           |     |
|      | ——《反阅读》序言       | 敬文东 |
|      | 四百年以来对江盈科的接受与批评 | 黄仁生 |

邮发代号:42-150 月刊 每月6日出版 定价:5.00元

地址:长沙市韶山北路443号《书屋》杂志 邮编:410007

电话:0731-5791300 5486812 传真:0731-5790197

邮箱:nlh5314@263.net

# 《炎黄春秋》2008 年(1—12 期)总目录

标 题 作 者 期·页

## 【卷首语】

新的一年 新的期待……………本刊编辑部 1·1

## 【特稿 专稿】

经济改革是怎样搞起来的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田纪云 1·3  
社会进步还要制度保障……………资中筠 7·1  
文革的三次地震与汶川之震……………雷 颐 7·5  
启动善的竞争……………郭宇宽 7·9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  
……………胡启立 12·1

## 【春秋笔】

广东新一轮思想解放意味着什么——中国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高尚全访谈录……………马国川 3·1  
喜读《日记中的池必卿》……………朱 正 3·6  
八十年代经济改革十大措施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田纪云 3·9  
特事特办:胡耀邦与经济特区……………王 硕 4·36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人权保障条例》  
……………李维民 李克进 4·41  
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于光远 8·1  
铁托与华国锋互访  
——对改革开放带来启迪的外事活动……………朱 良 8·8  
一篇更重要更全面的“窑洞对”  
——毛泽东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阎长贵 10·33  
共和国历史上的柯庆施……………方海兴 10·35  
通渭问题——“大跃进”五十周年祭……………杨继绳 10·41  
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王洪起 10·47  
中国的地震预警史……………钱 钢 11·39  
中国环境保护的现状与前景……………思 源 11·46  
改革开放与普世价值……………杨 民 12·13  
自由——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应克复 12·19

## 【人物志】

李聚奎上将在文革中……………李卫雨 1·31

标 题 作 者 期·页

项南扶贫记……………谷 峰 1·35  
张申府:“我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王贵胜 2·35  
“两弹”元勋朱光亚……………王建柱 2·40  
追忆章士钊先生……………周相唐 2·44  
“中国圣女贞德”杨惠敏……………张 磊 2·49  
袁振英——陈独秀的得意弟子……………李继锋 郭 彬 3·44  
李昌和“一二·九”那代人……………李 锐 4·1  
“双枪老太婆”在建国后……………林 雪 4·5  
好一个“小兵”金敬迈  
——《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哪》摘记……………李南央 6·20  
请理解老一代——怀念李慎之……………刘志琴 6·25  
早期陈独秀是社会民主主义者……………盖 军 9·64  
洪君彦章含之的政治语境下的非正常生活……………丹 晨 9·70  
郭沫若的政治家品格……………张毓茂 9·74

## 【亲历记】

在上海遥望昆明——六十年前震惊上海的

两次民主浪潮……………袁 鹰 1·49  
王亚卓事件始末……………邢 卓 1·53  
不堪回首的那一天……………黄 鹂 1·59  
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田纪云 2·1  
1961—1962:河北省甄别平反……………安振英 2·5  
我亲历的清理阶级队伍……………于峰华 2·8  
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决策机制……………李树桥 4·25  
我亲历的“四五”运动……………鲁利玲 4·29  
我见到的胡志明主席……………戴 煌 4·33  
红卫兵运动兴起亲历记……………刘 晋 5·31  
山西分社“清查”厄运追记……………马 明 5·35  
我知道的翼社和中国托派……………汪文郁 5·37  
我们写信告迟群……………唐少杰 6·9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仪式和战俘谈判……………阎稚新 6·16  
两次大寨之行……………田纪云 7·51  
高中生遭遇“模拟反右”……………李临雅 7·53  
五马公社“帅旗”背后的悲剧……………梁志远 8·25  
文革后期我与四川省委书记的交往……………孙 振 9·17  
我成了学部“五·一六”政委……………孟祥才 9·22

## 总 目 录

| 标 题                   | 作 者 | 期·页   |
|-----------------------|-----|-------|
| 1948年减轻老区战勤负担的背后····· | 庄 重 | 9·29  |
| 关于三峡的一场“御前辩论”·····    | 韩 磊 | 10·11 |
| 我的右倾罪：青海农村调查·····     | 王志敏 | 10·15 |
| 绕航黑瞎子岛·····           | 吴广权 | 10·21 |
| 我的“理论工作者”经历·····      | 李洪林 | 11·19 |
| 我在头脑发热年代写发热文章·····    | 袁 鹰 | 11·26 |
| 江青在中央文革小组专政·····      | 阎长贵 | 11·30 |
| 王府井亮起来背后的故事·····      | 张颂甲 | 11·33 |
| 清华附中红卫兵 100 天·····    | 阎阳生 | 12·21 |
| 我亲历的“潘晓讨论”·····       | 郭楠柠 | 12·28 |
| 我的 1978 年·····        | 高 放 | 12·33 |

### 【求实篇】

|                                          |            |         |
|------------------------------------------|------------|---------|
| 胡适与陈独秀关于帝国主义的争论·····                     | 邵 建        | 1·10    |
| 专政、民主与所谓“恩格斯转变”——十九世纪后半期 社会主义政治理念评述····· | 秦 晖        | 1·17    |
| 解放后苏联援华的历史真相·····                        | 徐 焰        | 2·30    |
|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建设·····                      | 丁龙嘉        | 3·24    |
| 教育投资体制：从过去看未来·····                       | 思 源        | 6·2     |
| 安排境外机构救援要有预案·····                        | 阎明复        | 8·57    |
| 我在海城地震时采访·····                           | 周保华        | 8·58    |
| 改革初期我们的闯劲来自哪里——在农村改革三十周年论坛上的发言·····      | 沈祖伦        | 9·1     |
| 中国农民有财产吗——兼谈农民承包地的补偿问题·····              | 高亮之        | 9·4     |
| 1976 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                 | 熊 蕾        | 10·1    |
| 听华国锋谈几件大事·····                           | 张根生        | 遗稿 10·9 |
| 包产到户提出过程中的高层争论——访国家农业委员会原副主任杜润生·····     | 徐庆全 杜明明    | 11·1    |
|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论稿·····                          | 吴 江        | 11·6    |
|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                     | 朱 良        | 11·12   |
| 李锐对改革开放的个人回顾·····                        | 李锐口述 王建勋整理 | 11·17   |

### 【沉思录】

|                                      |     |      |
|--------------------------------------|-----|------|
| “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讨论始末·····                 | 崔卫平 | 2·22 |
| 奥斯特洛夫斯基：“我们所建成的，与我们为之奋斗的完全两样！”·····  | 穆广仁 | 2·28 |
| 读毛泽东关于“大串联”的谈话·····                  | 金大陆 | 3·66 |
| 学术讨论政治化的历史记录——读《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后的思考····· | 杜 光 | 4·44 |
| 解决三峡工程遗留问题还任重道远·····                 | 鲁家果 | 5·54 |
| 集体世袭与“权力场”·····                      | 杨继绳 | 6·50 |
| 能反省历史的民族才有光明的未来·····                 | 资中筠 | 6·53 |

| 标 题                     | 作 者         | 期·页  |
|-------------------------|-------------|------|
| 继承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遗产····· | 马 句等        | 6·55 |
| 启蒙在中国的百年遭遇·····         | 董 健 王彬彬 张光芒 | 9·13 |

### 【忏悔录】

|            |     |      |
|------------|-----|------|
| 我打谷志有····· | 王克明 | 5·64 |
|------------|-----|------|

### 【一家言】

|                                  |             |       |
|----------------------------------|-------------|-------|
| 关于撰写《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历史来源》一书的几点说明·····  | 黄道奇         | 1·25  |
| 从周恩来让座说起——纪念周总理逝世 32 周年·····     | 梁 衡         | 1·28  |
| 当代中国与新民主主义结构·····                | 姚监复(整理)     | 2·13  |
| 现代民主的两面观·····                    | 赵鼎新         | 2·15  |
| 对资产阶级认识的历史变迁·····                | 辛子陵         | 3·15  |
| 我看宪法第六条·····                     | 何 伟         | 3·22  |
| 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建立民生财政的设想····· | 思 源         | 4·12  |
| 社会主义本质：一句话的变迁·····               | 刘济生         | 4·20  |
| 表达权与解放思想·····                    | 王也扬         | 4·24  |
| 中国需要提倡宽容的文化精神·····               | 朱厚泽         | 5·1   |
| 改革把“工具”重新变成“人”·····              | 冯东书         | 5·3   |
| “带病提拔”症结何在·····                  | 谷 翔         | 6·69  |
| 样板戏进课堂有感·····                    | 王海光         | 6·72  |
| 合成一个新东西——我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 辛子陵         | 7·44  |
| 从反清筹款看另一种传统·····                 | 郭玉闪         | 7·49  |
| 普世价值：作为驻外记者的感想·····              | 彭迪 钱行       | 8·29  |
| 论孔子学说·····                       | 吴 江         | 8·33  |
| 我看党与国家的关系·····                   | 应克复         | 10·25 |
| 怎样选择突破口·····                     | 辛 宇         | 10·30 |
| 舆论监督对防腐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 谷 翔         | 11·59 |
| 闻陆铿辞世感言·····                     | 施 亮         | 11·62 |
| 反腐三十年的沉思·····                    | 辛 宇         | 12·38 |
| 国庆仪式创新漫笔·····                    | 智效民 丁 东 赵 诚 | 12·45 |

### 【往事录】

|                                         |       |      |
|-----------------------------------------|-------|------|
| 胡耀邦外交活动的创新——记总书记 1986 年访问英、德、法、意四国····· | 朱 良   | 1·39 |
| 《光明日报》“关系牌香烟”报道始末·····                  | 陈 英   | 1·44 |
| 邓小平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                    | 徐慰曾   | 1·47 |
| 任仲夷同志的一幅珍贵墨宝·····                       | 杨 慎   | 2·52 |
| 阎锡山的最后岁月·····                           | 黄禹康   | 2·53 |
| 我们连里的七个“反革命”·····                       | 利川 津津 | 3·52 |

| 标 题                             | 作 者     | 期·页   |
|---------------------------------|---------|-------|
| 日本战犯重到南京·····                   | 叔 弓     | 3·56  |
| 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               | 王晓林     | 4·69  |
| “迎丰公社反革命事件”始末·····              | 戴安林     | 5·4   |
| 毛泽东号召“开展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 阎长贵     | 5·10  |
| 李政道同江青的一次辩论·····                | 施宝华     | 5·14  |
| 毛泽东与反右派斗争·····                  | 李 锐     | 7·26  |
| “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指示的来历·····          | 靖 鸣     | 7·32  |
| “犯正确”与“紧跟错”<br>——不准实事求是的悲剧····· | 冯东书     | 7·39  |
|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吗·····           | 阎长贵     | 8·11  |
| 文革样板:北京二七厂清理阶级队伍·····           | 夏俊生     | 8·15  |
| 毛泽东和林一山谈三峡水库·····               | 顾迈男     | 8·20  |
| 张季鸾笔下的临沂之战·····                 | 丛彩娥 杨世谷 | 9·52  |
| 刘建章在“太行整风”中的遭遇·····             | 李春明     | 9·55  |
| 日本战犯沈阳受审前后·····                 | 高 建 王建国 | 9·60  |
| 统购统销的历史回顾·····                  | 杨继绳     | 12·48 |
| 胡耀邦让黎白写《湘潭黎氏》·····              | 黄宗江     | 12·55 |
| 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               | 赵淮青     | 12·57 |

## 【随想录】

|               |     |      |
|---------------|-----|------|
| 经济发展随想三则····· | 杜润生 | 6·74 |
|---------------|-----|------|

## 【群言堂】

|                                                                                         |      |
|-----------------------------------------------------------------------------------------|------|
| 推进民主是第一要务——专家学者笔谈“两会”<br>彭 迪 袁 鹰 杜导正 资中筠 何 方 杜 光<br>冯 健 高 放 钟沛璋 辛子陵 章立凡···              | 5·19 |
| 以历史进步补偿灾难——专家学者笔谈汶川地震<br>杜润生 于光远 李 锐 杜导正 冯 健<br>彭 迪 钟沛璋 袁 鹰 何 方 张广友<br>张 鸣 展 江 吴 思····· | 7·14 |

## 【访谈录】

|                    |     |      |
|--------------------|-----|------|
| 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 | 任彦芳 | 5·58 |
|--------------------|-----|------|

## 【挚友情 怀人篇 怀念集】

|                                               |     |      |
|-----------------------------------------------|-----|------|
| 朱陈往事增惆怅 心底无私天地宽——纪念<br>陶铸同志诞辰 100 周年文集代序····· | 吴南生 | 1·65 |
| 深切缅怀黄正清同志·····                                | 李屹阳 | 1·68 |
| 被迫自戕的我的七位老上级·····                             | 刘道新 | 1·71 |
| 乡贤胡乔木·····                                    | 顾 骧 | 3·33 |
| 我的父亲马洪·····                                   | 马 雅 | 3·41 |
| 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                               | 丁磐石 | 4·49 |
| 夏明翰就义八十周年祭·····                               | 汤益民 | 5·42 |
| 王若水在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争论中·····                         | 张显扬 | 5·45 |

| 标 题                             | 作 者   | 期·页   |
|---------------------------------|-------|-------|
| 杨立三的经济实践与经济思想·····              | 李 琴   | 5·49  |
| 怀念爸爸李斌·····                     | 李 静   | 6·61  |
| 托派老人刘平梅·····                    | 段 跃   | 6·65  |
| 不为君王唱赞歌 只为苍生说人话<br>——悼柏杨先生····· | 李 钧   | 7·58  |
| 瞿独伊忆父母瞿秋白和杨之华·····              | 孙维熙   | 8·62  |
| 陈独秀旧居怅想·····                    | 操凤琴   | 8·69  |
| 五个不幸早逝的人·····                   | 赵友慈   | 8·72  |
| 我要说话——纪念母亲郑德芳·····              | 蒋燕燕   | 10·61 |
| 萧克与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               | 本刊编辑部 | 12·7  |
| 陪萧克将军重游旧地·····                  | 欧 初   | 12·11 |

## 【文坛事】

|                    |     |      |
|--------------------|-----|------|
| 丁玲与毛泽东一次谈话的真伪····· | 徐庆全 | 3·68 |
|--------------------|-----|------|

## 【文摘苑】

|                    |          |      |
|--------------------|----------|------|
| 让媒体说话天塌不下来等三篇····· | 邓海等      | 2·75 |
| 思想解放七论·····        | 摘自《南方周末》 | 4·75 |

## 【品书斋】

|                                   |     |       |
|-----------------------------------|-----|-------|
| 龚老师,您的心愿可以了却了吗?·····              | 韩 钢 | 3·60  |
| 《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读后·····               | 章立凡 | 3·63  |
| 从丁玲的命运看革命文艺生态中的文化、<br>权力与政治·····  | 高 华 | 4·55  |
| 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br>——《抹不掉的记忆》序·····     | 吴 象 | 4·36  |
| 《从囚徒到省委书记》的文学史定位·····             | 鲁 煤 | 6·75  |
| 一把手更需制衡<br>——读白石新作《上任以后》·····     | 肖 获 | 6·76  |
| 追溯中共初创时期的历史<br>——《中共创始人访谈录》序····· | 李 锐 | 8·41  |
| 回忆父亲胡耀邦对我的教诲<br>——从一封家信谈起·····    | 胡德平 | 10·66 |
| 《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后语·····                 | 叶维丽 | 11·64 |
| 饥不择食的阅读记忆·····                    | 袁小伦 | 11·67 |
| 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                    | 于光远 | 12·61 |
| 评《国史札记》兼论高饶事件·····                | 王海光 | 12·64 |
| 《朱元璋传》重版序言·····                   | 章立凡 | 12·69 |

## 【故纸堆】

|                  |         |      |
|------------------|---------|------|
| 长白山地区土改运动纪实····· | 白介夫日记摘录 | 1·61 |
|------------------|---------|------|

## 【古今谈】

|                  |     |      |
|------------------|-----|------|
| 孙中山先生与“秦家店”····· | 尹振环 | 2·63 |
|------------------|-----|------|

## 总 目 录

| 标 题                              | 作 者     | 期·页   |
|----------------------------------|---------|-------|
| 清王朝覆灭及其教训·····                   | 肖建生 肖羽西 | 2·69  |
| 哭倒长城骂倒秦——从孟姜女故事看中国老百姓眼里的秦始皇····· | 李 乔     | 3·75  |
| 公园古今事·····                       | 雷 颐     | 4·65  |
| 朱元璋为何要把孟子清理出孔庙·····              | 陈 虎     | 6·77  |
| 寻找“个人”·····                      | 罗晓静     | 9·77  |
| “万岁”故事·····                      | 雷 颐     | 10·68 |
| 值得纪念的光绪皇帝·····                   | 王也扬     | 11·71 |

### 【古镜台】

|            |     |      |
|------------|-----|------|
| 元曲主旋律····· | 王克明 | 1·74 |
|------------|-----|------|

### 【冶方杯征文】

|                                                |     |       |
|------------------------------------------------|-----|-------|
| 走在艰难平反路上的一年·····                               | 何 方 | 6·29  |
| 恳请不任内蒙古区党委书记·····                              | 孙 奇 | 6·36  |
| 胡耀邦谈“反对精神污染”·····                              | 魏久明 | 6·38  |
| 《译林》事件始末·····                                  | 施 亮 | 6·43  |
| 实践标准讨论中新闻理论界的人和事·····                          | 余焕椿 | 7·63  |
| 贾植芳：黑色幽默的人生·····                               | 彭小莲 | 7·67  |
| 亲历农村改革的几场风雨·····                               | 季 音 | 8·45  |
| 感受 1978 年历史转折·····                             | 汪澍白 | 8·51  |
| 我的外公孙冶方——武克钢访谈录·····                           | 徐庆全 | 9·32  |
| 市场经济理论：广东创新的背后·····                            | 王启军 | 9·40  |
| 参与改革开放的第一港商——访香港永新企业有限公司主席、“港龙航空”创办人曹光彪先生····· | 杜明明 | 9·47  |
| 1984 年胡耀邦中苏边境行·····                            | 张持坚 | 10·53 |

| 标 题                | 作 者 | 期·页   |
|--------------------|-----|-------|
| 一项改革建议的提出和采纳·····  | 陈 力 | 10·58 |
| 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艰难历程····· | 李维民 | 11·53 |

### 【海外事】

|                         |         |       |
|-------------------------|---------|-------|
| 还纳吉以清白·····             | 侯凤菁     | 2·57  |
| 1920 年的世界革命与苏波战争始末····· | 王天兵     | 3·71  |
| 波尔布特：并不遥远的教训·····       | 王晓林     | 4·69  |
| 列宁时期党内民主是如何被破坏的·····    | 尹 彦     | 5·68  |
| 裴多菲俱乐部真相·····           | 侯凤菁     | 5·73  |
| 一月剧变：超过十月革命的大事件·····    | 金 雁     | 7·72  |
| 齐奥塞斯库之死·····            | 张汉文 周荣子 | 8·74  |
|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上篇)·····   | 赵启强     | 10·73 |
| “布拉格之春”四十周年祭(下篇)·····   | 赵启强     | 11·73 |
| 历史上的台尔曼·····            | 施用勤     | 12·72 |

### 【编读窗】

|                 |         |       |
|-----------------|---------|-------|
| 读者来信摘登(五则)····· | 吴昭谦等    | 1·79  |
| 读者来信摘登(六则)····· | 宫时中等    | 2·79  |
| 读者来信摘登(三则)····· | 高世玉等    | 3·79  |
| 读者来信摘登(五则)····· | 马国征等    | 5·79  |
| 就“机制”一文答客问····· | 李树桥     | 7·80  |
| 读者来信摘登三则·····   | 李光羽等    | 7·48  |
| 读者来信·····       | 于俊沂 吴 镭 | 10·80 |

### 【总目录】

|                            |       |       |
|----------------------------|-------|-------|
| 《炎黄春秋》2008 年 1—12 期目录····· | 本刊编辑部 | 12·77 |
|----------------------------|-------|-------|

## 按需出版

我公司自 2004 年开展按需出版业务后,深受广大作者的欢迎。四年来已经为 300 多位作者出版了他们的学术专著、回忆录、游记、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也为加拿大、台湾等海外作者服务,出版了他们的著作赠送大陆亲属友人。成为最有品味的礼物和独到意义的纪念。

按需出版是最新的数码出版方式,它有四大优点:(1)解决由于印数少而不能出版的问题(50 本起印)。(2)即需即印,总是新书,零库存。(3)避免资金一次过多投入造成浪费。(4)出版周期短,一般在 1—2 个月。

适用范围:个人著作(小说散文诗歌自传游记老辈遗作等等);家庭、家族需要保存、传世的专辑、画册;单位或个人旧书翻新重印;单位少量用书。

印数:100 册以下最合适。

## 继续征稿

资金投入:自费。以 20 万字 288 面、规格大 32 开本为例,50 本一般在 4600 元左右(黑白单色)。彩色及详细报价可电话或信函咨询。

稿件内容文责自负,不符合我国出版法规的不能出版。没有书号,不能销售,仅作为留世和赠送。

纸张:70 克胶版纸(黑白单色),印刷质量:上乘。

所有出版的图书均事前签订合同。

公司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清缘西里小区 1 号楼 1509 号,邮编:100085,

热线:13521531088 陶女士。

电子邮箱(Email):173736757@qq.com

北京地区上门服务,送书到家。

北京文苑文化发展公司

2008 年 8 月

# 缅怀萧克老会长

## 深切缅怀萧克老会长追思会



“深切缅怀萧克老会长追思会”会场

2008年11月5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在鲁迅博物馆举行“深切缅怀萧克老会长追思会”。萧克同志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担任过执行会长、会长，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民族的爱国大团结，做出过巨大的贡献。

会议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文彬同志主持，曾经在萧克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本会工作人员及生前好友，深切缅怀萧克同志“立言、立德、立功”的不朽业绩。



会议由张文彬同志主持



王仁民同志发言



李宝光同志发言



杜导正同志发言



张岂之同志发言



王俊义同志发言



鲁諝同志发言



王才同志发言



王科元同志发言

摄影 卢林林

于光远：关于知识分子的属性

我亲历的“潘晓讨论”

自由——马克思的核心价值观

反腐三十年的沉思

文革中青海的一次流血事件

历史上的台尔曼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定价：5.80元